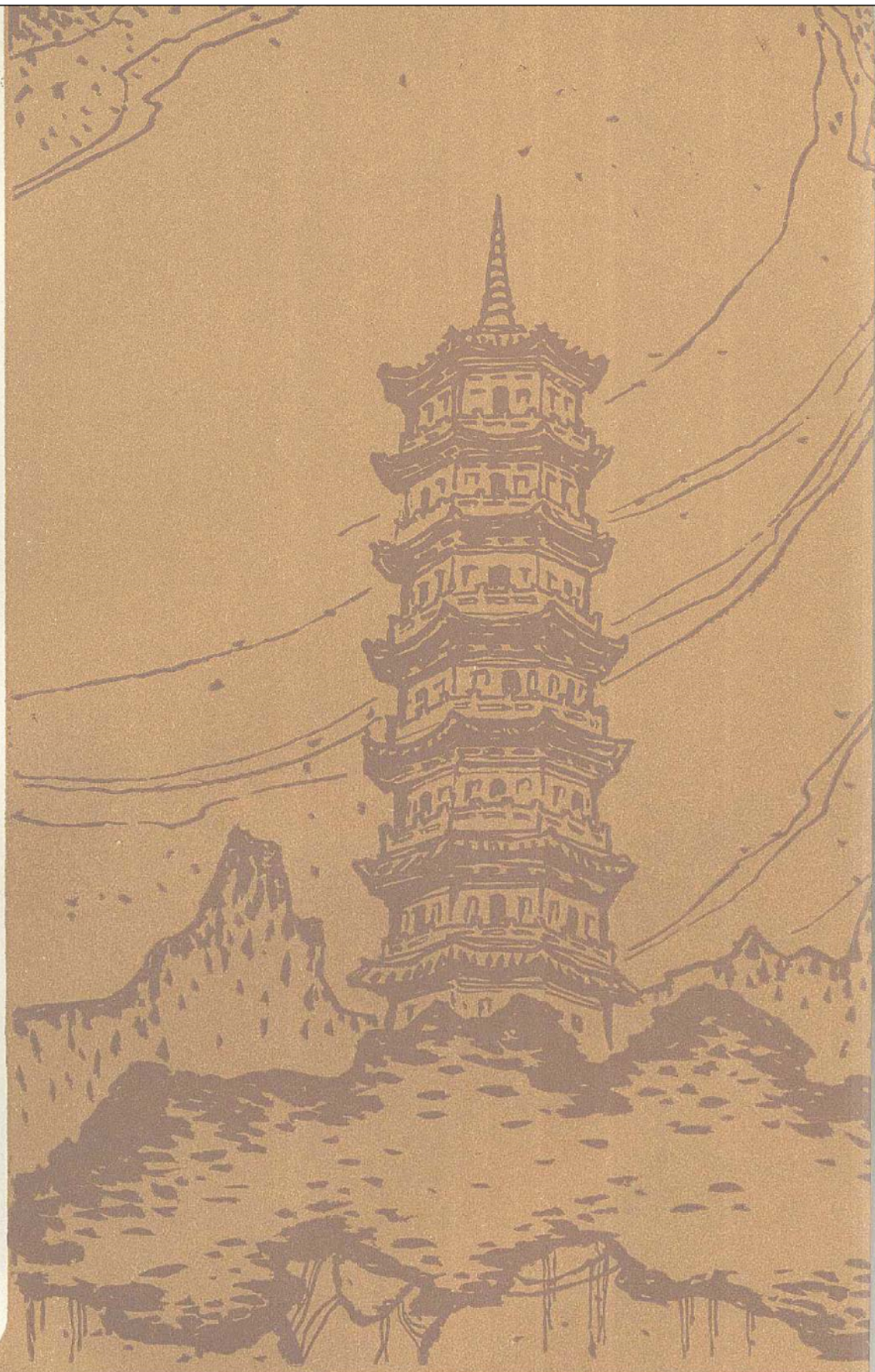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6

1985

XUESHUYANJIU

学术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五年第六期

目 录

- 必须长期坚持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的方针……………曾牧野(5)
- 从“葵乡”到纺织新城
- 新会县引进技术改造、发展工业的调查……………宣 彦(14)
- 珠江三角洲贯彻贸工农方针的几个问题……………李 中 王 境(18)
- 短期信贷银行的改革与经营……………刘士焜(24)
- 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新探……………何国文(30)
- 论家庭消费方式……………袁培树(36)
- 物质·物质文明, 精神·精神文明……………钟阳胜(40)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 略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李恒瑞(44)
- 论科学的领导观……………邹永图(51)
- 章太炎伦理思想述评……………沈善洪 王凤贤(58)
- 青年论坛 ·
- 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何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黄循平(63)
- 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
- 文艺批评方法论更新之我见……………肆 僧(66)
- 略论艺术创作信息系统……………肖 走(70)
- 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物质保证……………张孟莘(75)
-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罗一星(81)
-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钟史声(91)
- “扶桑国之谜”的研究史及流派述评……………谭世保(97)

· 开发岭南的先驱 ·

佛教改革家——惠能	陈福雄 (100)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与早期鲁迅思想	陆路 (102)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	李标晶 (109)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吴大泽 (115)
古代历法的置闰	张闻玉 (117)

· 新书评介 ·

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陈启方 (123)
“区盖”小议	吴平 (13)
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唐僧”应是康僧会	官大梁 (35)
《知新报》的停刊时间	何靖 (90)
吴承恩订补《状元图考》	官桂铨 (69)

· 学术动态 ·

全国伦理学第四次讨论会概述	(126)
本刊1985年总目录	(127)
封面设计	马丽蓉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6 , 1985)

CONTENTS

- Persisting in the Policy of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and Introducing
Technology from Abroad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Zeng Muye (5)
-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from Abroa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Xinhui County
..... Xuan Yan (14)
-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egarding "Foreign
Trade-Industry-Agricultur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 Li Zhong and Wang Jing (18)
- The Reform and Management of the Short-Term Credit Bank
..... Liu Shikun (24)
-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the
Bourgeoisie in Socialist Economy..... He Guowen (30)
- On the Mode of Family Consumption.....Yuan Peishu (36)
- Matter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Spirit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 Zhong Yangsheng (40)
-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alist Society..... Li Hengrui (44)
- On the Standpoint of Scientific Leadership.....Zou Yongtu (51)
- Commentaries on Zhang Taiyan's Ethical Thinking
.....Shen Shan hong and Wang Fengxian (58)
-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t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Was the
Material Guarantee for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Mengxin (75)

The Merchants of Fosha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o Yixing (81)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ong Shisheng (91)
Commentar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es by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on "the Mystery of the State of Fu Sang".....	Tan Shibao (97)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Thinking of Lu Xun in His Early Days	Lu Lu (102)
Mao Dun'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Li Biaoqing (109)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Yan Yu's Doctrine of "the Fusion of Language in Imagery".....	Wu Daze (115)
The Placing of Intercalation in Ancient Calendar.....	Zhang Wenyu (117)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Book Review	
Recent Academic Trends	
The 1985 General Table of Contents for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127)

必须长期坚持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的方针

曾 牧 野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作出的一项战略性决策。利用外资^①与引进先进技术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广东省对于贯彻中央的这一战略性决策，态度是坚决的、积极的，引进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确实也存在某些缺点与错误。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对外开放、引进工作“得不偿失”呢？我认为不能。为了阐明这个观点，必须对几年来广东的引进工作进行必要的回顾与评价。

引进工作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广东省这几年利用、吸收外资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总的情况是好的，一年比一年好。

1979年9月—1984年底，引进的合作经营项目1734宗，合资经营项目853宗，“三来一补”项目三万多宗。以上合计，共吸收、利用外资19.2亿美元（占这期间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41亿美元的45%）。这19.2亿美元的资金构成是：投向合作经营项目的9.53亿美元，占50%；投向合资经营项目的1.93亿美元，占10%；投向“三来一补”项目的8亿多美元，占40%。

五年来，利用外资的各类企业共创汇8.7亿美元，其中“三来一补”企业创汇8亿元左右，约占全部创汇额的91%。可见，在广东城乡星罗棋布的来料加工装配小企业所发挥的经济效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乡村的来料加工装配企业很多，它不仅提供了城乡的就业机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改革，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先进技术的引进，一般说来是伴随着外资的引进而进行的。对于资本输出国来说，在输出资本的同时，总想同时输出商品。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利用、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是能同时得到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才有利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所以吸收外资要结合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1984年底，全省吸收外资总额19.2亿美元中，用于引进技术、设备的价款约占一半，即10亿美元左右。10亿美元的资金构成是：用于合作

经营项目的设备价款占4.81亿美元；用于合资经营项目的设备价款占0.39亿美元；用于补偿贸易项目的设备价款占1.66亿美元；用于来料加工装配项目的设备价款3.55亿美元。

五年来，我省引进的各种设备超过50万台（套）；另外还引进728条生产装配线^②。引进的设备、技术遍及城乡各行各业。通过合作经营项目引进的设备，多数用于旅游业与高级宾馆的建设和改造；1984年以来，合作经营、合资经营的生产性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显著增加，这是好现象。生产性项目多起来了，说明我们的引进工作越来越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经济效益是好的，据佛山市的测算，近几年来每引进一美元新技术、改造老企业以后，平均年创产值达10元（人民币）、创税利2元多。

这些年来，广东的引进工作有如下的几个特点：（1）合作经营项目多、比重大、行业广，这是我省利用、吸收外资的一种主要方式。（2）用于发展第三产业的投资数额大。1979~1984年底，我省引进的合作经营和合资经营项目实际投资额11.46亿美元，其中约有6~7亿美元用于第三产业。（3）港澳同胞、华侨客商投资的项目多，据1983年有关部门的统计分析，这方面的投资项目约占全省引进的外资项目的85%，例如广州市近年建成的白天鹅酒店、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都是港商投资兴建的。（4）1984年的引进工作有长足的进展，不仅新签的合同数大大增长，而且投资数额较大，投资500万美元的项目有130多宗；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额高达6.5亿美元。这情况是由于：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稳定，世界各国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侨日益信赖我国的开放政策；二、国内的投资环境逐步有所改善；三、外经工作提高效率，增长了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几年来我省引进工作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引进工作的效益，总的说来就是增强我省自力更生、加快经济发展的能力。具体分析，它表现在下述的几个方面：

（一）促进我省工业生产，特别是电子工业、纺织工业、服装加工业、塑料制品工业、食品工业的大幅度发展，为全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新会涤纶长丝厂的建成与投产。新会县原是一个葵乡，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82年通过引进工作建成这个全国最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涤纶丝厂（拥有年产五千吨涤纶丝的生产能力），使这个县逐步成为我省一个新的纺织工业基地。这个厂是与香港商人合办的，引进西德、法国等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先进技术、设备，实行自动化生产，劳动生产率很高，投产当年该厂产值高达一亿元，上缴税利二千万元。估计办厂三年就可全部收回投资。近年来，该厂带动全县办起30多家与化纤、纺织生产有关的工厂，新会人正满怀信心地将昔日的葵乡改造成为一个新兴的“纺织城”。再说佛山市，这几年的引进工作目标明确，把引进新技术与改造老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工业企业原来约有70%的设备都是五十年代前的，经过引进以后已使53%的设备达到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特别是电子行业发展迅猛，1984年该市电子工业产值已跃居全国的第3位。再说，我省轻工行业，通过引进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与

花色品种，而且增强了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全省近年来开发了软包装饮料、纸板电池等97个新产品，并制造220种优质名牌产品，获得国家、轻工业部以及省的赞扬和认可。

(二) 促进农牧渔业生产的发展。这几年我省引进了大批良种以及有关的先进技术、设备，增强了农业产品的出口能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光明华侨奶牛场的变化。这个建于1958年的农场，自办场以来年年亏损，最多的一年亏损200万元，但是1979年以补偿贸易方式从新西兰引进一批良种奶牛以及先进的饲养技术、从瑞典引进先进的挤奶设备以及奶品加工技术以后，并组织奶制品出口，变亏为盈，该场的鲜奶质量好，打入香港市场，其出口量占香港鲜奶市场的70%，从1981年到1984年共盈利一千多万元。

(三) 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港商合作经营广州市小车出租项目，经济效益好，不仅解决城市“坐车难”问题，而且国家、企业、我方职工以及客商均有得益；再如，我省近年来建好10座公路桥，耗资巨大，也是通过引进、与港澳商人合资兴办的，解决了广州与深圳、珠海等地的货运客运等方面的困难，改善了我省引进外资的投资环境。

(四) 促进了旅游业以及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外资新建或改建一批高级宾馆，增强了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1978年广州市可接待国外旅客的床位仅五千多张，到1988年已增加到一万三千多张；1988年全省共接待国外旅客155万人次，其中外国旅客为84.5万人次，仅旅游系统的营业收入高达4.4亿多元，比1978年增长18倍。1981~1988年底，我省旅游部门创汇6亿美元，三年间旅客从我国银行兑换出的外汇券高达27.9亿元。

(五) 促进了我省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我省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提高认识加强指导使引进工作更加健康地发展

今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工作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呢？从广东的实践经验来看，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不是权宜之计的“救急”措施，而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实行下去的基本方针。党中央领导同志已多次阐明了这个观点。因此，要使引进工作更加健康地发展，我认为首先要解决这一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问题。要解决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就得首先解决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济学界许多同志多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这个方面去解释，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要加快建设，又受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诸因素、条件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有局限性，这就是说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方针、政策是建立在“经济技术暂时落后”论的基础上。如果经过努力、到了一定时期，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技

术水平提高了，各方面的管理工作也上轨道了，是否就可以抛弃“对外开放”政策、重新回过头来搞“闭关锁国”呢？显然不能作出这样的理解。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越是注意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等等。我认为应该从当代世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从当代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化国际化的特点来解释这一经济现象。当代世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必须具备五大要素：资金、劳动力、资源、技术、市场；可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全面地具备这五大要素。要加速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必须或多或少地依赖与别国或别的地区的经济联系，而这种经济联系一般是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的。故此，通过国际交往、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来获得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继续发展的某些条件，就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其实这个观点，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作了原则的阐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⑩这段话，说得好极了。世界性的国际交往，正是在当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由社会化、国际化的大生产以及日益发展着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1984年十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计划商品经济，这是符合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正确论断，同时也是我国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继续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说，要搞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就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搞闭关自守，而必须走向世界，把对外开放的方针长期坚持实行下去。在对外开放的实际工作中，难免产生一些缺点或失误，我们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惊慌失措而动摇我们继续前进、走向世界的决心和步伐。社会主义经济既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开放的社会。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这个认识问题。这是继续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做好引进工作的前提条件。

二、进一步明确引进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应该依据我国或我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确定我们的技术引进方针。这些年来，在经济学界和经济部门实际工作者中间，对于我国应该引进什么类型的技术，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或我省）经济技术落后，工人素质不高，应该着重引进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设备，一来容易掌握、消化，二来可以安排比较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严重的社会就业问题。另一种意见则反之，认为应该着重引进世界上先进的或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加快我国经济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如若按照前一种意见办，将使我们国家永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我认为这两种见

可以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应该根据本地区不同层次产业结构的不同要求，引进不同类型、层次的技术、设备。最近广州市外经委提出如下的设想，我认为值得借鉴、参考的。

广州市把轻工、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行业当作一个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适应这个层次的要求，拟多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技术、项目；把机电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等行业当作第二个层次的产业结构，适应这个层次的要求打算多引进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项目；把电子工业、家用电器工业以及某些正在发展的新兴工业，当作较高的第三层次的产业结构，为了适应这个层次的要求，计划今后多引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项目。

有了这样的设想，就有利于我们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作出比较科学的全面的引进规划。

(二)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方针，要从过去的以进口设备为主逐步过渡到引进技术软件为主。

广州市对几年来的引进工作作了分析，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A、以引进技术软件为主，例如广州啤酒厂，去年引进丹麦嘉士伯酿造技术，同时进口啤酒包装自动线、售酒机、啤酒碳化处理设备，引进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又如广州电梯厂，引进日本国日立电梯技术软件，包括全套技术图纸等。B、进口设备与引进技术软件并重。与法商合资经营的广州汽车厂，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广州美食公司，与港商合资经营的广州晶莹灯饰公司，属于这类情况。C、基本或全部进口设备。广州市的纺织行业、针织行业、食品工业几年来引进的东西大部分是设备；近年来广州引进两条电冰箱生产线以及广州造船厂引进的集装箱生产线，也属于这类情况。据广州市外经委分析，近几年的引进工作，多数是属于第3类情况，即以进口设备为主。实践表明：进口设备为主，虽然可吃“现成饭”，引进了马上可以用，但是费用高、花的外汇多，而且对于我国的技术进步无多大裨益。必须逐步过渡到以引进技术软件为主。技术软件，包括技术专利、技术诀窍、技术图纸、技术知识、技术服务咨询等等。广东沿海开放地带，包括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更应率先带头引进技术软件，来提高这一地带的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益。

进行这一工作，首先要依靠国内外、省内外的科技咨询服务机构，提供信息，请教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其次，要运用经济杠杆，在资金信贷方面给予优惠贷款、外汇使用方面也要给予照顾、扶持；再次，要注意对我方的技术人员和职工进行技术培训；第四，技术软件（包括某些关键设备）引进后，要立即组织攻关，掌握其技术性能，使之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 要下决心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推广工作，这是引进工作成败的关键。单纯依靠购买成套设备、甚至大量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是实现不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这一艰巨任务的。我们应该觉悟到这一点：引进是手段，消化、吸收、推广才是目

的，才能把人家先进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技术装备，尽快地缩短我国与世界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过去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有认识上的原因以及经验不足等等，但是也有工作上的实际困难，诸如没有专门机构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某些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没有专项研究资金和力量进行研究；我们国家尚未制订技术成果有偿转让的法规，不利于调动有关企业和科技人员的研制积极性；近年来，在实际工作中不重视发挥机电、机械工业作为国民经济装备部门的作用。最近，广东省人民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讨这一工作，提出要制定三年规划，明确重点，定项目、定任务、定人员、定资金、定鼓励措施等。（参见1985年7月28日《南方日报》）对于某些技术消化吸收做得较好的企业要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三、办好合作、合资、外资独资企业必须解决的若干具体经济政策问题

据调查，广东省、广州市要进一步办好“三资”企业，存在若干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有待解决：

（一）广东省这几年搞了不少的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但无法可依，国务院前几年只制定、颁布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至今尚未颁布关于合作经营企业的法规、条例。在实际工作中，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碰到一些困难。特别是关于税收，普遍反映税率的偏重。除我省经济特区、海南岛、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内的合作经营企业可以享受按15%征收利润所得税外，其他地区的合作企业，均按《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征收分级累进税。合作企业与外国企业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按外国企业税制征收，而且不考虑各该企业利润率大小而按统一的税率征收，似不大合理。外商反映：投资越大，得利越大，税率越高，不合算，因而不愿投资兴办大型的生产性合作经营项目。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占总投资额的比例，不明确，对外经济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一些困难。上述《条例》明确肯定外商总投资额包括注册资本与借贷资本两部分，但有关部门却认为外商的注册资本应与投资总额相等，省外经部门虽然提了意见，至今未改过来。注册资本占投资总额多大的比例，涉及中外双方的经济利益问题，如果比例定得太小，则不能达到我方利用外资的目的，反而可能出现外商投资额小、主要依赖我国贷款来我国办企业的不合理现象；如果比例定得过大，则不利于吸收外商前来投资办厂。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于合资企业产品内外销比例、产品定价原则，也不明确。这也是涉及中外双方的经济利益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有必要得到解决。

（三）关于外资独资企业，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颁布法规，以利于进行管理、监督。对于引进外资独资企业，有利的方面主要是：A、外资独资企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富有竞争能力，一般会多考虑采用先进的或最先进的技术、设备，通过引进独资企业我方可以了解或掌握到一定的先进技术；B、可以学到一些西方管理企业的方法、经验，为我所用；C、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土地使用费、管理费以及劳动保险金等方面的财政收入。但是也存在着怎样管理的问题，即我方难于了解、掌握独资企业进口原料价格

及其产品出口的销售价格，因而难于核准其应征收的税收、费用，难于防止、克服这类企业偷税漏税行为。其次，进来办独资企业的外商会根据“以先进技术换市场”的原则，提出产品内销比例的要求，内销比例多大，也是一个十分复杂、难于掌握的问题；如果允许其产品内销比例大一些，将会碰到外汇难于平衡的矛盾。故此，对于引进这类企业，可以试办，在方针上应持慎重态度。广东经济界在讨论中提出一些带方针性的意见，我认为值得考虑、研究的：

1. 凡是符合近期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行业（主要指食品工业、电子工业、家用电器工业、纺织工业、服装加工业、日用化工工业、中成药工业、建材工业、包装工业、基础工艺等），可以考虑引进若干个外资独资企业试办；

2. 凡是有损中国主权的，或违反中国法律的，或能源消耗大、造成环境污染的；引进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其产品出口又要挤占我国出口配额的，不予以批准；

3. 内销比例，应严格控制；

4. 国内要保证这类企业的能源供应要求，不能停电停水；

5. 要有相应的法规与具体政策。

四、加强管理，实现外汇收支平衡

就广东省的情况来看，“三来一补”企业一般不存在外汇收支平衡问题，因为其产品主要是外销。发生外汇收支不平衡的企业，主要是中外合作、合资经营企业。佛山市几年来利用外资的工作做得较好，但外汇收支平衡也出现50%的缺口；深圳特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困难。发生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1）有些引进企业的产品质量不高、规格不合要求，不能外销；并由外销转内销。（2）有些企业的外商，没有履行合同、按期投入资本；有的是合同本身不完善，没有写明外商投资的实现期限，外商钻此空子，迟迟不投入资本。（3）广东省、广州市有不少与外商合作经营的饮食业、维修业或交通服务业，原来依靠收外汇券来取得外汇收支的平衡，但以后这类企业多起来了，收券率大幅度下降；加上有些企业难于全部收外汇券而兼收人民币，这也增大了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的缺口。造成外汇收支不易平衡的困难，还有另方面的原因，即（1）有些地区、单位，出于牟利的目的，动用国家大量外汇，进口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的日用消费品；（2）外汇市场管理放松，出现了炒卖炒买外汇的黑市交易，外币汇价急剧上涨，扰乱了外汇市场。今后，随着“以市场换技术”原则的贯彻、外引企业的产品内销的品种、范围将会扩大，如何实现外汇收支平衡问题将会显得更加突出。

针对上述情况，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节流、开源、加强外汇的管理。

所谓节流，就是要通过对引进项目的审批，用好外汇。哪些项目、设备该引进，哪些项目、设备不该引进，要符合四化建设的要求，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广东省以及广州市几年来的初步经验，进口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引进的设备、技术、项目，要有利于改造国内原有的老企业，促进各行业的技术进步；（2）兴办新工业所需

要的先进设备与零部件；(3)国内不能供应而加工出口又急需的新型优质原材料；(4)农牧渔业方面某些急需而国内又不能供应的生产资料；(5)国内急需的而国内又不能生产的某些日用消费品。哪些商品不进口或少进口呢？凡是自己能制造的设备，就不进口；凡是进口关键设备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进口成套设备；凡是引进技术软件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进口设备；凡是国内能自己生产、供应而且质量基本过关的日用消费品（如香烟、饮料之类），就不进口洋货。在处理进出口贸易以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借用对外开放之名，巧立名目，套购国家限制出口的物资，或大量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商品、物资，应严格禁止。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引进外资的投资方向，重点引进技术密集型、生产型、创汇型的项目。1984年按外商投资金额下放审批权，分级审批，看来不易管得好（出现分散主义倾向），今后是否改用按商品目录分类分级审批的办法，似可考虑。

所谓开源，就是增加出口，增强创汇能力。要增加出口，在广东来说，除了办好三个经济特区外，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就是建设好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珠江三角洲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达；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再加上海外华侨众多，毗邻港澳之地利，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广东省的商品出口基地。要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的这一优势，必须遵照中央的指示，认真贯彻贸——工——农的生产建设方针，即根据外贸出口的需要，调整、改革这一地区制造业加工业的产业结构；然后再据此确定农业生产什么。总的精神是，必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适销对路的出口商品，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工农业生产结构。

要增加出口，还涉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外贸体制改革问题。外贸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调动从事外贸出口生产任务的工农企业的生产与创汇的积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必须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处理外贸生产企业的外汇留成比例问题，在银行贷款、供应原材料、供应能源等方面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物质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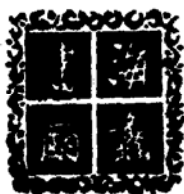
统一对外，加强管理。当前除了加强对引进项目的审批工作外，必须加强外汇的管理，坚决打击黑市炒卖炒买外汇的非法活动；对于利用对外开放而进行违法乱纪的事件，要认真查处，严重的要绳之以党纪、政纪、法纪，以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对于动用大量外汇进口国内能够进行生产、质量又基本过关、国内可以供应的日用消费品的经营活动，要加以制止。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涉及计划管理部门、生产主管部门、科研设计部门、外贸部门、财政金融部门等，涉及生产技术、商务活动的一系列问题。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似有必要成立一个外资管理与协调委员会的机构，便于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和管理，使这一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① 这里说的“外资”，包括外国资本、港商资本、华侨资本等方面。

- ② 1979年~1984年底，广东省还用自有外汇6亿多美元，引进一批先进技术与设备。这里说的引进50万多台（套）设备和723条生产装配线所动用的外汇资金，也包括地方自有外汇6亿多美元在内。
-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于广州。



“区 盖” 小 议

吴 平

“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荀子·大略篇》）《荀子新注》（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释“区盖”说：“区，区别，指明确可信，即信之。盖，大概，指不明确可信，即疑之。”（见该书470页）案：“区盖”是联绵词。联绵词的意义是通过二字的音节来表达的，不可拆开来解释，这一性质又决定了联绵词的书写形式自由，只要音同或音近，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因此解释联绵词必须因声求义，拘泥于书写形式就会望文生训。“区盖”的另一书写形式是“丘盖”，《汉书·儒林王式传》：“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注：“苏林曰：丘盖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知为丘。”苏、如二说较接近原意。但是据上下文义，当解释为“存疑”为是。区，上古属溪母侯部，丘，上古属溪母之部，区、丘双声而韵旁转。盖是一语词，纯属凑一个音节。区、丘二字在古籍中也有通用的例证。《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汉书·艺文志》作“鬼容邱”（邱与丘为异体字）。

从“葵乡”到纺织新城

——新会县引进技术改造、发展工业的调查

宣 彦

一座纺织新城的崛起

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新会县，素有“葵乡”之称，葵类作物的种植和加工，已有一千多年历史。1988年，县属的葵类加工场仍有18家，从业人员达3600余人，在全县的工业当中，一直占据着首要的地位。

可是近几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兴的工业——化纤纺织工业，正以非凡的气势迅速崛起，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取代了昔日遍布县城的葵类加工场。这个新兴工业目前已经建成投产的，包括年产1000吨的丙纶厂、年产5000吨的涤纶、年产700万平方米的弹力呢织造厂、年产150万米的工业用布织造厂、年染整能力1500吨的针织印染厂、年产720万平方米喷胶棉的无纺布厂等26家。此外还有40多家服装厂分布在全县城乡。主要产品有弹力呢、华达呢、装饰布、塔夫绸、蚊帐布、针刺布、喷胶棉、工业滤布、化纤地毯，以及各款时装针织品等。化纤纺织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680万元，激增到1984年的2亿6千万元，占了当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的近四成。这一变化，彻底扭转了该县长期以来，由于工业结构不合理，设备陈旧，工业落后，企业素质低下所造成的竞争乏力经济萎缩的被动困境，出现了“两纶兴百业，细雨润芳春”的喜人局面，经济发展蒸蒸日上。198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6亿8100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1.27倍。三年时间就翻了一番，成为广东省五个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0亿元的先进县之一。

综观近几年新会县工业生产的发展，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整体规划好。他们不是一哄而起，盲目上马，也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而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抓住纺织工业这个重点，有计划、有目的地调整工业结构。他们最初上丙纶、涤纶厂时，调查掌握了全国同类产品的年产量、进口量、消耗量、库存量的准确数字，证实确有发展前途便铁心干下去，并以这“两纶”为“龙头”，连藤结瓜，发展配套企业，建起了一个化纤、棉、麻、毛、蚕丝俱全，拥有纺、织、染整、印花、缝纫等连续生产手段的纺织系统，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形成较强的生产能力，一跃成为广东省新兴的纺织工业基地。

二是产品的竞争能力强。目前该县生产的涤纶、丙纶长丝和纤维布料、纺毛织物等产品，由于质量高、消耗低、花色品种多样，价格合理，受到广大用户欢迎。丙纶长丝获省四新产品一等奖和纺织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涤纶、丙纶长丝，1984年产量分别为5212吨和1200吨，都超过了原设计能力，仍然供不应求。其中涤纶厂1984年一年就创税利2615万元，人均8.88万元，投产一年半，已偿还基建贷款总投资的62%。

三是发展后劲足。几年来，该县的经济一直在稳步上升，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1985年，随着又一批重点企业——锦纶长丝厂、染整印花厂、化纤地毯厂、色母粒厂的即将建成投产，和拉链、铸造、凉果等厂实现了工艺改革，他们估计工业总产值有可能突破8.5亿。目前，原定计划引进的先进技术项目18个、改造老企业15户，已全部投入筹建或施工阶段。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新会县工业的腾飞，奥妙在哪呢？

把钢用在刀刃上

用新会县委同志的话来说：“养鸡下蛋，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到技术改造、发展生产上”，这是新会县工业起飞的奥妙之一。

我们国家是在比较贫困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我们的建设资金有限，外汇有限。如何使用这有限的资金？是求急功近利，拿着大把资金倒卖进口物质和紧俏商品，牟取暴利？还是图长远利益，集中资金用于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打好生产基础，争取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新会县委比别人“棋高一着”，就在于他们坚决抛弃前一种做法，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国家要真正富强，人民要真正富裕，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依靠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物质财富来取得。单纯靠进口外国货发“洋财”，只能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因此，近三年来，他们把通过各种渠道、办法筹集到的2亿7000多万元人民币和6000多万元美元的外汇，全部用于县属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进行全县企业大调整。他们首先把原材料来自农村，以手工作业为主的葵类加工业果断地下放回农村去让区、乡经营，将原有的18家县属葵艺厂场进行统一规划、全面安排，改造成为崭新的纺织化纤企业。同时，又将耗能大、效益低、产品滞销的磷肥、氮肥厂转轨变型，分别改造成工程塑料厂和锦纶厂。

二是进行原企业技术改造。这方面因厂而异，不拘一格。有产品升级换代的，例如拉链厂，由生产老一代的金属拉链变为生产尼龙拉链；有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的，例如铸造厂，从西德引进一条无箱水平射压造型线，大大提高了机械铸造的工艺水平；还有改造传统产品、开发新产品的，例如农械厂，为适应当前土地承包的需要，不断改进手扶拖拉机的技术性能，该厂生产的“工农——12K型”手扶拖拉机已打入国际市场，新产品“金凤——4型”手扶拖拉机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通过技术改造，一批企业发展壮大起来，不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更重要的是为全县今后进一步扩大

再生产，振兴经济，实现全面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过程中，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新会县十分注意在“准”和“省”两个方面下功夫。在制定规划、选择重点时，他们始终坚持科学性，避免盲目性，不搞“一窝蜂”。没有因为许多地区和县份搞家用电器取得成功，也急急忙忙去赶时髦，挤一份，而是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的宗旨，选中了化纤长丝生产这个省内的空白项目，全力以赴地一抓到底。结果既避免了同“左辟右舍”互相挤拥，又取得了省政府在财力、技术上的支持帮助，较顺利地打开了局面。在新工程上马后，他们围绕投入少、产出多的目标，在求好、求快、求省上采取措施。例如，这几年用以兴建新项目的80多万平方米土地，绝大多数都是旧企业腾出来的，大大节省了征地的费用和时间。又如，他们每上一个项目，就建立这个项目的责任制，由县委或县政府一位领导成员牵头，协调有关部门，统一调配人力、财力、物力，减少扯皮。还有，他们实行了分段承包工程，重奖重罚，坚持工程施工与操作培训同步进行等。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尽可能提高效率，所以上马的项目虽多，却没有出现“胡子”工程，基本上都能一次试产成功，从而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瞄准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在技术改造中，新会县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就是起点要高，要跨过技术发展常规，把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这又是新会县工业起飞的另一个奥妙。

近年来，新会县先后引进的16个技术项目，大部分都属于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品类。例如涤纶厂引进的紧凑型高速纺织生产线，每分钟喷出的长丝达4500米，属当今世界一流水平。丙、涤纶两用纺牵联合装置，则是国家“七五”规划的重大技术消化吸收项目。又如无箱水平射压造型铸造线、色母粒生产线、纸筒管自动线、电容薄膜生产线等，都是我国第一套引进项目。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企业一开始就占有技术上的优势，收到投资省、消耗低、竞争能力强的效益。

新会县的同志在实践中有这样一条体会，引进先进技术对于促进企业的现代化固然很重要，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对引进技术的使用、消化、吸收以至开发、创新。当初，他们引进涤纶厂的西德先进设备时，有人编顺口溜说：“引进技术设备好是好，好在几个外国佬，外国佬一走，问你怎么办？”而后来的事实是，新会县的同志并不以“外国佬”为保姆，涤纶厂建成后，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自己操作，一次试产成功，连在厂的外国专家也感到惊讶，为之赞叹！现在，这个厂生产的产品优秀率稳定在95%，创造了同类设备在其他国家所未达到的新水平。

实行先进的管理方法是使先进技术的效用得以正常发挥的基本保证。因此，新会县还把改革管理制度作为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一环来抓。以涤纶厂为例：该厂在建成投产的同时，便结合生产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对工艺、设备、成本进行严

格的监督。全厂设生产技术科、经营管理科、行政管理科和办公室，行政人员只占全厂780多名职工的百分之七点五，从生产、经济管理系统，到车间领导人，大部分都是由技术人员或经济专业人员担任。在分配上，实行金额浮动工资制，打破“大锅饭”，这一切都有效地调动了全厂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该厂自1988年投产以来，先进设备一直保持正常运转，并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效益。

关键在于育才、用才

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在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个命题里，人同样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县、一个企业也好，如果没有足够的各方面人才和训练有素的工人，想实现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这是新会县这几年实践中的深刻体会，也是他们工业起飞的关键性因素。近几年来，他们始终把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首先，他们舍得花本钱、下功夫，以抓经济那样的劲头抓教育。从1979年开始，六年来，全县共集资4460多万元，新建、扩建、更新中小学校819所，占学校总数78.3%，建筑面积达24万多平方米，基本上做到校舍楼房化、校园绿化美化。一些侨胞回乡参观，高兴地说：“新会县的许多学校可以同欧美的乡间学校相媲美”。

其次，以较优惠的条件向外招聘人才。对于应聘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属于助理工程师以上或具有同等职称者，由经委按户拨给住宅建筑补贴费15000元，不足部分由接收企业补齐。家属工作安排、子女转学等问题均予以解决。

第三，抓好企业职工文化技术的培训。几年来，新会县坚持用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办法来招收新职工，并以足够的时间进行入厂培训，以提高政治素质和技术知识水平。1984年，他们拨出100多万元专款，除办好县工业学校这个培训基地外，还与省纺织学院和华中化纤学院挂钩，请他们帮助培训技术管理人才。涤纶厂新招考录取的480名高中毕业生，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中学习七个月，进行政治、纪律、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教育。厂里还规定，凡通过自学，取得中专、大学毕业证书的，获300至500元奖金；考上工程师的，住房优先，奖价值2000元的一套家私。这大大激发了干部职工学习文化技术的积极性，全厂职工参加电大、函大、夜大等各种学校学习的达75%以上。这些措施，已初步显出了成效。过去县城里从事手工编织的葵业工人，现在大多数都成了掌握现代化技术的纺织工人。其中不少人，通过刻苦学习和锻炼，已成长为化纤纺织企业的骨干和尖兵。例如丙纶厂的年轻厂长李沃群，原来就是晒葵场的青工，经过勤奋学习，勇于进取，终于把化纤技术学到手，成了企业的领导人。

珠江三角洲贯彻贸工农方针的几个问题

李中 王境

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中央继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之后，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重要步骤。中央在决定中指出，沿海经济开放区，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一样，是我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桥梁，进出口的重要基地。经济开放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筛选，移植国外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方法，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繁荣国内市场，更要面向世界发展出口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创汇能力，以适应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需要。

中央要求，为了加强创汇能力，沿海经济开放区应抓住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增长较快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按照贸——工——农，即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从出口需要出发安排生产。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搞农——工——贸。

贯彻贸工农方针，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本文仅就初步遇到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贸工农方针是促进商品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针

贯彻贸工农的方针，是不是重贸轻农，降低了农业的地位呢？

贯彻贸工农方针，就是要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这不是重贸轻农，而是把开放区农业的商品生产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这样说是因为：第一，指商品生产，就必须根据市场需求，而不考虑市场需求，生产什么就卖什么，则是自给半自给经济的特点。所以，从生产什么出卖什么，到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这是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质变。第二，从只满足本地区、本部门的需要，到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也是一个大的转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前进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已逐步出现新的国际分工协作，形成了新的国际经济联系。在此情况下，商品生产和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从闭关锁国发展到参加国际间的分工和交换，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

同时，还要看到，贸工农方针，使开放增加了新内容，把农业的引进和技术改造提上了日程，要求农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贸工农的方针，珠江三角

洲将建设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基地,食品工业、饲料工业、轻纺工业产品的出口基地。要达到这个要求,不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是不行的,不下功夫改造农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行的。

所以,贸工农方针,是促进农业起飞的方针,它不仅不会降低农业的地位,相反,它是解决农村工业发达地区农业萎缩的正确途径,是振兴农村经济,建设富裕经济区域的正确途径。

二、研究港澳市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出口经营战略

珠江三角洲的出口贸易是以港澳市场作为最主要的目标。为此,必须认真研究香港市场的特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经营战略。

对港澳市场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任务,现仅根据初步接触到的材料谈一点看法:

1. 港澳的农产品主要靠进口。如香港10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580多万常住人口,还有一年280多万人次的流动人口。人口高度密集,寸土如金。农业用地很少,88%的食物靠进口,工业原料也都靠进口,这是一个十分广大的农产品市场。

2. 港澳是个自由贸易港,竞争十分激烈。香港除烟、酒、甲醇、汽车用燃料油之外,其它商品都可以免税自由进口,资金外汇可以自由兑换和进出。来香港作买卖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水果就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在港澳,竞争的程度要比一般资本主义市场激烈得多。

3. 港澳是个高消费的社会,对产品质量要求高。近年来香港人平收入增长很快,1976年到1984年,每个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1,988港元上升到5,100港元,占亚洲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因此,在消费上日益讲求优质、名牌和最佳服务。香港人讲求饮食之道,食品力求精美,并有西化的倾向。对含低脂肪、高蛋白,味道鲜美的海产品消费量日益增大。现全港年销售海冰鲜18万吨,活虾2万吨,活海鲜3500吨。海产品年销售金额达2亿到3亿美元。一些优稀偏商品供不应求,如全港每年吃蛇80万条,青蛙1500吨。还有,在香港市场上,商品的品种繁多,质量不一,价格各异,所以,市民对商品的选择性很强。

4. 港澳人的生活节奏紧张,要求选购商品方便,要求半制品、加工品上市。1984年,香港供应方便面条2.4亿包,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从商品另售超级市场化,也可看出这种趋势。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品种齐全,标价清楚,便于比较选择,许多商品都可一次购买节省时间。据统计,1980年4月有超级市场219间,1982年4月增至393间,平均3100户有一间(总户数120万)。1985年将达到630间,平均2200户有一间(总户数136万)。同时,每间超级市场的营业额也不断增长,在1980到1984年间,平均每年增5—10%。

上面,我们分析了香港市场的特点,那么珠江三角洲对香港出口的现状又如何呢?

珠江三角洲历来是我省的商品粮基地,经济作物的重点产区,对港澳出口农产品的基地。塘鱼淡水杂鱼、蔬菜、香蕉、荔枝的出口量,占我国对香港出口的绝大部分,生丝、

优质大米、活猪、三鸟、柑桔，也占很大比重。但近来我省农产品的出口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蔬菜，过去占香港总销售量近一半，1984年只占88%，销售金额只占26%。再以水果为例，香港是有名的水果市场，每年输入水果达89万吨，人平74.2公斤。远隔重洋的美国水果占了整个市场的51%（销售量）。近在咫尺的岭南佳果之乡——广东四大名果却被挤出香港市场。橙是香港水果市场的主要品种，1984年进口值6.15亿港元，占香港水果入口总值的38.44%。美国新奇士橙占有了市场，占橙类进口的98.1%，而我省的新会橙、罗岗橙，仅占入口值的0.71%；柑，1984年进港值0.78亿港元，以台湾省产的柑最多，占52.4%，我内地占46.9%。香蕉，1984年进港值0.89亿港元，菲律宾蕉占了垄断地位为77.4%，我内地香蕉仅占8.54%。荔枝是我输港拳头产品，1988年销6,489吨，占全港总销量的88.7%，但不稳定，1984年下降为2,557吨，占全港销量39.4%，而台湾省占到全港总销量的62.4%，跃居第一位。菠萝市场为台湾所占据。岭南木瓜我无货供应，市场为泰国所取代。广东水果1956年曾有16万吨销往香港市场，1984年降到2.52万吨。

我出口农产品不仅销量减少，售价也被压低。1985年第一季度我输港蔬菜每吨平均售价1,704港元而美国蔬菜为6652港元；水果每吨平均售价2,842港元而美国水果为6,107港元；活大猪每头平均售价616港元，而港产猪每头1,000港元；我出口活鸡平均每只14.8港元而港产鸡为28港元；大米平均每吨售价2,400港元而澳洲米为4000港元。差距之大，十分惊人。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就是不适应香港市场特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根据香港市场的实际，制定出正确的经营战略。

我们认为，我们当前的经营战略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优质、均衡、创新。

优质，以质取胜。过去那种只求温饱，重数量不讲质量的指导思想，作为贫穷落后地区生产自救的方针还可以，作为商品经济的指导思想在国内都已行不通了，何况香港市场。提高质量不是绝对的东西，它是由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兴趣，商品的用途而定的。另外，国际市场上的质量概念，有的已不是我国现有产品的好一点或差一点的问题，而是现有产品的升级换代问题。同时，它不仅涉及产品本身的质量，而且还包括保鲜问题，包装、装璜问题，精加工和深加工的问题，商品的标准化的问题等。

均衡，商品上市量要均衡、适量，特别是食物。均衡就是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来适当掌握商品投放量的问题。做到人无我有，人少我多。人家的东西多了怎么办？如市场已饱和，那就要看我商品的竞争能力和开拓能力了。如果我多了，我已占领了市场，那就更加要求均衡。忽多忽少，都对我不利。要做到均衡适量的投放，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是科学技术和生产上的改进。农业生产是季节性的，而人的消费是每日每时的，只要在种植上反季节，作到淡季不淡，旺季不滥，或解决好保鲜、储藏问题，就能使供应均衡，人无时，我有，人少时我多。一是从销售业务上努力做到灵活、机动，放得出去，控制得住。

创新，在增加花色品种上下功夫。吃的，喝的，观赏的，都还有市场可以开拓。珠江三角洲开放区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加工能力。开放区还有广大的后方，山上的，海里的，资源非常丰富，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

三、改革外贸体制，提高对外贸易的竞争能力

现行的外贸体制是同贯彻贸工农方针不相适应的。外贸专业公司只管收购，收到什么出口什么，收到多少出口多少，农民只管种田，生产什么就卖什么。农民分散经营，交售的商品也形形色色，没有统一规格，使产品缺乏竞争力。

外贸体制的选择要着眼于调动外贸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两个积极性结合起来，积极采用新的科技成果，提高产品质量，为开拓出口市场而努力。

但要明确，贸工农不是不要社会分工，不是一哄而起全民搞外贸。贯彻贸工农方针，还是要外贸专业公司。特别是当前，在世界各国对外贸易迅速向集中方面发展，国际垄断组织日益扩大，国家干预加强，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货币汇率变化极快的情况下，不加强外贸经营机构就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剧烈竞争。外贸专业公司是外贸的主渠道，但不是独家经营，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化程度也比较低，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的情况，我国产销结合的形式不能一刀切，对外贸易的经营也应是多层次多方式的经营结构。因此，我们认为外贸体制的改革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国家统制的原则，由国家统一制订对外贸易的政策法令和行政管理措施。外贸部是国家对外贸进行管理的部门，一切外贸公司（包括原有的外贸专业公司，近几年成立的由部门和地方领导的公司，和今后将大量发展的工贸、农贸结合的企业），都应接受它的领导和管理，按照它所批准的经营范围进行活动。但外贸管理部门和外贸企业必须分开，经营权应放在各个相对独立的公司。

第二，搞活外贸企业。外贸企业不要过分集中，不要搞独家经营，要把政企分开，要实行权责利相结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使外贸机体充满活力。

第三，农贸、工贸、技贸结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可以由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科研单位联合，成立农贸、工贸、技贸结合的实体；也可以由外贸企业直接经营自己的生产基地；或给有条件的生产企业以外贸权。

第四，农村体制改革要和外贸体制改革相衔接。

鼓励以户为主的分散经营在一定形式下进行联合，可以外贸公司为依托，或以加工企业为依托，或以地区性合作组织为依托，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各地已有了一些经验，应加以总结。例如南海九江的外贸收购点与菜农之间的联合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完善的好形式。

对农业的地区专业化必须加以扶持。专业户要联成一片，向地区专业化方向发展，没有一定规模的联片种植就难以实行机械化，难以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难以负担科学试

验技术设施的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四、正确的政策和管理措施是贯彻贸工农方针的保证

大的方针政策确定之后，还要有一些具体政策和管理措施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越是开放越要加强管理，管理和开放同步进行，这是党和政府早已提出的原则。在贯彻贸工农方针中，同样要这样做。

在经济活动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济活动本身没有按照计划的轨道前进，预定的目标有可能实现不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这样的例子更不鲜见。产生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但缺乏管理（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方针政策确定之后，就必须通过管理加以协调、规范，使方针政策不走样，按照预定的目标前进。即使由于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原订的目标缺乏客观依据，也可以在加强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发现，进行适当调整，使原来的计划更为完善。

在贯彻贸工农方针中有一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首先，要切实解决联合对外，一致对外的问题。我们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出口是有计划有配额的。但去年下半年以来发生了“水货”冲击香港市场的问题。许多无计划无配额或超计划、超配额、违反国家许可证管理的、无外贸权的单位出口的商品以及大量走私商品涌向香港市场，对香港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例如蔬菜，“水货”最多时达到配额的80%，远远超过市场容量。由于供过于求，1985年1月生发大量蔬菜倒海事件；最多时一天倒海150吨，相当于我正常销量的1/3左右。“水货”冲击造成的危害很大：一是价格下跌。1985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下跌18%。二是有些单位在国内市场上抬价竞购，造成外贸成本人为地提高。三是国家的正常出口量被迫减少，国家外汇收入锐减。这样做直接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了我国的外贸信誉，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贸工农方针将无法贯彻。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已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总的来说就是要坚持联合对外。应该指出，联合对外是一种极重要的竞争手段，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有效地运用了这一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这样做，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在国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导下，各个企业正在进行着竞争，国内的竞争和国外的竞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竞争，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增强企业灵活性的最有效的推动力量。对外贸易必须建立在国内竞争的基础上，优胜的企业可以通过多出口多创汇，在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本身取得利益，外贸经营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便是极大的失策。但国内和国外的竞争对象不同，目的不同，手段也有区别，所以竞争必须内外有别，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把本国产品当作竞争对手，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在国外市场只有联合对外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联合对外也是一个竞争水平问题。国家采取各种协调措施（包括教育的和法律的）来解决这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又回到独家经营的老路上去也是不行的。只能从加强管理上来解决问题。

其次，在贯彻贸工农方针中，应在政策和管理上保护竞争。在国内保护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国外，保护出口企业的对外竞争。我们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保护竞争最重要的是使企业站在同一起点上赛跑。为此，国家要用政策调整某些不合理的现象，要用法律禁止某些不正当的手段。例如，目前规定不同地区按不同的比例外汇留成的办法，造成产品往外汇留成高的地区流动的现象，打乱了合理的生产结构和流通网络，正常出口受到影响，各个地区之间也发生了新的矛盾，至于国家在收汇方面受的损失就更为严重了。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利于竞争的，对促进重点地区的发展也不是最佳方案。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竞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竞争，应该站在同一起点上，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企业在生产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上下苦功夫，才能促进企业在改进经营管理上多想办法，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与此有关的国内外市场的一些混乱现象。至于对一些特殊地区的照顾，可以考虑把外汇比例分成的优惠改为外汇贷款额的优惠，或者采用其它更好的办法。

再次，在贯彻贸工农方针中，应遵重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里，我们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外销不如内销”的问题。目前，有些出口商品外贸收购价格没有国内市场价格高。因此，企业和农民不愿意把产品（特别是最好的产品）卖给外贸企业。即使卖给外贸企业，也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这种做法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长此下去，是无法转上贸工农生产体系的。

外销不如内销，原因是很多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有合理的因素，如农产品购销政策放开之后，粮食和某些紧俏商品的价格上升了。缩小了工农产品差价，这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外贸收购价格应相应地适当提高。一般说来，外贸收购价格应略高于国内收购价格。特别是在香港市场和国际市场上有发展前途的商品，在价格上应优惠一些。同时，应按价值规律的要求拉大季节差价和品质差价，在国际市场上，这种差价要比国内大得多。拉大这种差价对鼓励提高商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均衡上市是十分重要的。国内销价上升，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如前面所说的有些单位抬价竞购造成了不良后果等，对此应坚决予以制止。在价格问题上，应把外贸价格的管理和国内市场价格的管理结合起来。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对生产的发展，对外贸的促进是十分重要的。

短期信贷银行的改革与经营

刘士焜

短期信贷银行是以经营短期信贷为主的专业银行。目前我国的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实质上都是短期信贷银行。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对于资金循环速度不够重视，加上在专业银行的分工上，主要按照服务对象区分业务范围，资金的不同性质区分不清，管理不严，致使大量短期信贷资金为固定资产和超储、积压物资所占用而失去流动性，循环不顺畅。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存款中补充相当数量的资金，因而这个问题尚未引起严重注意。但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必将影响社会总资金的循环。这个问题必须从体制改革和经营管理上求得合理解决，我现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一、银行必须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实行企业化经营

近代银行业是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分工深化的产物。银行作为具有社会规模的融通体系，既服务于又受制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越繁荣，银行集中的资金越多，调节经济的作用越大；商品经济不振，则银行业务减退。

另一方面，银行对商品经济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调节和制约机能。银根的放宽或抽紧，利率的降低或调高，融通的方便或不便，管理的从宽或从严，不管是作为宏观调节或作为微观调节，都会影响商品经济并引起复杂的连锁反应。但是我国银行过去那种行政化管理体制是同产品经济模式和资金、供给制配套的，实行行政化的银行体制，就是为国家主管部门掌握主要产品、物资的全部或大部，进行储备或统一分配服务的，所以它重视物资保证而忽视经济效益，重视资金分配而忽视资金周转，它不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强调振兴国内商业的同时，又提出银行商业化。他写道：“在我写帝国主义那本书的时候，我从书本上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银行（以及一般银行）有两种体制。其中的一种体制是国家银行十分接近商业。……我们需要的国家银行要比资本主义最商业化的国家银行还要接近商业一百倍”（《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列宁的观点非常明确，银行体制以经济为转移，银行在商品经济下应当商业化。

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要求有相适应的融通体系为其服务。我们现在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认真改革短期信贷银行的体制，以企业化管理取代行政化管理。银行只有按照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经营企业化，才会“内有动力，外有压力”并充满活力，与

客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也只有实行企业化，使经营的责权利一致，它才会更加关心资金的周转和效益。

二、应当抓紧短期信贷银行的企业化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人民银行分设出短期信贷银行，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银行体制由行政化向企业化过渡的转折点。1988年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专业银行作为经济实体，这给银行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但是，1984年的信贷失控发生以后，有的同志认为银行追求利润是发生失控的重要原因，从而对银行企业化持比较强烈的保留意见。

其实，1984年失控给我们的重要提示之一恰恰就是：应当抓紧信贷银行的企业化改革。我国银行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长期实行资金统筹、损益集中的原则，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银行工作统一集中的表现，实际上却是大锅饭。如果说一般工商企业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话，那么银行除此以外还有：全国分支机构吃总行的大锅饭。这种体制导致下级银行各自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力争在资金大锅饭中多占份额，竞相扩大信贷规模。再加上对资金运用得不好并不承担经济责任，这就使得或大或小的信贷失控易于发生。因此，信贷失控同银行讲求利润并无必然联系。五十年代末期的严重失控就是在银行并不讲求利润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1984年的失控，虽然是在银行已经实行利润留成的条件下发生，但其主要原因在银行外部是经济发展超高速造成的投资膨胀，在银行内部是体制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谓不彻底，就是还没有打破资金上、财务上的大锅饭，让实际经营业务的基层单位真正成为企业。所谓不配套，就是实际经营业务的基层单位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经营自主权，有了一定比例的留利分配，但对经营不善所产生的资金损失则不承担经济责任，即有权有利而无责。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银行企业化，而在于银行尚未真正企业化。今后加强宏观控制的办法也不是回到原来行政化管理的老路上去。当然，金融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世界公认的，但管理银行主要的、大量的还是要靠经济办法，即通过调整和理顺经济利益关系来使得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发展方向和经济总量来开展业务活动。因此，短期信贷银行的企业化改革应当抓紧进行，以改革来为宏观控制的顺利实施创设条件。

三、短期信贷银行企业化改革要点

（一）以支行为企业化的基本核算单位

实行企业化的焦点是化在哪一级上。如果认为银行实行利润留成制就算是企业化而不触动全行大锅饭的体制，仍然由总行统筹资金，集中损益，统一计缴利润并逐级分配留利，那么企业化只是化在总行一级。这样既不利于调动下级行的经营积极性，也不利

于调整和理顺各级、各地区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不利于把责权利统一于实际经营业务的基层单位，不利于加强宏观控制和防止信贷失控。

因此企业化应当化在实际经营业务的基层单位。从各方面的条件看，这样的单位应当是支行和相当支行的办事处。要通过改革把支行和相当支行的办事处办成能相对独立地进行企业化经营的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基本核算单位拥有一定数额的国拨基金并具有法人地位，在资金上自求平衡，在财务上自负盈亏，在业务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

（二）管理行也要经营实际业务并使经营企业化

在基层单位企业化的同时，总行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二级分行、中心支行这些管理行应当相应缩小其行政管理职能而强化其研究、信息、咨询职能，并直接经营基层所无力承担的大中型项目信贷、信托、租赁和银团财团联合贷款，以及与下级行联合经营某些业务。管理行的业务经营同基本核算单位一样实行企业化，其研究、信息、咨询服务也应创造条件实行企业化或半企业化。

（三）打破资金大锅饭自求平衡

各基本核算单位的资金立足于自求平衡，辅之以向人民银行借款和短期横向拆借。为此需采取一些措施：

1. 重新核定基本核算单位的国拨基金

过去银行只有国拨借贷基金，为了搞好经济核算制，应按企业化要求重新合理核定各基本核算单位的国拨基金，其中包括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前者用于建立必要的物质设施（包括后勤、生活设施），主要根据近期基本需要核定；后者用于经营银行一切业务，主要根据当地经济和业务状况核定，对于经济不发达、存款业务增长缓慢的地区可以酌情照顾。

国拨基金由基本核算单位长期有偿占用，占用费列入成本，费率应低于最低档存款利率。各基本核算单位应保证国拨基金完整无缺。在考核经营成果时应以国拨基金为依据。

2. 控制和逐步减少统筹调剂，促进自求平衡

存差行每年新增存款（净额）除提缴准备金外，绝大部分应归其自行运用。过去被贷差行占用的资金则逐步调回归其运用。

对于贷差行应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经济比较发达、存款业务增长较快的地区，应在短期内自求平衡；经济不发达、存款业务增长缓慢的地区，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限，逐步实现平衡。这些贷差行在自求平衡过程中的暂时困难，除管理行继续统筹调剂一部分外，主要通过人民银行借款和横向拆借解决。由于拆借利率高于调剂利率和存款利率，而且偿还期短，并附有一定条件，可以促使借入行加速资金周转和积极吸收存款，同时也有利于调节资金供求和理顺贷差行与存差行的经济利益关系。

3. 建立和积累自有基金

基本核算单位应从留利分配中建立和积累自有基金（包括自有固定基金和自有流动

基金)。这种自有基金与国拨基金分别核算，不付占用费，亦不能抽调。自有固定基金可用于增加或改善物质设施和引进先进技术装备。

(四) 打破财务大锅饭自负盈亏

将原来由总行集中损益、计缴利润然后分配留利的办法改为由基本核算单位分别以收抵支，计算盈亏，并直接按照规定向国家纳税（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和调节税等），向管理行缴交管理费和一部分税后利。其余利润则留本单位使用。经营中发生的坏帐和不能列入成本的损失，也在本单位留利中冲销。

各级管理行的自营业务视同基本核算单位，以收抵支，自负盈亏，并单独计缴税利。基本核算单位对所属营业所、分理处、储蓄所等附属单位和全体职工实行经营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并按“利润利益原则”使他们的物质利益与经营成果挂钩。

(五) 因时因地因市制宜，自主经营自担风险

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负有责任保证国拨基金完整无缺。保证存款和其他借入资金按期偿付，并在财务上自负盈亏，加上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因时因地因市（场）制宜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让它们在业务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各级管理行和其他机关都要尊重它们的自主权，不能强令它们发放贷款。

国家要以法律或法令对基本核算单位在业务经营方面的权责加以明确规定，对其所能承担的风险（包括贷款最高限额）加以严格限制，以便有法可循，依法管理。上级管理行和当地人民银行也要加强监督检查和审计稽核。

以上就是初步提出的企业化改革要点。可以设想，改革后短期信贷银行系统内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将打破，纵向、横向的经济利益关系将理顺，各单位因业务经营状况不同而形成的资金、留利、设施、福利等差距将拉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融资方式和服务项目将增加，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将提高，不论贷差行或存差行在开展存款业务、增辟资金来源方面将更加努力，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安全系数和周转速度将更为关心，国家对信贷规模的宏观控制将更易奏效。

至于那些过去长期依靠统筹照顾的困难地区，向自求平衡、自负盈亏转化有个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仍需由管理行向存差行调剂一部分资金、向盈余行集中一部分利润用于统筹照顾。但这种统筹照顾应加控制并逐步减少，以利促进转化。

四、短期信贷银行在经营上要把资金流动性视作生命线

短期信贷银行经营管理上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资金流动性问题。短期信贷资金就其本性来说应该是不断地循环流动的。循环不顺畅是一个信号，显示有一部分短期信贷资金已经沉淀，脱离了短期资金循环的轨道。

这部分失去流动性的沉淀资金主要占压在两个方面：（1）固定资产投资及由此而造成的企业铺底资金增长；（2）物资的超储、积压。

短期信贷资金被移用或变相移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超高速起了支撑作

用。有些集体企业从基建、设备到铺底资金都靠贷款解决，加上它们的原材料和燃料供应缺乏保证，倾向于多储备，而产成品和结算占用又大，有时一个企业就占用两三套资金。所以把短期信贷资金移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不单是这部分资金失去流动性；在建成投产后贷给的铺底资金，就企业来说，算是流动资金，但作为信贷资金来说，也失去了流动性，因为它已为企业所经常占用而无法收回周转。

从社会总资金循环来说，固定资产投资占压意味着固定资金占社会总资金的比重增长过快；超储、积压物资占压意味着流通时间拉长，两者都对社会总资金循环周期有延缓作用。从短期信贷资金循环来说，上述两方面的占压，不仅降低资金流动性，造成循环不顺畅，而且发展下去还会导致某些基本核算单位资金调度发生困难。短期信贷银行较之一般工商企业更有必要具备一旦需要能立即调度相当数额头寸的运筹能力，因为它不但要保证按期支付，按期承兑，按期清算，还要准备应付紧缩银根。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保持资金的高度流动性，把资金流动性视作经营的生命线，除对已形成的占压要逐步搞活外，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化的同时，着力改善经营管理，以防止新的沉淀，加速资金周转。

(一) 突出信贷的期限性。贷款不再按占用形态(如生产费用贷款、生产设备贷款、商品流转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基本建设贷款等等)分类，改按期限长短分类，即期限在一年和一年以下的属短期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属中期贷款，期限在三年以上的属长期贷款。贷款利率档次也应改按期限长短调整理顺，使期限短的利率低，期限长的利率高，并可考虑对超过原订期限归还的，按照实际归还期所属档次计息。长期贷款利率调高有利于通过项目评估择优汰劣，防止投资膨胀和乱铺摊子。

短期贷款应再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另一部分是期限在六个月以上到一年的。在经营管理上应注意控制两部分的比例，使期限在六个月以下的贷款(包括短期拆放)，在一般情况下占短期贷款总额的大部分。在控制贷款期限的同时，可以考虑对某些贷款实行按月计收利息的办法，以促进客户加速资金周转，及早归还贷款。

(二) 短期信贷银行可以发放少量用于技改的中期贷款，但应由管理行和人民银行核定最高限额加以控制。在限额以内，放不放，放多少，放给什么单位，均由基本核算单位自主决定。

(三) 短期信贷银行停止发放长期贷款。这包括：

1. 不再安排期限超过三年的专项贷款；
2. 不再在短期贷款名义下发放长期贷款；
3. 不再给那些将流动资金(包括流动资金贷款)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发放短期贷款，直至该企业终止这种不合理占用状态为止；

4. 今后对于国家不列入基建拨款、基建贷款计划，指靠挤占短期信贷资金上马，待投产后以税利还贷的计划外项目，短期信贷银行不予贷款。对于短期信贷银行停止发放长

期贷款，人民银行应当加以支持和监督。

(四)把短期信贷特别是商业贷款的经营决策建立在经济信息、经济预测的基础上，面向市场，因市制宜。

1. 积极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使工农业产品在品种、花色、质量和价格上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对市场前景不佳的计划外产品之生产经营则不宜支持。对工业生产企业和物资企业的储备定额也应根据市场导向和产业结构变化适当调整和控制，超储部分迅速压缩。

2. 按照“以销定贷”和缩短流通时间、减少资金占用的精神改进商品流转贷款管理，严格控制商品资金定额和资金周转天数，促使勤进快销，限期处理有问题商品。

3. 加强资信调查，对于不具备信用贷款条件的单位和投机性商业活动都不予贷款。

(五)短期信贷银行基本核算单位的经营管理以资金营运为中心，着重抓好两条：

1. 缩短资金循环周期。目前短期信贷资金主要问题不在于数量不足，而在于周转不快。周转加快等于增加资金量。所以应通过实行经营责任制和提高管理水平力求短缩资金循环周期。

联行汇差也是短期信贷资金的有机组成部分，现行汇差结算办法不利于加速资金周转，也不利于理顺汇入行和汇出行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弄得不好会造成“支付锁链”中断，因此除应统一研究改进外，各基本核算单位都要抓紧这个重要环节，向压缩汇差要资金，要周转速度。

2. 健全资金预测与运筹。基本核算单位要立足自求平衡，搞好短期资金测算。按季按月进行资金预测，按周预作头寸调度安排。在业务管理上要严格控制贷款期限并适当注意信贷收支的均匀度，确保每月每周都有相当数额的到期贷款可以收回周转，以利于保持必要的运筹和应变能力。

(六)增加有利于保持资金流动性的短期融资方式。目前可以考虑先开办票据贴现和抵押贷款。但前者比较理想的条件是人民银行同时开办再贴现业务。后者则应以能随时变现的动产作为押品并须办妥相应的法律手续。因此这些新业务暂时也只能在某些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基本核算单位先行试办。

(七)短期信贷银行不能把企业的流动资金供应包下来。因为企业流动资金实际上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经常占用的铺底资金，另一部分是企业临时占用的周转资金。按其性质来说，后一部分属于短期信贷范围，而前一部分不属于短期信贷范围。过去划分得不够清楚，导致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千家万户搞固定资产，银行一家包流动资金”。这也是部分短期信贷资金失去流动性的一个原因。今后应在进一步完善流动资金管理体制的同时，划清短期信贷的范围。

(一九八五年八月)

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新探

何 国 文

把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作新社会中的旧社会痕迹，学术界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对此怎样理解，则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不少同志以往在谈到它是旧社会的痕迹时一般总认为它有消极的一面：按劳分配也是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种弊端应加以限制。这些看法一方面把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旧社会的痕迹与消极因素相等同；另一方面把新社会中按劳分配导致人们经济生活中富裕程度的不同也看作一种弊端，甚至说它是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与社会主义本性不相协调的东西。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

一、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内容

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问题，首先要正确领会马克思所讲的这个资产阶级权利的本来含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还是资产阶级权利，是有条件的，他的原话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个“按照原则”，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公共经济中的生产者之间不同形式的等量劳动可以相交换的原则。他还特别指出，这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为什么按照这个原则便可以把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称为资产阶级权利呢？这是因为：平等的权利是商品关系的产物。商品等价交换要求双方以平等的资格相对待，彼此有平等的权利取得对方的等价物。商品关系虽然早在原始社会解体时即已出现，但作为商品关系在法权上的表现的平等的权利，只有到了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提出来，并经过斗争而为社会所肯定。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要通过商品生产来实现。他们为了能从封建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便要求反对封建等级制的贵族特权，而代之以平民的平等权利，于是平等的权利就打上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印记。因此，反映商品关系并以等价交换原则为其经济内容的“平等的权利”就成了资产阶级权利的专有特征。既然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体现了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相当于等价交换这个原则，所以马克思说：“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马克思讲的这个资产阶级权利，是专门就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而言的，显然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经济权利，那是排除了资本家的劳动者在公共经济中平等地以劳动这个同一的尺度来取得消费品的权利，只不过因为这种平等权利按照它所体现的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个原则来说，仍然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框框而已，并非说它真的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权利，毋宁说它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更确切、更通俗而简明。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样便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权利区别开来了。由于所有制不同，“平等权利”会有阶级属性上的根本区别。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平等权利，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雇佣工人进行剩余价值剥削，这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权利；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平等权利，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个原则，在社会主义生产者之间实现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权利，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的权利。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为什么把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分析与说明，可见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其经济内容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的等量劳动相交换。这种资产阶级权利，不外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以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其内容的这部分生产关系在法权上的表现，它既然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尽管冠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却是与资本主义剥削不沾边的，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因而它决不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不相容的。相应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其实就是反映这一部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也不能说是非社会主义的。那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以为它既然有“资产阶级”这个帽子，总是与资本主义不可分，甚至与剥削沾了边的看法，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这个学说的本意。

马克思讲的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只限于按劳分配中的，并没有讲到体现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这与他所设定的条件有关：一方面是因为他要论述的对象是分配，是生产者在公共经济中付出劳动有折有扣后对消费品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因为按照他的设想，实现社会主义后商品生产会消亡。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在公有制基础上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仍然要按等价交换原则办事。所以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不仅存在于按劳分配中，还存在于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中。

二、资产阶级权利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

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存在的旧社会痕迹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不能认为既然是旧社会的痕迹就必然是同新社会不相协调的消极因素。按照辩证的否定观，新社会中的旧社会痕迹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新社会的形成毫无积极意义的废物，它们确是与新社会性质不相协调的消极因素；一类是新社会诞生时还要吸收的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它们是新社会的本质要素之一，因而与新社会是相协调的，社会主义

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就属于后一类。

我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旧社会痕迹的理解如下：

这个资产阶级权利既然以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其经济内容，它作为旧社会的痕迹，理应表现在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一点上。因此，应该说明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旧在什么地方，而不应简单化地拿“资产阶级”这个标签作根据。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之所以还需要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是因为一方面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客观存在着各种有着自己特定经济权益的利益主体，它们是各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他们或处于一个公共经济之中，或分别处于不同的公共经济之中，并且都处于全社会的分工体系中，彼此互相依赖，因而需要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按其所依据的经济条件，大体分成商品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两种。但不管是哪一种，总是反映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经济上要平等互利的利益关系。正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这种区分你、我，要讲究平等互利的利益关系，体现了旧社会私的经济在新社会公有经济中的痕迹。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已不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也已消亡，这种还要区分你我、计较平等互利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经济关系不再存在，从而可以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这时，新社会公有经济中的旧社会痕迹才最终消失。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构成了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或者说，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内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这要从同资本主义经济和同共产主义高级阶级作比较来论证。

同资本主义经济相比较，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内容，由于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这一面，使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和其他私有经济的，而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有决定性的意义。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内容中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一面，在它作为按劳分配所通行的原则这个限度内，它是社会主义消费品按劳分配这种经济关系的反映。按劳分配制度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否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这是一致公认没有疑义的。在等量劳动相交换作为商品交换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个限度内，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那是社会主义生产者之间没有剥削的平等互利的交换关系，这也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属性。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不少同志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会消亡的论述，或多或少地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资本主义因素混为一谈，从而认为它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或不协调的，以致力图加以限制，这是不懂得或不承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对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相比较，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内容，正如以上所指出，总的说来是反映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经济上要计较平等互利的利益关系，这正好表示了虽然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却又还未能达到实行

按需分配和商品生产的消亡，因而才成其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经济上的特征，从而成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三、资产阶级权利导致人们富裕程度上的差别 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并非弊病

把资产阶级权利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所造成人们在经济生活上富裕程度不同的差别，看成是一种弊病，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平均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产阶级权利由于体现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确实有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上富裕程度不同的差别，但这是由以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讲这是弊病时，明确指出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很明显，这种实际上的不平等之作为弊病，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而言的，不应乱套用于社会主义阶段。对待社会主义经济中人们富裕程度存在着差别的态度，要具体看这种差别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怎样的作用来决定。

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导致的人们富裕程度的差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实行按劳分配而来的差别；另一种是由商品关系而来的差别。它们的存在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依据，有其特定的客观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应按照这些经济规律办事，利用它来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违反它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决定按劳分配关系的经济条件，大家认识比较一致，毋庸叙述。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对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承认由此引起的人们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一方面用以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另一方面又借助于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差别，正确调节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同时鼓励先进鞭策落后，通过这样使劳动者从自己的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公共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将来实现按需分配的理想积极创造物质条件。可见反映按劳分配关系的差别，是积极因素而非消极因素。反之，不承认这种差别并力图拉平这种差别，就会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生产力，这才是十足的消极因素，这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实践中有极其深刻的教训。因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并具体提出“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当前尤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情况。”

决定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存在的经济条件，我认为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社会主义经济

中存在着具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各种经济实体。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由于价值规律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会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商业经营者在经济生活上富裕程度不同。这种差别体现了商品生产者和商业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其经营成果的紧密相结合，通过竞争这个经济机制，有力地鞭策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商业经营者积极改善经营管理，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很重要的积极因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实践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凡是否定商品生产等价交换而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都会严重挫伤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破坏社会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商品经济关系所引起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别，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差别，对社会主义社会决非弊病。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所导致的人们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并不包括着剥削，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它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者之间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的劳动交换关系，因此，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导致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上富裕程度的差别，那怕比较大，也是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国家利用税收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节。总之，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在生产关系上承认这种差别，否则，反而会挫伤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破坏社会生产力。

由于我们过去平均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所以一旦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和开展商品生产，由资产阶级权利导致的人们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在一定时期内会使人觉得比较显著和突出，但可以预期，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普遍发展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随着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普遍提高，这种差别将会逐渐缩小。这种差别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的差别，是劳动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的差别。同时，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反对剥削的，是防止新剥削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虽然有竞争和企业的优胜劣汰，但由于以公有制为基础，这就保证了它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管理下经营，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企业和生产人员，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在计划指导下得到适当安排，不会让一些人变成资本家，大部分人变成雇佣劳动者。

当然，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是很复杂的，事实上总不免有一些人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大量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存在，如以权谋私或从事违法经营，甚至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一些人蜕变为剥削者，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是要受社会主义法律制裁的，根本不属于按劳分配关系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只能算是个别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良的或犯罪的社会现象，不能看作是社会发生两极分化的表现。

可见，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所导致的人们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是一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如果硬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弊病而加以限制，力求拉平，反而是错误的。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承认并善于利用由此决定的经济差别，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劳动者和地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

动先富起来，同时注意做好扶贫和社会福利工作，鼓励后富赶先富，先富帮后富，以便波浪式地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政策。



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唐僧”应是康僧会

官大梁

王士性《广志绎》说：南京“大报恩寺塔以藏唐僧所取舍利”（中华书局本第23页）。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引用《广志绎》这条材料，亦作“唐僧”（齐鲁书社本第58页）。

为了减少引用上的错误，在此略作辨正。大报恩寺的前身是建初寺，建初寺是江南有佛寺之始，建于三国吴赤乌间。取舍利者是三国时僧人康僧会，而不是唐僧，两者时间相距甚远。道宣《释迦方志》卷下《通志篇第六》：“《吴书》曰：赤乌四年（241年），有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者，行妖道也。初达吴地，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孙〕权曰：‘若得舍利，当为起塔。’经三七日，遂获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花，照耀宫殿。吴主叹异，信心乃发，为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寺在聚宝门外一里，即古长干。自有梵刹，历史悠长。吴赤乌间，康僧会致舍利，吴大帝为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为江南塔寺之始。”建初寺后历经兴废，数次改名。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为报高皇帝深恩，改寺名大报恩寺，命工部侍郎黄立恭等重建，准官阙規制。宣德六年（1431年）完工。

论家庭消费方式

袁培树

(一)

所谓家庭消费方式，指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消费消费品的方式，以及家庭对家庭成员的组织的组织形式。

家庭消费方式决不是可以由家庭成员任意选择的。马克思说过：“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消费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95页）消费方式是由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所媒介的方式决定的。家庭消费方式同样如此，它要受到社会生产的、历史的、传统习惯的、以及家庭成员的消费心理偏好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根据制约和影响家庭消费方式的因素，可以将家庭消费方式这一总体概念的经济内涵作如下划分：

（一）家庭成员的个体消费方式和家庭成员的集体消费方式。这种划分主要是由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特点所决定的。消费对象（如卧室、手表、衣服、牙刷等）的使用价值只宜于个人消费，对它们也只能取个体消费方式。消费对象（如家庭客厅、炊具、电视机等等）的使用价值适宜于家庭成员共同消费，因而一般实行家庭成员集体消费方式。如自行车、闹钟、电视机、收音机等消费对象，从使用价值的特点来看，既可以采取家庭成员个体消费方式，也可以实行家庭

成员集体消费方式。在这二者之间究竟作何选择，就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需要家庭化的消费方式和家庭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之间的区别，一般都比较清楚。但对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之间的同一性，即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人们则往往不那么了然。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实质上属于社会需要范畴的需要，却并不以社会需要的形式出现；而是转化为家庭需要，以家庭需要的形式出现，并用家庭消费方式予以满足。这就是所谓社会需要家庭化的消费方式。如给离休老干部的住房、医疗保健和免费组织游览等优待。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个人及其家庭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需要。又如，城镇居民对住房、医疗保健的需要，这在实质上是居民个人及其家庭的需要。但在现行城镇居民住房管理体制和公费医疗体制下，这种居民个人及其家庭的需要，却转化为社会需要，以社会需要的形式出现，并以社会消费方式来满足。这种家庭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之利弊，近来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我国目前的国力条件下，类似这种家庭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应不应在量上有一个合理的限度？怎样提高这种家庭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的效益？以至是否有必要采取这种转化形式。对这一系列问题，有必要引起我们认真反思。

（三）家庭直接性消费方式和家庭间接性消费方式。所谓家庭直接性消费方式，是指直接由

家庭成员以及家庭这个集合体的消费需要所引起、并在家庭范围内实现的消费，以满足家庭成员以及家庭这个集合体的需要。所谓家庭间接性消费方式，指并非直接由家庭成员以及家庭这个集合体的需要所引起，而是由家庭以外的人或事所引起、所触发，直接满足家庭以外的人或事的需要，但也间接影响到家庭成员以及家庭这个集合体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的消费。家庭间接性消费既可以在家庭范围内实现，也可能在家庭范围之外进行。

(四)若按家庭消费的各个不同方面进行划分，家庭消费方式又可分为在吃的、用的、住的、行的等方面的消费方式。每个方面的消费方式，又可按上述三种划分法进一步细分。例如，家庭在吃的方面的消费方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家庭成员个体在吃的方面的消费方式，以及家庭成员集体在吃的方面的消费方式；家庭在吃的方面的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以及社会在吃的方面的需要家庭化的消费方式；家庭在吃的方面的直接性消费方式和间接性消费方式。

(五)若按家庭消费过程中追加的劳动是由家庭成员自己承担，还是由别人、由社会来承担，又可以把家庭消费方式区分为家务劳动化消费方式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消费方式。

(二)

家庭消费方式的合理选择，就是要把家庭消费的五要素，即家庭成员以及家庭集合体的消费需要、消费对象、家庭关系、家庭消费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各种消费信息，科学地组合成一个合理的系统，设计出最佳的组合方法及秩序，并对消费的后果予以定性定量的数测和评价。在家庭消费的全过程中，根据各种反馈信息，对家庭消费五要素的组合方法及秩序进行必要的调整，以达到家庭消费的最佳效益。这样，要合理选择家庭消费方式，首先就必须分析家庭消费五要素对家庭消费方式的影响作用及其相互作用。

(1)家庭成员以及家庭集合体的消费需要对家庭消费方式的影响。首先，家庭成员以及家庭集合体的消费需要不同，相应采取的消费方式也就不同；其次，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满足这些消费需要的具体方式也就发生变化。

(2)消费对象对家庭消费方式的影响。上

文已经阐明，按商品的使用价值，家庭消费品大致可分为个人消费、家庭集体消费和综合性的三类。相应于这样三类消费品，家庭个体和家庭集体就要对消费对象进行选择，这样就形成不同的消费方式。

(3)家庭关系作为家庭消费的五要素之一，这是因为家庭成员的消费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家庭关系中进行的。家庭关系如何，就直接影响到家庭对消费方式的选择。

(4)家庭成员所要达到的消费目标，这是在家庭消费活动中定向性的因素。例如，吃的消费，有些人可能是真正为了解除饥饿；另一些人则可能是为了应酬交际；对那些年轻恋人们来说，则往往成为博取对方好感的手段之一。消费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引起消费方式上的差异，对真正为了解除饥饿的人来说，吃的消费方式以简单实惠为要；对为了交际而聚餐的人来说，其消费方式就往往比较讲究排场；对年轻的恋人们来说，则更喜欢优雅僻静的餐厅小酌的消费方式。

(5)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消费信息，包括什么消费品正在被淘汰，什么新型消费品正在上部流行，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动态，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人对家庭消费行为的评价，邻里以至整个社会的消费风气和消费格调的演变等等。各种消费信息反馈是否及时、准确，这对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性因素。

鉴于家庭消费五要素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家庭消费方式。这样，在科学地组织家庭消费五要素，选择合理的家庭消费方式时，就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要有利于最大限度满足家庭成员以及家庭集体消费的需要。

第二、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要有利于合理利用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

第三、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发展。家庭关系是与家庭生活紧密结合着，并通过家庭经济行为、家庭消费方式等等具体地表现出来。家庭消费方式选择恰当，就有利于家庭关系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当，就有可能使家庭关系出现种种裂痕，甚至家人反目。仅以家庭居住方式对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从而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为例。据有关同志的调查材料，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健

家庭不同居住方式对健康的影响

居住方式	与子女分居而独立生活者	百分率	和子女(包括过继子女)一起生活者	百分率
健康情况总人数	58	100%	120	100%
健康	14	24.14%	46	38.33%
小病	10	17.24%	27	22.50%
慢性病	28	48.38%	45	37.50%
伤残	5	8.62%	1	0.83%
卧床	1	1.72%	1	0.83%

(资料来源:河北大学哲学系,《定县农村调查报告》第59页)

康人数比例达38.33%;而和子女分居的老年人,健康人数比例仅为24.4%,后者远远低于前者。假定其它方面条件相同,后者的家庭关系就要比前者差一些。这也就是说,在一方面,选择合理的家庭消费方式,是发展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要有利于家庭成员树立和发展正确的消费目标。消费作为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一种行为、一种过程,其本身并非就是人们发展的目的,也还只是人之全面发展的一种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更不应该把消费仅仅看成目的,也应当是达到人之全面发展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必须根据家庭成员正确的消费目标来进行。

第五,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要便于对各种消费信息及时地、准确地反馈;或者说,家庭消费方式的选择,应对各种消费信息反馈保持较强的适应力。比如说,当家庭为是否购买洗衣机、以改变洗衣方面的消费方式进行决策时,就不仅要考虑到现时家庭住宅状况、供水状况等等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到家庭周围的洗衣服务业在短期内的的发展状况,如果洗衣服务业很发达,家庭就不必购买洗衣机;还要考虑家庭人口在短期内的变动状况等等因素。如果不把所有这些可能发生的消费信息反馈都考虑在内,就匆忙作出“冲动型”购买决策,一旦供水紧张、或家庭住宅拥挤、或家庭周围的洗衣服务业很快就发展起来等等,这个家庭就势必要对洗衣方面的消费方式重

新选择。这样,家庭消费方式能否灵活地适应这种变化,是否具有高度的应变机动性,这就直接关系到家庭消费方式的进一步变动和发展了。

以上从家庭消费五要素的角度,简要地分析了合理选择家庭消费方式的五条基本原则。这五条基本原则内在地表明,家庭消费方式的合理性,实际上乃是家庭消费方式的符合需要性、经济实惠性、趋向目标性、协调关系性、以及灵活应变性这五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家庭在选择消费方式时,应该综合考虑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并根据各个家庭的具体“家情”,能动地予以调适。

(三)

家庭消费方式的发展趋向,受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技术性的、以及意识形态等等方面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制约和影响。综观国内外家庭消费方式发展的历史变迁和现实格局,对照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方式的现状,并考虑到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五要素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认为,在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方式的未来发展中,将呈现如下基本趋向:

第一,家庭成员个体消费方式的发展,将逐步超过家庭成员集体消费方式的发展,家庭成员个体消费方式在家庭消费方式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将逐步上升。前面在论及家庭消费方式的分类时已经指出,家庭消费方式体系实际上是由家庭各种消费方式统一而成的有机结构。在以前社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中,家庭或家族的利益和需要,一直凌驾于家庭成员个体之上,家庭成员的个体

需要和个性发展，往往成为“家”和“家族”利益祭坛上的牺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虽已从基本上消除了为“家”或“家族”利益而牺牲家庭成员的个体需要和个性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状况的限制，“家”和“家族”的需要和利益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家庭成员的个体需要，限制着家庭成员的个性发展。致使家庭成员集体消费方式的发展，在一段时期内超过家庭成员个体消费方式的发展。以往的方面的消费方式为例，当前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家庭，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未能做到家庭成员“分离就寝”（夫妇除外），即每个家庭成员单独拥有卧室。相反，两代或三代同室，或兄弟或姊妹同室的现象却并非罕见。很多家庭甚至连“食寝分离”这个家庭住房消费方式发展中的初步水平尚未实现。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人们在住的方面的要求，已超过了“食寝分离”这个基本条件，而趋向于“分离就寝”。这也就是说，在家庭住房消费方式的未来发展中，家庭成员个体消费方式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明于此，新建住宅的规划和设计，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再例如，吃的方面的消费方式，至今还是以家庭成员集体消费方式为主；家人制作饮食，家人一起就餐。随着饮食消费方式的社会化，“在外面吃”（包括上餐馆、消费各种现成食品、旅游等等）所占比重将逐步超过“在家里吃”。“收入决定饮食”将让位于“时间决定饮食”。这就意味着，家庭成员在饮食方面的个体消费方式的发展，将逐步超过家庭成员集体消费方式。总之，家庭成员个体消费方式与家庭成员集体消费方式将成反方向发展，这是家庭消费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趋向之一。

第二，社会需要家庭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步萎缩，家庭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在某些方面将逐步发展。这两种消费方式本质上都是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而引发的。但二者的直接导因又有所区别，社会需要家庭化，这主要是囿于国力有限，国家尚无力将属于社会需要范畴的一切消费都包下来，还有必要借助于家庭的力量条件下发生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社会需要家庭化的现象就会逐步减少，社会需要就将直接以社会消费方式实现。

家庭需要社会化，这是直接由现阶段人们的

收入有限，且家庭之间在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还比较大的状况引起的。为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如上文论及的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等本质上属于家庭需要范畴的消费，却由国家包下来，并以社会消费方式实现。这就促使这种家庭需要社会化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推断，在全部消费基金中，社会消费基金所占比重将逐步上升，“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页）这就是说，社会消费基金所占比重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上升。这就为满足社会化了的家庭需要提供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目前某些由于国力所限尚未社会化的家庭需要，例如农村家庭中老年人的赡养费用、城市居民家庭中婴幼儿的托养费用等等，将逐步转化为社会需要，并以社会消费方式来实现。因此，家庭需要社会化的消费方式中的某些方面将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增长。

第三、家庭交际性消费方式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趋向丰富多样，人们全面发展的程度将与人们社会交往的广度同步发展。家庭消费空间将突破传统家庭界限而向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延伸。“家庭消费”的传统涵义将注入日趋丰富的社会因素。这就必然导致家庭交际性消费方式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至于在家庭吃、穿、用、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消费方式的发展中，各个方面的消费方式进一步发展的总趋势是都将进一步社会化。但这并不是说，各个方面的消费方式社会化的速度和程度将同步进行，而是有快慢高低之分的。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一般说来，穿、用、行三方面的消费方式社会化的速度将最快；饮食消费方式社会化的速度次之；住的消费方式社会化的速度再次之。明于此，我们就应该区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家庭消费方式社会化，任何急躁冒进都是于事无补、适得其反的。

物质·物质文明，精神·精神文明

钟 阳 胜

人作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创造性主体，面对着两个世界，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实质是一个世界，即统一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是在物质世界的不断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世界千姿百态，从物质运动形态和职能表现来看，可以分为“自在”的即天然形态的物质和“人为”的即主体化形态的物质。而精神世界由于物质世界的丰富性及其自身的运动特点，内容往往色彩斑斓，并且表现出“自在性”和“自为性”，即自发的精神意识与精神生活和自觉的精神意识与精神生活。正是由于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自内部及彼此间存在着复杂关系，人们才有必要在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从事物的区别和联系中抽象并把握它们从而对物质与物质文明和精神与精神文明的范畴作出高度的哲学概括。

物质作为哲学范畴是一种抽象，它既不能脱离人的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各种物的实体，又不直接是千差万别的物的实体。统一的物质世界具有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无穷级的层次结构，人们认识它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三级本质等逐层深化的。人们接触到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通常所说的这种物质，那种物质，都是从物理学、植物学和化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角度或者从直观的意识来看的物质。所有这些物质，都具有不同的形态，色泽，气味，等等，每一门自然科学，都以某一种具体物质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并揭示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特殊本质和内部特殊的运动规律。而物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则是离开了物质具体形态、色泽、气味等，透过各种物质的特殊本质而对其最一般本质和共性进行高度概括的总汇。

物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人类认识史中长期探讨的重要课题，可说是个历史范畴。在古代，哲学家们往往把世界的本原看作诸如水、气、原子或阴阳等，尚未把物质范畴的哲学规定和各门自然知识的物质范畴规定区别开来。直至经过近代象培根、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尔巴赫等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等人的理论概括，物质范畴才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取得哲学的规定性。黑格尔说：“物质不是一种存在着的东西，而是一种象共相那样存在或象概念之为存在那样的存在。”在他看来，哲学范畴的物质，并不是表现为具体形态的物质，而是扬弃了“规律的感性存在”的“普遍或共相”，“是一种非感性的感性存在，一种非物体性的却倒是对象性的存在。”^①这说明，黑格尔已经把物质的哲学范畴和自然科学的物质范畴在理性上作了正确的区别。然

而，黑格尔哲学否定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并且把物质看成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或对象化。他在物质范畴上的这种谬误，是由他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恩格斯认为，在哲学上，“物质”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他说，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②恩格斯的这段经典论述说明，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实质是经过概念抽象的“思想造物”，^③是一种富于感性存在而本身又不是感性存在着的东西。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物质的思想，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④又指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⑤从认识论来看，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虽然是一种抽象，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但却是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综上所述，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第二，它是各种具体的有形物质的总汇，不仅包括未经加工的天然物质，而且包括人化了的自然物质和各种社会物质；第三，它可以被感觉所摄影、所反映。

物质文明范畴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物质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和社会进步状态的物质标志这一本质规定性来看，这种联系和区别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物质文明范畴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范畴和作为哲学的物质范畴，都不能离开各种物质，尤其不能离开各种自然物质。三者不同的是：自然科学的物质范畴不仅包含原始的自然物质而且包含人化自然物质；而物质文明范畴则不包含原始形态的自然物质。这种原始的物质，只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物质文明的原材料，本身还不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作为人们改变自然物质形态的劳动成果，不是原始形态的自然物质或原始形态的对象世界，而是不同程度地凝结着人类的劳动，打上了人类意志印记的经过改造的自然界，即马克思所谓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反映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进化程度，表明了“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⑥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则不仅包括自然物质和社会物质，而且完全撇开了自然科学中物质范畴内涵的具体形态，因此它比物质文明范畴具有更高的概括性。

其次，从物质文明范畴存在形式来看，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必然要与人发生关系，受人的智力和体力的控制和改造，在人的意志作用下形成某种关系。而自然科学的物

质范畴和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却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自身的存在和运动，往往只部分地进入人的视野和活动范围，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过程的客体，在本质形态上，不受社会影响，不具强烈的社会性，而更多的是它们的自然客体性。

再次，从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和物质文明范畴的物质的职能来看，二者也有区别。哲学范畴的物质，是精神现象发生和本原和本质动力，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石，同时也只有在认识论中才具有绝对的意义，才具有这一范畴存在的合理性。而物质文明作为社会进步的物质标志，是相对于精神文明的一种范畴规定，是精神文明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和主要条件。

那么，从哲学上来看，精神和精神文明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先看它们的区别。精神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哲学认识论中，精神作为哲学范畴，是对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这类社会现象的最高度的概括，它和物质范畴一起构成一对认识论的基本矛盾，成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①作为哲学范畴的精神，是一种意识现象，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人脑通过人的实践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反映的主体的面前，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种类十分丰富而又层次结构十分复杂的总体。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作为特定的个体或集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条件是有局限性的，它往往使人的认识不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或错误。因此，概括人们的认识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精神范畴从外延看，具有多形式、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从过程和正误分类来看，它不仅包含正确的或者说符合客体自身规律的认识活动过程及这一过程意识产物，而且包含错误的或者说与客体不相符合的认识活动过程及这一过程意识产物；从层次结构来看，它包含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社会的意识形态，包含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社会思想体系，等等。

精神文明范畴则不同。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的观念、思想、理论和知识等的精神成果，是对一定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社会思想、社会道德、社会风尚、社会的审美情趣等一切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现象的综合和概括，是人类社会在精神方面的进步状态。因此，精神文明由于其本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外延远远不及精神范畴广大，决定了它不可能兼收并蓄各种与社会进步对立、倒退、腐朽、堕落的社会思想、社会道德、社会风尚和各种灰暗、下流、阴湿的社会审美情趣。正是精神文明与精神的这种原则性区别，才使一个社会表面看来精神现象多姿多彩，色色具有，但精神文明却不一定具有完整的形态，其高低的程度也不一致。

再看它们的联系。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来看，精神和精神文明在其来源和本质上，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都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物质文明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为中介，进行一系列认识活动的成果，都是人脑的产物和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次，从精神和精神文明的运动形态来看，二者都是人们进行精神

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消费思想资料即消费已经积累起来并客体化了的~~精神~~和精神文明本身，就是生产新的精神现象和新的精神文明的过程。反之，生产新的精神现象和新的精神文明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即生产消费和主要表现为娱乐享受的精神生活的消费过程。再次，是继承性。从人类的认识史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史来看，精神和精神文明都有各自的继承关系。没有这种继承关系，精神和精神文明都不可能发展。最后，是精神结构系统内部和精神文明结构系统内部的各组成要素，都具有积极的或是消极的相互作用性。这种相互作用，是精神也是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P170

② 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P233

③ 同上书

④ 《列宁选集》第2卷，P123

⑤ 同上书，P266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72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19

略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

李 恒 瑞

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不断地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生产力的状况出发，研究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实际内容。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最根本的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力本性的要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首先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最根本的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本性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们指出，代替小生产的落后生产力而出现的，是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就是它的社会性，它的社会化的性质。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在事实上“承认它的社会本性”，与它的“社会性相适应”，给它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因此，必须使同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从三个方面来揭示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日益转化为社会积聚的、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二）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生产本身由于分工和协作而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三）生产产品的社会化。产品也从个人孤立劳动的产品变为社会劳动的产品，从为满足劳动者个人

直接需要的产品变为与整个社会相交换的产品。②

社会化生产力的这种本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与之相适应。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用，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必须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即社会化占有，决不会容忍那种仍然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的占有形式去束缚它的手脚；要求整个生产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社会生产，即单个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组织性协调一致；要求消费品的分配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的这些客观要求，规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规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质的稳定性。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社会化生产力本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必然趋势。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调整 and 改革以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这种生产力本性的要求所决定的。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力，是现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正在发展前进的先进生产力。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世界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并存的今天，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而且它的本性得以发展的条件和命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具有根本不同的状况，但是它的社会化的本性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的客观要求，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社会化生产力本性的客观要求的实现获得了基本的条件。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适应，而不是完全的和一劳永逸的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在蓬勃发展之中，并且正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在不同的国度中寻找表现它的本质特征的各种具体的存在形式。只有各国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的模式，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适应得到具体的实现。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根本的要求是给予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社会化生产力的状况，研究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及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提出的不同的要求。如果忽视了社会化生产力性质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巨大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给予它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因之，当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观察世界上两种对立的生产关系并存的状况时，应当注意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对生产关系的共同的、本质的要求。而当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和变更，依据生产力的状况调整 and 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模式和结构的时候，应当注意这种生产力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展程度和具体特点的差别，注意它的社会化本性对生产关系的具体的、特殊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必须适应 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客观要求

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已经冲破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在社会化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一些国家内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首先用革命手段创造社会化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全面发展社会化生产力，追上或超过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水平。在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遇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比较特殊和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曾经设想在社会化生产力充分发展、小生产基本上被大生产所取代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欧洲一些国家内两种生产力并存的情况，认为在两种生产力并存、小生产占据很大比重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可以而且应当在全国普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应当适应生产力的实际情况。^④

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社会化大生产落后的国家内两种生产力并存的状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为列宁所十分关注。他根据十月革命后俄国“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占据很大优势的现实，总结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尝试的经验教训，提出在俄国建设“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的任务。^⑤这是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考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问题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结论。

两种生产力并存，在社会化生产力的周围广布着“个体的小生产”的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面临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因此，社会化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就具有了新的特殊的内容，这就是要求适应两种生产力并存的局面、适应从小生产力的生产向社会化生产力的过渡。^⑥

个体的小生产的生产力被社会化的大生产的生产力所战胜、所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是近代以来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伟大的革命。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要求，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就是实现从中世纪的封建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⑦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不平衡的。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时候，许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却正在缓慢地开始生产力的这种过渡。可是，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直接实践的任务。社会化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一些国家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继续完成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进程。

可见，实现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完成，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完成。但是，第一，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这种过渡是用不同的办法完成的。资产阶级用的是强制、暴力和剥夺的办法，迫使小农破产变成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则相反，采用和平的、为农民所乐意接受的办法，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小生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取代小生产。

只有把小生产的生产力迅速地转变为社会化的大生产，现代大生产的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才谈得上有“充分发展的自由”。只有整个社会生产力都提高到社会化的大生产的水平，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得到完善、巩固和发展。这是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共同要求。

列宁指出，在两种生产力并存、小生产还占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必须完成两个“过渡”：第一，由资本主义大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第二，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只有实现了这个过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被放置在稳固的基础上。⑧

困难在于寻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适的形式保证和促进后一种过渡的完成。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课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他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宁一贯重视俄国小生产的农业占优势的现实，着力解决把小生产的农业变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任务。开始，列宁设想用组织国营农场、农业公社的“共耕制”的办法，实现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直接过渡”。1921年，列宁改变了看法，提出要采用“完全不同的办法”，“采取新的途径”来建立适应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生产关系的形式。⑨1928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进一步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⑩确定合作制才是适应这一过渡的生产关系的“新的方式”，才是“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至此，列宁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⑪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社会主义合作制承认农民的个体经济，用互助合作的办法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合作制首先从商品交换这一端组织个体农民在“买卖”上的合作，通过这种合作组织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体系，然后逐步发展到农民在生产上的合作与联合；合作制依据互助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主要求助于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运用经济手段把农民的分散经营联结到商品交换的网络之上。列宁认为，“合作制政策施行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易于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⑫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在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党中央对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合作化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它既适应我国农村

普遍存在的小生产的生产力的状况，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有利于促进这部分小生产的生产力向社会化的大生产力转化。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

必须顺应商品生产的发展规律

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进程，是商品生产充分发展的进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实现这一过渡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是，如果违背了商品生产的规律和要求，那么这样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就会延缓甚至阻碍这种过渡的进程。

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是商品生产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化大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同样服从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说过：“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发展规律所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规律本身并不被取消。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转变仍然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所不同的，则是小生产向前转变的方向是另一种大生产形式——社会主义的大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种转变借以实现的途径，是小生产者在经济上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迫使小生产者破产沦为雇佣劳动者。

问题在于联合的形式是否顺应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联合方式。

第一种联合方式，是直接从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这一端开始，在商品生产还没有得到相当发展的情况下，把农民的生产资料简单地直接地合并起来，实行集中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企图绕过商品生产和专业分工充分发展的阶段，从基本上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的农业直接跳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车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过这种联合的模式。另一种联合方式，则是从商品交换这一端开始，鼓励个体农民首先在流通领域内互助合作，繁荣商品生产，促进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生产方面的社会联合，走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活动的社会化，走上社会主义的大生产。

按照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应当优先抓住商品交换这个关键环节，从流通这一端开始，把农民小生产联合起来，走合作制的道路。这样的联合形式，才是既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符合商品生产发展规律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因为：

第一，商品交换、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扩大商品

交换，才能打破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狭隘的界限，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商品生产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的交换，即买和卖，才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这是商品生产的最基本的特征。商品交换及其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进行竞争，走上使用先进技术设备的专业生产道路，引起生产资料的扩大和积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社会生产过程。这是自然经济解体走上社会化生产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条件下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同样不能违背也不能跳越这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把个体农民联合起来实行这一过渡，其联合的方式必须顺应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曾经出现过一种对社会化生产的庸俗的见解，一种莫名其妙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的社会主义”的情绪。^④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商业无关，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商品交换无关，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和商品生产发展无关，认为只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把分散的简陋的生产资料集拢成堆，把分散的个体劳动变成“直接集体劳动”，小生产就变成了“大生产”。列宁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⑤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说明，从分散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自然过程，首先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决不单是诉诸行政手段所能奏效的。

第二，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解体是无条件的前提。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不能走资本主义社会剥夺农民，使农民破产的发展商品生产老路，而是按照互助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联合农民走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路。首先在流通领域中把个体农民联合起来，是农民所唯一能够接受的，也是他们所容易习惯的办法。农民走出了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狭隘的圈子，走上了通往社会化生产的坦途，但农民并没有被剥夺。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是共同富裕的前景。

第三，流通领域的合作便于发展农民经济和社会化国营经济的结合，便于把农民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营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商品流通的体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农民合作经济的强大的后盾和指导者。但这种支持和指导主要通过商品交换的渠道来实现。农民在商品交换方面实行合作，经过这种合作组织与国营经济发生联系，接受国家计划经济的指导和调节，可以把商品生产的盲目性限制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就为农村商品生产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千百万个体的、家庭的或农户联合的专业化生产经营单位通过合作组织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有机体的“细胞”，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总体系的一部分，——这就是合作制给我们展示的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前景。

可见，商品交换是联合农民从小生产走上大生产所必须抓住的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和具体要求出发，尊重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寻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适应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是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重要课题。列宁的合作制理论，给我们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顺

应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推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新模式，改革了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旧模式，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大大推动了从小生产生产力向社会化生产力过渡的步伐。实践证明，只要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具体情况，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制形式，走中国式的合作制道路，我们一定能够较快地实现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发展强大的现代生产力。

①②③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7--319、309、445 42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④参阅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⑤⑧⑭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6、523、580页。

⑥“小生产”这一概念，原意是指“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6页）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小生产的生产力”指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相区别的带有自给经济性质的分散的、落后的、手工的生产。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基本上不存在了，但与“大生产的生产力”相区别的“小生产的生产力”还会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⑨参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1、575、617--619、577—578页。

⑩⑪⑫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4、687、528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8页。

⑮参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1—42页。

论科学的领导观

邹永图

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以及各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员，应当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观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这里提几点粗浅的看法，作为引玉之石，以期得到指正。

（一）领导活动的本质，是领导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社会实践

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活动的系统中，领导主体是各级领导组织和人员，而领导客体则是广大群众。因此，领导活动的对象，同生产活动的对象不同，不是自然界的物，而是社会存在的人（包括下属和群众），其直接目的不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存在的人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因而领导活动有自己特殊的本质。但是，领导活动与生产活动有共同的本质，这就在于都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的活动即社会实践，只不过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和特殊本质罢了。就是说，领导活动决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精神的活动，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活动，而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有机联系的过程。这种过程是连续的、反复进行的，同时又是不断提高的。但是，科学抽象允许把这个统一过程，相对地区分为两个互相联系的阶段：首先是“物质变精神”，然后是“精神变物质”。这是两次互相联系的飞跃。

实现正确的领导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决策，在于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但是这些精神的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领导者头脑中固有的，而首先是广大群众进行实践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领导者进行领导实践活动的产物。从客观实际出发，事实求是，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石。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最基本的客观实际，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存在。脱离了群众，离开了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离开了群众的实践、经验以及在群众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谈不上正确的决策，就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但是，正确的决策等等精神的东西，又不是群众实践自发的产物，必须经过领导者自觉的实践活动。列宁说过，“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①在“物质变精神”的阶段上，领

导者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在实际中的考察、调查等等活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周密的调查是科学决策的前提；“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②领导者在周密调查、考察得到的感性材料和各种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大脑的科学分析、加工和处理，最后才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合乎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精神产品，实现“物质变精神”的飞跃。

然而，最能体现领导活动本质的，却是“精神变物质”的实践，这是更为重要的飞跃。由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三者构成的有机统一的领导活动，其直接目的是对被领导者即广大群众和下属人员的指挥、组织、发动和协调，使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决策目标；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实现决策目标，使之转化为新的社会成果、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对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界的改造。为此，就有赖于领导者把正确的决策，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计划等等精神的东西，灌输到群众和下属人员中去，为他们接受并变为他们的行动，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这是一个把群众和下属人员的自发性的实践提高到自觉实践即为决策目标去活动的过程，是一个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因而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认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行动”，是一项马列主义的领导艺术。领导活动的本质在于实践，还可以从衡量领导活动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上来看。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

如果以为领导者的责任之一是“出主意”，就认为领导的本质不是实践而是精神活动，那是本末倒置的错误理解。因为即使再好的“主意”，也不是主观精神自生的，只能从实践中来。当然，任何正确的领导首先在于决策，在于掌握方向，因而从实际出发，在实践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形成决议和指示，对于领导者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写决议、作指示还不等于领导，更不能体现领导的本质。斯大林强调指出：“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④可见，领导的本质，在于“执行”决议和指示，在于“生动的实际工作”，在于把精神的东西变成物质的东西的行动，一句话，在于实践。在我国“四化”建设的新时期，领导实践在当前首先集中表现在率领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活动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解决，不能用以往的社会革命的方式，只能运用改革这种社会实践形式，即改革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改革不适应于经济基础巩固的那部分上层建筑。各战线、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改革任务，都应当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这就决定了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在于改革。

(二)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领导活动的基本职能,

是对政治、经济、科教文进行全面而有效的管理

社会管理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 是由人们的共同劳动和共同活动引起和决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并进入建设时期, 标志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完成了决定性的一步。因而, 自觉地有计划地对社会进行全面而有效的管理, 正是建设时期的领导活动与战争年代的领导活动不同之处。这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的, 我们主要的和迫切的任务, 就是管理、组织和监督。^⑤就是说, 建设时期的领导应当在正确决策的前提下, 通过具体的管理, 把它付诸实施, 合理而有效地组织、指挥、调节、监督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 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列宁在逝世前的一个时期内, 曾针对俄共(布)的领导活动, 多次反复强调管理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教育说:“做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 是否了解他们不会做管理工作呢? 是否了解他们以为自己在领导, 其实是被领导呢? 如果他们能够了解, 那他们当然学会做管理工作。”否则, “他们到处发号施令, 结果完全事与愿违。”^⑥这对于我们今天“四化”建设的领导活动, 同样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 一个是学经济学, 一个是学科学技术, 一个是学管理。”^⑦就是说, 现代领导的职能不仅要指明前进的方向, 而且应当找寻率领群众前进的具体途径。因而领导决不能停留一般号召, 必须实行具体管理。否则, 领导就是落空的, 就不会成功。对一个部门、单位的管理, 是十分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用列宁的话说, 这是“有关能力的事, 有关技巧的事”。它既包括对人、财、物的行政管理, 又包括对业务、技术、计划、规章的管理, 还包括对时间、信息、效能等等的管理。

在新时期的领导活动中, 每一个领导者, 不论职务高低, 只有从做具体的管理工作, 才能从根本上扫除那种“一杯茶一枝烟, 看看报纸聊聊天”,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和懒汉作风, 才能提高领导的效能, 真正地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列宁曾经强调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 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 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 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⑧这不仅是对于经济战线的领导者的要求, 而且也是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干部。毛泽东同志也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 使自己成为内行, 又红又专。”^⑨领导者是管理内行, 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为领导活动的成功, 提供了重要决策、长远规划、综合治理、人材使用以至突然事故的妥善处理等方面的可靠的牢固的基础。

要实现领导就得有管理本领, 要管理就得内行, 这应当成为实现建设时期正确有效的领导活动的规律。这不仅因为领导者所负的权责的运用关系重大, 而且更重要的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对此, 列宁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

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⑩列宁的分析说明，与社会主义大生产相适应的领导特征在于唯一性，或叫唯一权威性，而不是多头领导，不是政出多门。领导的唯一性的实质，就是谁领导这个部门或单位，谁就要对它的成败负全部责任；反过来，谁要对它负全责，谁就有全权管理它。毋庸置疑，这是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的必然要求和产物，这同那种主观主义的“个人说了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否认了领导的唯一性原则，多头领导或政出多门，那么，其结果一定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甚至互相牵制、摩擦丛生，导致延误时间，降低效率，贻误工作！但是，领导唯一性原则，只适用于管理内行的领导者。如果这一原则变成了外行的领导者的独断专行、瞎指挥、乱拍板的借口，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必定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

（三）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手段和途径，在于恰当地使用人才，精细地挑选人才和不断地培养人才

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人是一切事物中最宝贵的东西，世间的奇迹均为人们所创。因而人是一种决定性的能动的因素。但是，只有处在正确的组织下、领导下活动的人，才是自觉的，才能有效地发挥创造世界的能动作用。所以，选能举贤、“调兵遣将”、培养人材，这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其实现自己的领导并取得成功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⑪周恩来规定的五项“领导者的任务”之一，就是“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⑫无数的事实说明，纵使有再正确的路线，再好的政策，再恰当的决议，如果没有得力的干部去贯彻执行，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它决不会自动地在群众中起作用，决不会变成物质力量。所以，斯大林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同志强调，使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虽然一个领导者必须内行，但不必事事强过别人。不过，一定要有超群的“用人”的才干，才能做一个高明的领导者。这在古今中外是不乏其例的。汉高祖刘邦说过，他打仗不如韩信，管理不如肖何，运筹不如张良。但是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可以取天下者也。”三国时的刘备，既无孔明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才能，也无关、张盖世过人的武艺本领，但他能“桃园结义”，恰当用人，又能“三顾茅芦”，爱才如命；因而由弱变强，竟与曹、孙争雄，三分天下。由此可见，领导者是否爱才惜贤、知人善任，关系到领导的成败、事业的得失以至国家的兴亡。

我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依据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为完成“四化”大业和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各级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和决策，是完全必要和十分适时的。虽然，没有革命化，领导者就会迷失方向；没有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就不会有内行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本领，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就不能实现对群众和下属人员的有效领导。

领导的成败在于用人。然而，用什么样的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同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用人要求。我们首先要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反对“任人唯亲”。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领导者和干部的“贤”，其内容是变化的。在我国当前的新时期，“贤”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德、才、学、识、专等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为“四化”忘我工作，便谓之有“德”；善于分析综合，多谋善断，有决策的魄力，善于人事的组织调配，有统筹兼顾和及时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则可称为有“才”；善于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富于创新和进取精神，不断赶超先进、革除旧习，进而不断提出新思想、新方案、新办法，是属善“学”；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知识修养，了解本行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解决复杂的业务和技术问题的科学根据，则可算有“识”；或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或有深厚的技术水平，或有精通的业务能力，或有过人的组织才能，或有内行的管理本领……可列为“专”长。这五者是互相联系的，相互制约的，无“才”不足以显“德”，无“学”无“识”则难以称“才”，不“专”则无法创新。它们是一个现代领导干部不可缺少的基本素养。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尺”。“唯贤”的基本要求，不可不要，也不可苛求。否则，“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变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根本谈不上领导。

领导者“选能举贤”挑选合格的人材，是重要的一环，但“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合理地安排、调配和使用人材，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把“选人”与“用人”结合起来。世称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历史为训，尖锐地指出：“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岗位，就应当配备相应的合适的人去任职，则可成功；相反，把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或吹牛拍马的无耻之徒，给其高官厚禄，则会天下大乱。选择人材不易，调配人材更难。象孔明那样的军师，有时也用错人，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列宁曾以指挥乐队来比喻领导者用人，形象地阐述了用人的辩证法。^⑩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的领导者，要根据某一岗位的任务和条件，及时地合理地调配干部和人员，决定谁去谁留；必须全面了解干部和人员的情况，进行考核、检查、督促，决定赏、罚、升、降；还要给干部和人员以一定的“练习”和培训的机会，造就各类型的接班人才。

任何单位或部门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其内在的结构和层次，不能混淆，因此，所谓领导者的“知人善任”，还应当包括放手和信任下属干部和人员。责与权应当是统一的，定责必授权。上级领导切忌包办代替或干涉插手下级干部职权之内的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一位最佳的领导者，是一位知人善任者，而在其下属甘心从事于其职守时，领导要有自我约束力量，而不可插手干涉他们。”就是说，应当是层层负责，而不

是隔层负责。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必要的干预是允许的。周恩来曾经讲明，“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④

（四）完成领导任务的基础和动力，在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在于坚持走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根本出发点。

第一，没有群众，就不存在领导地位。领导只是相对于被领导的群众而言的。领导者是群众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群众利益的代表，是群众直接或间接推举出来为他们谋福利的人物。因此，群众任何时候都是领导得以存在的基础，离开了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存在各种领导人。试想，没有广大奴隶的反抗，怎么会有斯巴达克？没有广大农民的起义，怎么会有陈胜、吴广、宋江、洪秀全？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又怎么会有马、恩、列、斯？当然，群众同样需要领导者。因为群众活动往往具有自发性，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需要领导者去反映、去代表；群众的经验、智慧和才能，需要领导者去总结和集中；群众的生产、工作和活动，需要领导去组织、去管理。否则，群众的分散性、自发性等倾向得不到克服，因而形成不了战斗的力量。群众需要领导，表明领导的主要对象是群众；同样，领导必须依靠群众，失去了群众，领导就会落空。可见，领导与群众是互相依存、互相需要又互相区别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统一体，正是两者的又对立又统一，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发展。

第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唯一正确的领导路线。无数事实证明，再高明的领导者，也不过是一个“加工厂”，其原料只能来自群众。凡属正确的领导，必定是从群众来的，必定是在群众实践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系统研究的结果。与此同时，凡属正确的领导，又必定是不以正确“集中”和“出主意”为结束，而是把“成品”送回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变为物质力量。只有这样，经过多次循环往复，才能真正地把“群众——领导——群众”的领导路线，同“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不断取得领导的成功。列宁说得好：“如果我们想始终不愧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下层和深层中间去工作，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工作。”^⑤这应当成为每一领导者的座右铭。

第三，正确领导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必须依靠群众。周恩来所规定的领导者五大任务最后一项，就是“面向群众”。一般说来，每一个具体的领导过程，可以分解为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作出决议，组织执行，督促检查。实践证明，每一具体的领导环节的完成，都必须“面向群众”。对此，斯大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会到我们领导的结果；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

面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作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⑩当然，领导必须面向群众，并不等于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放弃领导，玩忽职守。领导应该说服、引导和教育群众的原则。

面向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是领导者取得力量的源泉，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对领导者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使各级干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有利于提高党的威信；它可以使干部倾听到群众的呼声，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有利于改善领导者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它有助于提高领导者的才能。周恩来总理生前谆谆教导各级的领导人员：“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与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的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⑪毋庸讳言，我党执政之后，有些领导人员，在与群众的关系上，发生了变化：从“血、肉”关系、“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以至“猫、鼠”关系。这不仅违背了总理教导，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的形象和威信，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必须坚决克服和纠正。

在改革潮流中，不断涌现出既有科学的领导观武装自己，又讲究领导方法和艺术的手段领导者，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第20页。

③⑦ 《邓小平文选》第123页、第143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2页。

⑤ 参阅《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7。

⑧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4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

⑩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0—521页。

⑪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3页。

⑫⑬⑭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0页、第129页、第131页。

⑯ 参阅《列宁全集》第6卷第219页。

⑰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第307页。

⑱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45—146页。

章太炎伦理思想述评

沈善洪 王凤贤

章太炎(1869—1936)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其学术思想内容广博,变化多端:从一个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演变为以佛教唯识宗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从大谈“儒术之害”,“激而抵孔”,最终“粹然成为儒宗”;从近代进化论的信奉者,蜕变成“进化绝望”论的鼓吹者;在大力提倡以救亡图存为内容的“革命道德”论的同时,又鼓吹虚无主义的“五无”、“四惑”论。探讨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从中吸取思维教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仅就章太炎的伦理思想,作些初步的探讨和评述。

救亡图存的“革命道德”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直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从爱国救亡的政治需要出发,论述了提倡“革命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他在1903年发表的《革命之道德》^①一文中强调指出,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光复中国”为内容的革命,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天步艰难”、“如坂九折”的伟大事业,即使有墨家那种“摩顶放踵”的精神,还难保成功;至于混迹于革命队伍的那些“柔脆怯弱”、只知发表空论的人们,就一定要败坏革命事业。他认为,没有道德高尚的“黄中通理之人”,要完成革命任务是不可能的;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②章太炎对于戊戌变法和庚子之变中死难的人们是深表钦佩的,曾撰文赋诗以记之,为什么又说戊戌变法和庚子之变的失败,都是“党人之不道德致之”呢?其实并不矛盾。按章氏分析,不仅死难者的政治态度和道德情操并不完全相同,而更重要的是这类党人中的有些人“道德腐败”,“没于利禄”,谁也不肯为

拯救这些死难者而“效死”。章太炎得出结论说:“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③

章太炎总结历史教训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当时的革命者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在歌颂了华盛顿曾经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掉下急流中的一个少年的事迹后指出,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④章太炎把道德视为革命成败的决定因素,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他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论断,却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它不仅强调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品格,而且也说明了发扬革命的道德风尚对于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作用。当时他所主张发扬的道德情操,就是直接为救亡图存的革命事业服务的。他说:“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因此,他一再呼吁要有“爱国之心”,“勇悍仁强之德”。对于如何发扬中国传统道德的积极因素,他则提倡顾炎武的“知耻”、“重厚”、“耿介”这三种品德,并加上“必信”。“举此四者”,“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不是在乎。”^⑤

在阐发“革命道德”论时,章太炎还模糊地意识到,道德情操与社会地位是有一定联系的。他说:“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他把社会职业划分为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这样十六等,并认为“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这种以社会职业来划分“道德第次”的方法,当然是不科学的。但其中却贯穿着以社会地位的高下来分析道德状况的意思:“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各等职业的人,章太炎则责其‘多不道德’,但也

不一概而论。认为在学识广博的“通人”中，也有“志在民生”的，而且革命的提倡者“多在通人”。⑥

尽管章太炎在论述革命道德的地位作用和社会根源方面，发表了一些卓越的见解，但他毕竟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问题，因此，最终还只能求助于建立一种无神的宗教，作为鼓吹“国民道德”的精神支柱。1906年7月，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到，近日办事方法最要紧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⑦

同年11月，章太炎发表了《建立宗教论》一文，认定道德起源于宗教，“尝试论之世间道德，率自宗教衍生。”当然，他并不信奉有神的宗教，不主张去崇拜根本不存在的上帝、鬼神。他所要建立的是崇拜“心”、“识”的非人格神的宗教，并认为佛教唯识宗就是这样的宗教。章太炎处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深深感到“道德堕废”，对于民族前途的严重威胁。觉得要治疗这种痼疾，孔教和理学都无济于事，只有提倡佛学唯识宗，才能起到净化道德，增进民德的作用：“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⑧宗教的道德功能，早就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所否定，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章太炎，却如此狂热地鼓吹宗教伦理，特别是佛教的教义，尽管他出于净化道德、爱国救亡的善良动机，但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消极的。

虚无主义的“五无”、“四惑”论

章太炎一方面宣传“无我”之说，认定“无我”为佛教的根本思想，强调要破除“我见缠束”，一面又欣赏费希特的“自我”创造一切，“自我”之外没有独立自在之物的主观唯心论。认为“无所谓他，即唯是我”；“人人自证有我，不得举依他幻有之性。”并以此来论证佛教大乘“以众生为我”的观点。这是最典型的“唯我论”。

从这种“唯我论”出发，章太炎把“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绝对化，误入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歧途。他认为一切团体都是虚幻的，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他说：“若以原子为实有，则一切原子所集成者并属假有。何以故？分之则各还为

原子故。”以此类推，一切个体均为“实有”，而“其集成者”均为“假有”。由此得出了“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⑨的结论。

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一切团体包括国家在内，都不是神圣的，也是无所作为的。一切事业都是由个人造成的，一切功绩都应当归于个人：“凡诸事业必有一人造成。乃得称为出类拔萃。其集合众力而成者，功虽煊赫，分之当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誉，亦不得以团体举其名誉。”⑩既然是“一人造成”，怎么又有“众力而成”、“功虽煊赫”的问题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集体之力与个人之力，团体之功与个人之功，不仅仅是单纯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质上的差别。章太炎的论断，不仅犯了夸大个人作用的历史唯心论的错误，而且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不过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那就是包含着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精神，主张把国家和团体的功绩，“还即各各人民之所自有”，而且认为把“功名率归元首”，犹如“工场主人之窃利。”⑪

正因为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团体都是虚幻的，不神圣的，甚至是“邪恶卑贱”，束缚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所以章太炎提出了“五无”的主张：“一曰无政府”；“二曰无聚落”；“三曰无人类”；“四曰无众生”；“五曰无世界”。他认为实现“五无之制”，要有一定步骤，并“期以百年，然后递见五无之制。”⑫不过，章太炎毕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在诅咒了一番国家和政府之后，生怕人们发生“迷妄”，以为连“爱国”、“救国”也大可不必了。于是，他又发表了一通解释和补救的言论。他强调“国无自性而可以爱”，“国不当设而不可无”，“国非神圣而可以救。”⑬

在发表《五无论》的第二年即1908年，章太炎又发表了《四惑论》：“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唯物；四曰自然。”并认为这些都是“眩惑失情”的谬说。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剖析“四惑论”，就是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在，完全否认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凡人“裸胸而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所以，“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所谓“责任者后起之事”，“必有所负于彼者，而后有偿于彼者。若其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矣。”⑭然而，人类总是合群而居，互相依赖，协力扶持，才能得到生存和发

展，怎么能同社会和他入毫不相干呢？对此，章太炎求助于老庄，认为只要“无害于人”，任何自主的言论和行为，都合乎道德，是无可非议的。^④这种独立自处，互不侵犯的伦理观念，与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显然是相通的。为什么又同庄子的思想相符合呢？因为章太炎认为，独立自处，互不侵犯的伦理观念与庄子《逍遥游》和《齐物论》的思想是合拍的。他曾经说过：“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主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⑤人类不为“相害而生”，亦不为“相助而生”。“凡有害于人者为之恶人”，而“恶非所当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凡有益于入者为之善人”，但“善亦非人之责任”，“不得迫之行使”。所以，“无害于人”，“无益于人”，都不应当承受道德舆论的非难。

章太炎坚持这种伦理观念，把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公理”论。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天理”论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公理”论作了比较，认为“天理”论“锢情灭性”，“公理”论放任“男女饮食之事”，只有这点差异。至于束缚“个人之自主”，二者是相同的。并且强调指出：“公理论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然则以众暴寡甚于以强凌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⑥由此可见，章太炎虽然既反“天理”论，又反“公理”论，但却更憎恨“公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剥削与压迫日益加深，对外的殖民掠夺和屠杀愈演愈烈，对此怀有切肤之痛的章太炎，起来揭露“公理”论的虚伪性和残忍性，这无疑正义的举动。问题在于究竟以什么态度来剖析“公理”论。看来，章太炎是以小生产者的狭隘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的，他完全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天赋人权”的“公理”论的历史进步意义，甚至把它说成是比封建禁欲主义的“天理”论更坏的东西，而热衷于从老庄思想中寻找“自由平等”之义。这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现象。

章太炎把个人作用和个人自由绝对化的思想，其哲学基础是所谓“依自不依他”的主观唯心论。他所信奉的佛学唯识宗，任意夸大“心”、“识”的作用，认为“境缘心生，心仗境起”。^⑦“芸芸万类，本一心耳”。^⑧并认定一切“真伪”、“是非”，“初无定轨，‘唯心所取’”。^⑨他还欣赏尼采

的“超人”，“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提倡这种精神，“于中国前途有益。”^⑩同时，章太炎认为中国明末的抗清人士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人士，所以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都是以王阳明的学说为指导的，而王学的“自尊无畏”的思想，又来源于佛教“依自不依他”的哲学。他不仅把王学和佛学划上了等号，而且还追述到孔学，认为“中国所以维持道德者”，“孔氏而后，儒道名法，交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由此，他还得出了“汉族心理不好依他，有此特长”的结论。章太炎提倡这种“依自不依他”的精神，固然包含着要发扬“厚自尊贵之风”和懂得“民族之可爱”^⑪的积极意义，可惜的是，他把这种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完全建立在佛学、王学以至尼采“超人”哲学这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

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

章太炎的伦理思想，不仅以佛学唯心论为哲学基础，还有他关于人性的一套理论，而这种人性论，又是同他对人类进化问题的理解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早期的章太炎，是近代西方进化论的信徒。他在当年发表的《菌说》、《公言》、《原变》等论文，都宣传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生物进化论。他肯定生物进化论“其言之不虚”，^⑫反对“上帝造人说”。他强调从细菌发展到人，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在讲到人类进化的时候，提出了“以器相竞”、“以礼相竞”的观点，并认为这已为地下的发掘“石也，铜也，铁也”^⑬所证明。在认识起源的问题上，章太炎赞同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关于人的心灵“本如白纸”和荀子关于一切感觉“缘天官”的观点。基于这种唯物主义的识论，当时章太炎所持的是感觉论的道德观。他既反对先验的“性善论”，也不赞同天生的“性恶论”，而同意培根关于“一切道德，皆始自利”的观点。他认定人们生来是“无善无恶”的，“自社会言之，则有善恶矣。”^⑭意思是说，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都是在后天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然而，在章太炎所处的时代，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使他感到用西方的生物进化论难以解释清楚。于是，他在1906年9月发表了《俱分进化论》一文，认定生物和人类的进化，并不是“由一方直线”前进的，“而必由双方并进”。“若

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由此出发，他认为由生物到人固然是一种进化，但“人类之残暴”却甚于虎豹。虎豹“不自残其同类”，而“人有自残其同类者”。古代原始人，为了“争巢窟、竞水草而相杀者，盖不可计。”但那时还没有国家，互相残杀的器械也很落后，所以杀伤还不甚大。国家产生以后，“浸为戈矛剑戟矣，浸为火器矣，一战而伏尸百万，喋血千里，则杀伤已甚于太古。”而且“杀人以刃，固不如杀人以术。与接为构，日与心斗，则驱其同类，使至于悲愤失望而死者，其死又多于战，其心又懦于战。”所有这些，都是“虎豹所无，而人所独有也！”“由是以观，则知由下级之哺乳动物以至人类，其善为进，其恶亦为进也。”^②

这种“善恶并进”论的理论依据，就是章太炎的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何以并进？一者由熏习性生物本性无善无恶，而其作用可以为善为恶。”在此，他又运用了佛教唯识宗的教义，认为一切生物中都存在着一种“杂善恶”的“起始种子”，它受到种种“熏习”，“伏藏其间”的“善”、“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种子不能有善而无恶，故现行亦不能有善而无恶。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此最易了解者。”^③按照这种观点，生物愈进化，善恶之力亦愈进，二者之间的对立也就愈明显。

应当承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善恶俱存，并向两极发展，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的侵略本质日益地暴露出来，加上国内清朝封建统治愈来愈残酷，社会道德风尚亦日趋颓丧。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肯定欧洲各国“君臣男女之崇卑日渐划削”，“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是“社会道德之进善者”；但“物质文明”以后，“人所尊重者，不在爵位而在货殖”，造成“富商大贾之与贫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而且“诸雇佣者之事其主人，竭忠尽瘁犹必以佞媚济之”，“此非其进于恶耶！”在讲到日本的情况时，章太炎指出，“日本维新以后，以新道德与旧道德相参”，一方面，人们甘“为国家死难，此固社会道德之进善者”；另一方面，“国势渐隆，法律渐备，纳其臣民于轨范之中”，而且人们都“为富贵

利禄而动”，“此其恶之进亦既如此矣。”说到中国，他认为“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④这些情况说明，章太炎确实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现象，但他并不懂得这些现象的阶级实质，说他的思想已经具有阶级斗争理论的初步形态，这种估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俱分进化论》中，章太炎虽然讲“善恶并进”，但强调的却是“恶”的方面，对于人性的看法也是如此。他曾说：“今检人好真好善好美而外，复有一好胜心。好胜有二，一有目的之好胜；二无目的之好胜。”凡是追求五欲、财产、权位、名誉而起竞争者，“是为有目的之好胜。”如果不是为了追求这些“而起竞争者”，“是为无目的之好胜。”总之，他认为好胜者，“纯是恶性矣。”^⑤

到了发表《五无论》和《四惑论》的时候，章太炎就明确地倾向“性恶论”了。但他反对荀子关于“以礼法治之”的主张，因为既然人性皆恶，而把持礼法者犹恶，这岂不是“以恶人治恶人”吗？！章太炎认为，人之天性，好淫好杀，他的“五无”主张，就是建立在这种“性恶论”的基础上的。为什么主张“无政府”呢？这是因为“独立杀人者其害微，聚众杀人者其祸剧”，“而政府自体，乃适为计谋聚众以杀人者，则乌得不舍此之重而就彼之轻耶。”他谴责“独一桀纣”杀人和战国“七雄相争，民如草芥”，“尚不如近世帝国主义之甚。”又为什么主张“无人类”呢？因为“芸芸万类，本一心耳”，“杀机在前，生理在后”，“人皆著我”，“好胜之念见之为争。”所谓“恻隐之心”，都不能制克好胜之心。“人之所怜在彼弱小于我，而所憎在其敌对于我。即彼恻隐心者，亦与好胜心同一根柢。”所以，只有“无人类”，才“终不少留斯蠹以自祸祸他也。”不仅如此，还得“无众生”才行。因为生物进化的历史表明，“自毛奈伦极微之物更互相生至人类。”尚有生物存在，“则人类必不能断绝。”所以，“无生而断后有，此则与无人类说同时践行者也。”^⑥从表面上看，章太炎的“五无”论同康有为“除九界”的大同说，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其实质却很不一样。康有为的大同说虽然也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但他是“以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为出发点的，是以乐观主义为基础的。章太炎的“五无”论则不然，他在谈及光复革命时满腔热血，而在论述“五无”、“四惑”时却冷若冰

霜，陷入了悲观主义的绝境。

章太炎之所以陷入这种荒谬的“进化绝望”论，当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从总体上说，章太炎当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但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理和愿望。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落后性交织在一起，加上以佛学唯识宗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使他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种种矛盾的面

前，误入了歧途。他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却害怕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实行代议民主制；在经济思想上，他害怕出现“富民”，主张“均配”土田以至矿山、产业等等；在伦理思想上，他一味讴歌小生产者“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的品德，把“好胜”、“利禄”、“竞争”等等，一概斥之为“恶行”。凡此种种，比之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思想，也大有逊色。

- ① 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当时题为《革命道德说》
- ② 同①
- ③ 同①
- ④ 同①
- ⑤ 同①
- ⑥ 同①
- ⑦ 章太炎：《演说录》
- ⑧ 章太炎：《建立宗教说》
- ⑨ 章太炎：《国家论》
- ⑩ 同⑨
- ⑪ 同⑨
- ⑫ 同⑨
- ⑬ 章太炎《四惑论》
- ⑭ 同⑬

- ⑮ 章太炎：《国家概论》
- ⑯ 同⑬
- ⑰ 同⑦
- ⑱ 章太炎：《五无论》
- ⑲ 章太炎：《齐物论释》
- ⑳ 章太炎：《答铁铮》
- ㉑ 同㉑
- ㉒ 章太炎：《菌说》
- ㉓ 章太炎：《原变》
- ㉔ 同㉓
- ㉕ 章太炎：《俱分进分论》
- ㉖ 同㉕
- ㉗ 同㉕
- ㉘ 同㉕
- ㉙ 同⑱



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何允许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

黄循平

目前,我国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把大量外商吸引到境内特别是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举办“三资”(合资、合作、独资)等经营企业,尽管这几种企业与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结合,但都是无产阶级政权同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这些企业一方面允许采取特殊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另一方面又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和调节,按列宁的说法,这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①这种经济成份性质无疑是国家资本主义。对此,不少人感到费解:建设了三十多年并有一定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何要允许这些含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存在?这种经济成份的存在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剥削、损害我国主权和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今世界是开放性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作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使那种地方和民族的各方面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科学论断^②已经被历史所证实。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迅速兴起和广泛应用,各国经济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从商品经

济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要稳定和持续发展,就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充足并且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广阔纵深的市场。这些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当今世界中即使是发达的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具备这些因素。所以,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要依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通过对外开放来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采取各种形式、渠道来吸引别国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如美国从1980年以来,每年吸收的外国投资都超过600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4倍多。新加坡从1965年到1984年的20年间注入外资从1.57亿新元增至194.29亿新元,增加123.7倍,从而使本国经济获得较高的增长率。在措施上,发展较快的国家大都采取设立经济性特区来吸引外国投资办企业,目前全世界已有82个国家建立了500多个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经济性特区,单新加坡就多达21个。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于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对开放性的世界,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孤岛关闭起来搞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按照世界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大力发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

以各种形式来获得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举办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就是我国发展同世界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不是一项任意的规定，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的重大选择。

二、我国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根本任务所决定的，并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国社会主义虽然建设了三十多年，但由于原来经济落后，又长期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和技术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三十年。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件复杂、艰巨的事情，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目前，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刻不容缓的中心任务，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和技术落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客观上要求我国不应该从纯粹的公有制观点出发，而应从实际出发，以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多种经济形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三资”经营企业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其中的一种，尽管它不属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但可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是我们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科学的重要桥梁。利用外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贷款，二是直接投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属于直接投资方式。目前一般难以得到国际金融低息优惠贷款，商业性贷款利息高，负担重。而直接投资方式让外商来我国直接投资合作办企业，把投资者与自身利益挂起钩来，与我方共担风险。世界上技术一般跟着资本金，特别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外商为了在国际市场占据有利地位，必然带进一些较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高级技术与高级管理人员，并培训我方工人和中下级管理人员。这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开辟了新的渠道。据统计，从1979年国家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开始到1984年底，已建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931个，中外合作经营企业2,212个，外商独资74个，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达100亿美元，已实际使用41亿美元，仅四个经济特区已实际使用达8亿4千万美元，这些企业引进的技术和设备约有30%是世界比较先进的。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属生产性行业的有635个，占总数68.2%，^⑤并初步发挥了经济效益。通过外商投资设厂不仅弥补了国内资金不足，引

进了先进技术，而且能把外资、技术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结合起来，既可以从税金和土地使用费中积累资金，解决劳力就业问题，而且还能通过国际交往发挥瞭望世界经济动向的窗口作用，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并转移到国内的连锁作用，将大大加快老企业技术的改造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这类经济正如《决定》中指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④

我国允许“三资”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份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国际形势来看，近年来世界上大约有8千亿美元的银行存款和流动资金，有100多万项新技术，但目前世界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投资有限，资本、技术设备过剩急需找出路。而我国既处于经济中心逐渐移来的亚太地区并拥有巨大资源和投资场所，能容纳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从我国形势来看，我国是政治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加之政局稳定，近年来又设立了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陆续制定了有关法律条例，从而保证了投资者的利益，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另外，我国在工业、技术、交通、能源方面也有一定基础，既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又有吸收、消化先进技术的物质基础和实力。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可以争取利用一部分外国资金和技术，并借此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的。

三、我国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在经济上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受剥削，但这是政策所允许的，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外商来投资设厂主要目的是追求利润。社会主义引进外资并没有改变资本输出的本性，这必然存在剥削。允许剥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似乎是离经叛道的，但其实不然。这个问题，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已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精辟的回答。列宁根据当时苏维埃俄国生产力不发达、底子薄的实际情况，提出并采取了利用外国资本的租让制、合同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起到积极的作用。当时苏联与外商签订的租让合同就多达210多个。列宁还把给资本家的利润称之为给资产阶级“贡款”。尽管我们情况与当时的苏联不同，但列宁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从现实看来，外商一方如拿不到超额利润，

他是不会投资的,这意味着此种投资包含有剥削,但我方能借此大量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为我国争得时间,赢得速度,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较快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么,给外商的这一点贡献与我们由此取得的社会效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它表明外资的这种剥削是应该允许的。从更高更远一点来看,也并不违背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宗旨。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消灭剥削,除了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外,还主要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通过举办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用资本主义中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这种措施应该说是与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统一的。

另外,“三资”企业这些剥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是有区别的。其一,这种剥削是受一定限制的。因为这些企业所获得的利润,都不是全部归资本家所有,独资企业必须按其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事先订立的合同确定的规定上缴税收和土地使用费;合资、合作企业除上缴上述税收外,还须在社会主义国家或集体和资本家之间按资进行再分配。而上缴国家的税收则转化为社会主义利润,成为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其二,“三资”企业中的劳动者虽然在经济上受一定的剥削,但不会改变其政治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统治是联系在一起

的。但在我国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同样广泛地享受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各种政治和民主上的权利,是社会主义的主人。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不会损害我国主权和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国举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企业时,都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并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利益。“三资”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我国有关法律,并在规定的范围条件下开展经营依法获取利润。绝对不允许象旧中国那些外来企业那样随心所欲。当然,我国法律也保障外商的正当利益。

我国已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950年至1983年累计,单工业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加上流动资金已达1万亿元,而1984年底“三资”企业才达3,317家,在全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三资”所占比重很小,仅0.9%左右。其次,凡是外商投资项目,从投资方向、投资方式、利润大小、投资地点、经济技术效益等,都是经过我们论证和经一定主管部门审批的,总的经济活动也在我国宏观计划经济的指导下进行。所以,有计划的引进外资、举办国家资本主义成份企业并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冲击不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P244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254—255

③ 《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7月8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⑤ 《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7月8日



文艺批评方法论更新之我见

肆 僧

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更新，首先有待于文艺批评观念的更新。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问一声，什么是文艺批评，它的对象、性质、功能、价值等等何在？惯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说：创作是大树，批评是木耳。在某种意义上，这颇为中肯。批评的既往史中，这种现象诚不少见：凡作家论，大抵是时代背景、思想意义、艺术成就、阶级局限等等；凡作品论，则无非是主题、人物、情节、语言云云。单线沿进、僵化固定的汤头歌诀般的模式，常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药品说明书：处方、功效、禁忌症。……

然而，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吗？并不。先让我们把创作批评两者作一个比较吧。就其对象世界而言，文艺创作原始材料来自广阔的自然界、社会生活及人类的深层情绪（不仅是情感）体验。“一花一世界”，每滴在阳光下消逝的露珠都放射无尽的光彩，无限的世界和无限的人生都这样地展开；而文艺批评的对象世界都是艺术家们所创造的有限的符号世界（这里的符号是广义的，我们把建筑空间、舞蹈身段、音乐旋律等都视为承载了人类意义的符号）。即是说，艺术家所面对的是原生形态的有机的第一自然，而批评家所面对的是符号化的第二自然。就形态而言，艺术作品作为符号化的第二自然，其自身具有形象的直观性，情感的直接性、意蕴的朦胧宽泛性；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批评，却具有概念的间接性、明晰性和规范性。就接受途径而言，艺术作

品主要诉诸人的感觉、情感、想象；而文艺批评则主要诉诸于人的知性、理性和推理。

然而，在社会本质上，情况则不同了。每个人生活在大地上，承担了历史的积尘和时代的风烟，也承担了自身的无可更替的经历。艺术家然，评论家亦然。人便这样自觉不自觉地承担和履行着自己做为一个社会人的义务——即使他是如何的“超世”。对于艺术家，他在一定的生活之中找到了某种适宜于表达个体对社会的理解和评判、适宜于表现个体存在的激情和各种难以用语言厘定的情怀意绪的符号结构形式，他在感受和倾诉、再现和表现的过程中客观地参预和干预生活的客观历史进程。做为一个艺术家他获得了双重的自我实现：其一，在他创造外在符号结构以显示内在情感逻辑的过程中，他表现了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从而使艺术品获得了超越时间的本体意义。其二，当作品进入社会生活，成为读者审美观照的起点时，这种个体存在的独特性经过群体认同而获得社会普遍性。艺术家以社会的我的形式实现了自己，他投注生命以求确立生命，而只有经过普遍形式的认同他才获得了生命。批评家呢？事实上，他们也从感性模态的艺术作品中找到足以表达他们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理性评判，找到足以表现他们在人生中都积起来的感性形态的情怀意绪的符号结构。就艺术本体论而言，形象是创作的终点，形象大于思想；即每一忠实于时代精神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其内蕴往往超出作者的理性把握之外。就艺术社会学言，形象是欣赏和批评的起点，思想凸

出形象，即作为主体的欣赏者和作为特殊欣赏者的批评家必然要将其特殊的个体经验填充进去，使形象多能性、宽泛性、朦胧性的无限潜能转化为不断延伸和展开的有限现实，在将自身体验和领悟导入作品时使作品的意义得到重新的建构。如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奥勃洛莫夫性格的阐扬，又如三十年代中国评论界对曹禺《雷雨》的分析，再如别林斯基之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等。

在艺术家——作品——欣赏者（批评家）之间，艺术家作为唯一的能动决定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康德哲学诞生以来，人类在认识上消极被动地作为接受者的客体意义已开始逆转为积极能动地作为设立者的主体意义。反映到艺术传播、欣赏、接受等艺术社会学研究上，便产生了二十世纪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新闻释学和完形心理学。今天看来，艺术品作为具有多层不定意义和可能的“本文”，作为具有宽泛的感性意义的“原始触媒”，期待着作为主体的欣赏者和作为特殊欣赏者的批评家，他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参予艺术作品意义的建构和生成。

总之，无法介入作品意义的生成和建构的批评，生命力总是有限的。象木耳作为木耳一样——迟早要被人类永远强健的胃消费掉的。批评和批评家将如何对待自身的命运呢？！

二

两千多年的美学史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我认为，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而言，整个美学史可以看作是从美的本体论到人的本体论的历史进程。两者在当代都以新的面貌得到深化。美的本体论体现为不断科学化、量化、系统化；而人的本体论则体现为不断地将宏观的、深层的社会历史问题转化为微观的、深层的社会心理问题。

所谓美的本体论阶段，指的是康德以前的整个美学理论，即以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奠基的西方古典美学理论，主要探索美的外在模态和内在结构、美的心理功能和社会效用等等。总的说来可看作美的结构学和美的社会学两个大方面。

美的结构学。首先是美的外部模态学。真正富于意义的是“摹仿说”和“诗史之辨”。亚里士多德将诗歌、音乐、图画、雕刻等“美的艺术”称为“摹仿”或“摹仿的艺术”，柏拉图充满理性优越感从而对“影子的影子”嗤之以鼻，也不过是从逆方

向肯定了艺术的摹仿的感性特性。他们一正一反，从两个角度都描述了艺术的再现功能和形象特性。接着，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抉发了艺术的普遍意义，诗人和历史家“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出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诗学》第九章）正是这一段“诗史之辨”在一与多、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纠葛中为艺术张目。其次，则是美的内部结构学。礼赞“诸天音乐”和“宇宙和谐”的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将数量问题纯粹化和绝对化，这些倾听天籁的理性主义者！西方美学史上的形式理论于此发端：比例、和谐、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同态对应的契合，都在此找到终极根源。加上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观念，导发了形式理论。

美的社会学：古典的美的社会学与近代企图在感性观照中沟通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有限与无限而使整个文明都得到超绝、升华的“审美乌托邦”观念不同。它只是美的心理功能和社会效用的理论而已。亚里士多德又和柏拉图在理论逆反中共同涉及到本质性的问题：亚氏的“净化说”，阐发了审美体验泄导人情、净化郁结的心理功能；而柏氏恰又是怕“理想国”的卫士染上哀怜癖和感伤癖才要驱逐诗人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由衷说道：亚里士多德雄霸了两千多年，这并不溢美。只是经由了鲍姆嘉通，美学的感性学的意义方才突出出来。正是鲍氏将诗与历史之辨转化为诗与哲学之辨，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转化为感性与理性的纠葛。于是，康德出现了，他恰如其份地接受了历史的安排。这就是我们所谓美学上人的本体论的阶段的开始。

所谓人的本体论阶段，指康德、席勒、青年马克思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共产党人卢卡奇等等这一批以哲人本学为出发点的审美理论（叔本华、尼采、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也同样以另外的面貌接触了同一的主题）。概而言之，怎样从人的感觉的解放达到人的现实解放，是这一线理论的根本题旨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青年马克思，是以人的现实解放作为人的感觉的解放的前提的，这与其他各家不同。之所以将青年马克思与诸家列在一起，因为青年马克思与康德、席勒审美理论确有承传关系，此其一；法兰克福学派

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是自称承得青年马克思衣钵的，此其二。）总之，从康德以后，审美再也不仅仅是高妙玄绝的纯粹而“有闲”的趣味活动，而开始被看成是在重新建构人类自由本性的实践活动了。人类审美之眼，再也不仅是围绕着物的结构匆匆掠过，而开始盯紧了人类存在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

我们认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学思潮的频繁更迭、纷纭杂出，某种意义上正是美学理论这两大历史阶段的复杂、间接的折光。

美的本体论与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思潮表里，倾向于微观化、实证化、定量化。概率统计、定量分析等自然科学方法开始客串了审美这一纯粹精神现象研究领域。费希纳的“自下而上”的实验美学，再也不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那样的高妙的玄思、缜密的运算去默契形式规律，而是动用了社会学的调查、统计、问题的方法，从不同素养的人中寻找量的绝对优势，再由此推导为质的内在必然。现代西方文艺批评中的形式主义正是实验美学发展的一个间接映象。将艺术作品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中绝缘出来，而加以结构研究和语文分析。时下运用电子计算机研究名著语言风格等也不乏其人。计算机时代的到来，的确已足以将大量的经验现象转化为数量编码，数学王国的疆域因此得到不断的拓展。然而，这种疆域是否就是无边无际的呢？在一切研究自然界与人类自身的感性自然的经验学科——物理、化学、生物、生理等等——之中，数学无疑越来越居于皇后的宝座，可是在宗教、伦理、审美等价值学科，它能否得到同样的荣耀呢？问题就不那么直接了当了。比如说，平衡、对称、对比、排列的有序性、蛇形线这些“万古不移”的形式规律，确可以从大量的审美对象身上分析出来，然而，从一条银环蛇身上，这些质素不也几乎都可以独一分析出来么？

我们认为，定量化、实证化倾向的滥觞，都是事出有因的。其一，就思想线索而言，实证化、定量化倾向是对极端的理性时代或极端的非理性时代的反动。文艺复兴时代，对经院哲学与神学的唾弃，对此生、个体、感性的执着，导致了重实证、重观察、重实验的风气，也寻出了达·芬奇这样的见解，凡是数学用不上去，和数学有关的科学也用不上去的那些领域，都没有确实的知识。（《芬奇札记选》）十九世纪后半叶实

证倾向的兴起，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玄远的、理性的纯粹思辨的反动。马克思也讲过，只有数学进入的学科，才成其为科学。总之，在此，实证倾向与人对感性确定性的寻求有关。其二，就社会心理而言，实证倾向则是在旧的世界图景已经破碎，新的世界图景又尚未形成的时代的心理失落感的折射。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眼中的宏观的宇宙图景和微观的物质结构频频幻化着。加上欧美国家的物质异化的巨流，带来了暂时的理性失落感，究其心理底蕴，这种定量化、实证化的倾向，正是人类希求通过有限的明晰的理性模式把握无限的偶然现象的心理完形的内在需要。旧的世界图景消逝了，人类于是需要一个可以理喻、可以感知、可以用符号统驭的新的图景。总之，在此，实证倾向与人的理性的内在完形有关。

人的本体论方面，则出现了深层历史学与深层心理学的合流，宏观的社会结构学和动力学向微观的心理结构学和动力学转化。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及与之有关联的美学思潮中尤为明显。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宏观历史发展尤其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史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必然过程，期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将人类导向未来，即通过现实途径求得人的现实解放；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到弗洛姆）则希图通过人的感觉的解放达到人的现实的解放，即通过微观的心理建构解决历史文化问题。前者重在人的解放的历史前提和存在环境，而后者则专注于人的解放的个体化的心理结构。前者重在创造合理的社会制度，后者重于寻求平衡的心理机制。尽管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前者，但其探索的方向本身还是值得重视的。

这种深层历史学与深层心理学的交汇，落实到美学思潮，尤其落实到文艺批评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丹纳到现代的社会批评派，从别、车、杜到普列汉诺夫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批评，都主要地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这种批评自身的僵化所导致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正是当前文艺批评方法更新的内在动因之一。）这种方法目前正不断地受到心理批评派和原型批评派的挑战。弗洛伊德主义将冰山的八分之七——人类心理生活中广阔复杂的潜意识世界提到理性的阳光下。心理效应问题再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社会与问题而成为人的本体论问题。无

意识、升华、白日梦等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始料不及地为与无意识关联甚深的艺术创造心理、接受心理提供了可资深思的理论。这与存在主义的理论相左右，直面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面——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奋斗的欢乐，人生中种种无法用明晰的理性语言直接表达的憧憬、梦幻、期冀、忧伤……个体的、偶然的、感性的因素的人本学意义得到一定的挖掘。非理性的形态

中蓄积了沉重的理性内蕴……。

理论规范适宜于对既往历史的统驭，但未必适宜于对未来历史的推演。我们用美的本体论到人的本体论来清理纷纭的精神现象，这种情况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二者的交汇和融合呢？美的本体到人的本体、深层历史学与深层心理学、结构学与动力学……精神现象既各秀一枝又互济互补，容不得干预，也无须预测。只有历史才是见证人。



吴承恩订补《状元图考》

官桂铨

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云：“原明顾鼎臣编、吴承恩补《状元图考》，胡广一首，曾启六首，周孟简二首，萧时中二首，商辂五首，柯潜二首，程敏政五首，吴宽六首，朱希周三首，杨慎五首……”，（1984年中华书局铅印本页七一）共收56人，126首诗，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这56人不全是状元，状元仅有31人，1甲2名的如程敏政等有5人，1甲3名的如周孟简等有13人，2甲1名的如唐顺之等有4人，2甲3名的有田一儁，冯梦禛二人，2甲17名的有章懋1人。按吴承恩订补《状元图考》，不见于刘修业先生《吴承恩著述考》、《吴承恩论著杂事考》、《吴承恩年谱》（收入1958年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和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吴承恩诗文集》附录）。也不见苏兴《吴承恩年谱》等书。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又一著作。

顾鼎臣字九和，昆山人，生于成化九年（1473），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六十八，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累迁礼部右侍郎，寻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卒于官，谥文康，著有《未斋集》二十二卷。顾鼎臣编、吴承恩补《状元图考》未见传本。然法式善（1753—1813）为乾嘉时人，尚见此书，估计此书未佚，但未被发现。顾鼎臣逝世时，吴承恩年约四十一岁，二人虽为江苏同乡，但顾鼎臣为高官，谅必与吴承恩并无交往，吴承恩订补《状元图考》当为其晚年的事。

略论艺术创作信息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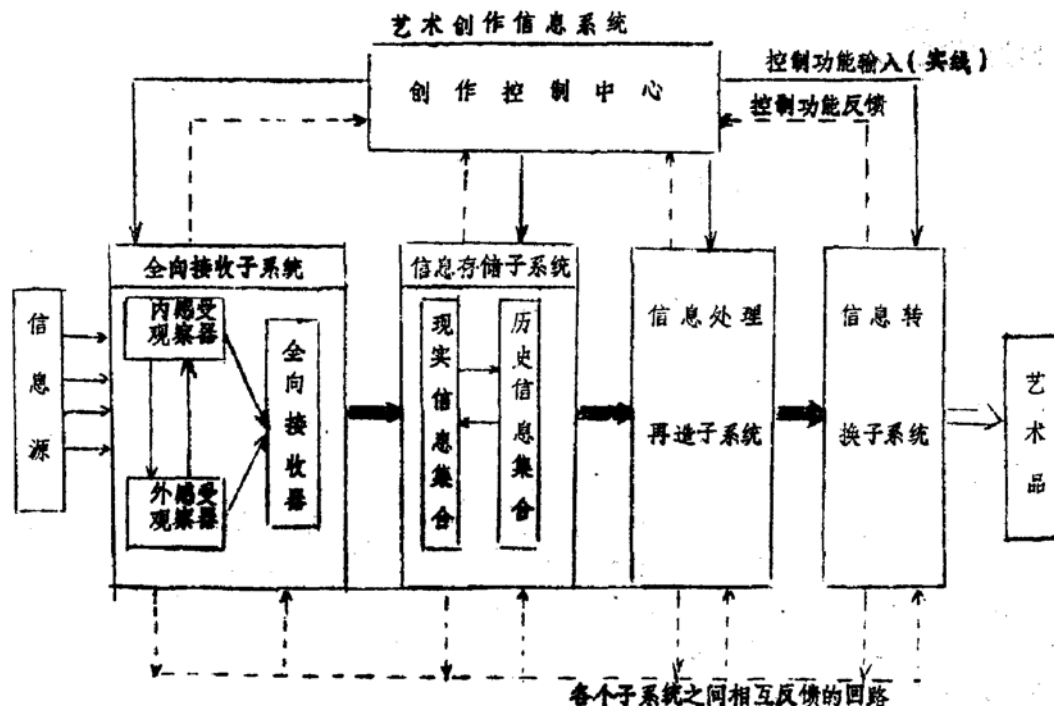
肖 走

系统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普遍方式和运动方式，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系统中，艺术创作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人造的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开放系统，是由若干个构成艺术创作所必须的子系统和要素，按一定的艺术创作目的的特定联系方式结构而成的，具有整体新质的复杂动态总体。它的功能表现为：艺术家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

信息，进行主动的接收、传输、存储、处理、再造、转换和输出，在艺术家主体的控制作用下，完成艺术创作的过程，生产出艺术品来。

艺术创作信息系统从过程的角度可以分为：

1. 全向接收子系统；
2. 信息存储子系统；
3. 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
4. 信息转换子系统；
5. 创作控制中心。其关系框图如下：



下面我们依次分别考察。

一、艺术创作控制中心

艺术创作是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所谓艺术创作控制中心，是对艺术创作信息系统中其它子系统具有某种“定向”作用的子系统。它是艺术家个人天赋资质和后来的修养、经历，在思想和精神

上形成的一切稳定因素的有机总和，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世界观、艺术才能、感情型、性格、气质、经历、修养等。创作控制中心，影响或决定整个创作过程的状态、发展方向。

艺术创作控制中心输出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趋近于某种创作目的所必须的“情绪——想象力”。艺术想象是以信息记忆为基础，常由情绪

所触发的，对信息进行加工、组合、配置、再造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艺术想象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积极想象，它不单把一系列信息，按照它在客观世界中的自然顺序和必然联系，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而且对这些信息按照某种自觉的目的，进行千变万化的组合，创造出崭新的东西来。“情绪——想象力”，赋予艺术创作的对象——信息一种内在的“能量”，使这些被艺术创作所加工的信息，跃动起来，在筛选、碰撞、肢解、重新组合中，形成新的有序的稳定结构，生产出艺术品来。

“情绪——想象”的控制功能，不是天马行空纯主观的东西，而是遵循一定的程序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它是遵循客观生活逻辑，并为意识之光所穿透。整个艺术创作信息系统正是由于这种定向的控制作用，才能在动态中保持一种趋近于某种创作目的的趋势。

在艺术家人生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创作控制中心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它输出的功能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对整个创作信息系统作用的性质、强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变化不大。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大量创作实践，都说明了艺术家较稳定的控制功能，长期影响他们的创作倾向，保持着一定的创作风格。但是，艺术家随着客观环境因素的变化，阅历、年龄、心理、气质、性格、修养、学识等，也在不断变化，创作控制中心因素的数量、性质也随之变化，进而逐渐改变着创作控制中心的各个因素的联结方式——结构。结构的变化，又使它输出的控制功能发生变化，不断影响改变着艺术家创作实践的倾向，相对地改变着创作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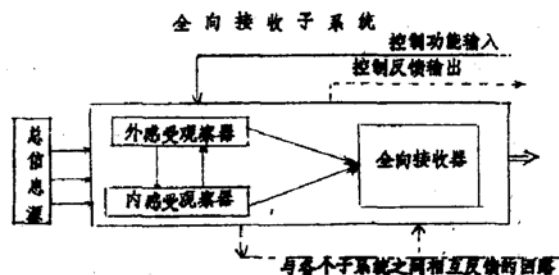
创作控制中心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在同各个子系统交换信息、“能量”的过程中，在与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它自身在动态中进行自我调节控制，不断地扬弃变化，逐渐改变着自身的结构，改变着控制功能，使整个创作信息系统处在发展变化的动态运动中。

二、全向接收子系统

现实世界中，客观事物具有无穷无尽的信息表现形式，我们把艺术家主体的心理世界和主体以外的客观世界中，能被艺术家所感知、感受、观察、体验到的一切信息的总和，叫作总信息源。

艺术家的全向接收子系统，是艺术家的信息

感受接收器，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感受观察器，全向接收器，它的关系框图如下：



从信息的角度看，在艺术家感受、观察、体验的最大视野中，一切信息，都是接收对象。这些信息可以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直接信息——可视、可听、可嗅、可触，可尝、可感的信息，也可以是经过人类思维加工后的精神信息——抽象的理论、知识、艺术作品、科学文化等，还可以是艺术家自身的心理反应、内心体验等心理世界的內容。

艺术家对急速变动，新事物不断涌现的现实世界的感受、观察、体验，是以广泛吸收各种知识，与种种事物建立更多的“信号库”为前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能否有效的通讯，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通讯的双方必须使用同一种语言，或者叫通讯的双方，拥有公共的“信号库”。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信号库”，是各种各样的人造语言（有声语言、文字符号、音乐语言、舞蹈语言等），人与客观世界的公共“信号库”，则是人对外界客体的知识程度。人与外界建立公共“信号库”的过程，也就是人在自己头脑中，逐渐存储有关外界客体的各种知识的过程，知识越多，与外界客体的通讯就越有效。艺术家感受观察的强度、范围，是与他和外界客体共同拥有的“信号库”的多少成正比例的。因此，能否全向地接收信息，是当代艺术家保持创作信息系统活力的关键。

艺术家的感受观察器有内外之别。所谓外感受观察器，是以接收艺术家主体以外的客观环境所发出的种种信息为主要任务的，我们称这种信息为外信息。它们通过艺术家的全部感觉器官，被信息感受观察器所感受、观察、接收、传递，构成了源源不断的环境客体的外信息流，它是整个创作信息系统运动、变化、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所谓内感受观察器，则以接收、传递艺术家的内心体验、心理反应等心理世界所发射的种种

信息为主要任务，我们称这种信息为内信息。这类信息具有易变模糊，非具象性等特点，这对艺术家的内感观察器的灵敏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心理信息是外信息对艺术家主体心理世界的冲击、碰撞激起的，是客体对主体作用，引起主体心理变化的结果。这类信息的不断接收，构成了源源不断的心理信息流，内信息是创作信息系统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据。

在艺术家接收这两类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的输入，是非条理化近于无序的，这些信息反映的是主体和客体的一个个个别的属性，是缺乏事物整体有机联系的信息集合，一般不能明确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

艺术家的全向接收子系统，对内外信息的接收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交换内容的过程。这个交换的过程虽然具有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情绪等主观性，但它归根结底是由艺术家的全部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容决定的，它的强度、范围是受艺术家主体客观社会实践制约的。但是，这一过程又是主体在创作控制中心控制下对外、内信息的主动的接收，不免渗入主观的思想、情感，这样，实际上艺术家接收到的信息，不再是纯客观的状态，而是融合了主体意识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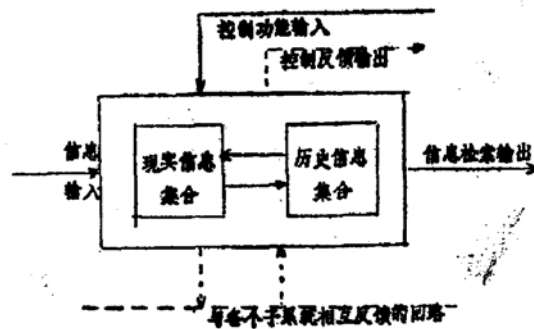
全向信息接收子系统，通过内外感受观察器对信息的全向接收，形成的汹涌激荡的信息洪流，不断涌入第二个子系统——信息存储子系统，进行信息的初级处理和存储。

三、信息存储子系统

信息存储子系统的主要功能表现为记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记忆大致分四种，即运动记忆、情绪记忆、词——逻辑记忆、形象记忆。艺术创作信息系统以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为主。记忆的过程就是信息存储的过程。记忆的程序是：信息输入——编码——存储——检索，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信息得到了初级的加工整理。从接收系统涌来的五花八门的信息，经过人脑记忆功能的筛选，遗忘掉细枝末节的信息，那些具有强刺激、“能量”大的信息，经过联想式的编码，在创作控制中心的作用下，大致按照检索的需要，存储于信息存储子系统的不同层次中。必要的时候，被创作控制中心的“情绪——想象力”检索出来，进入艺术创作的重组再造阶段。

信息存储子系统中的信息层次，从时间的进

程看，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现实”信息集合和“历史”信息集合。它们的关系框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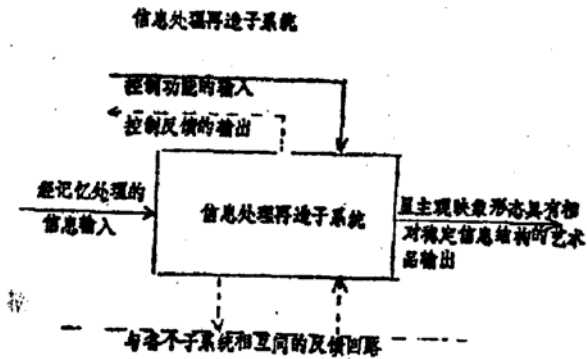


所谓“现实”信息是指由全向接受子系统现在传递过来的信息，所谓“历史”信息是指以往经过记忆功能处理过的、已分类存储于信息存储子系统不同层次的信息。在现实中往往很难区分“历史”信息和“现实”信息，但是这种区分又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时间上的区分，面对一个不断变动的对象，很难对它内部作用的机制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假定在某一时点上，存储于系统中的平均信息量是一个固定值，“现实”信息的输入趋近于零，创作控制中心对它施加的作用趋近于零，这时信息存储子系统是封闭的，同外界不发生任何作用。已经通过记忆功能联想式的编码处理，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层次中的“历史”信息的“能量”也不再跃动、复现。这种平衡的时态越久，信息的复现能力越来越弱，导致部分信息“死亡”。直至创作信息系统功能的消失，艺术家完全丧失创作力。可见艺术创作信息系统同样遵从一般系统的法则，即封闭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不断接收新的信息，对维护创作信息系统活力很重要，艺术家创作力的旺盛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信息和“能量”的输入。

信息存储子系统中信息的容量越大，信息被检索复现的能力越强，并且经常处于一种活跃的可能被激发的状态中，在某一个随机的时刻，艺术家便有可能进入创作的临战状态，向下一个子系统——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跃进。

四、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

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是艺术创作信息系统中，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分，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关键。它的关系框图如下：



大量经过记忆加工的具有“内能量”的信息，不断涌入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信息积聚越来越多，信息与信息之间潜在的组合方式也越来越多，信息与信息之间不断地相互碰撞、肢解、组合，在无数次“试误”性的碰撞组合中，“情绪——想象力”的控制功能，对某些信息之间的“弱关系”，进行强化，沟通不同信息之间某种可能的联系，并通过创作控制中心不断加强的控制功能的积累，达到一定条件时，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内部，自动地出现了某一类信息积聚于特定层次的现象，形成了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信息群”。这种“信息群”具有如下特征：

①它不限定信息的数量，也不限定各个信息属于何种性质，只要形成一个“问题”就行。这个问题可以是创作的原因、不十分明确的思想火花、对信息之间某种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等等。

②这种“信息群”是依据各个信息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组成的，这种内在联系不一定是指明显的因果联系和必然的时空顺序，而是指为某一创作目的所决定的深藏在不同信息的较深的层次的一致性。古今中外的艺术家，把大量表面上看来无甚联系的信息，聚集到创作信息系统内部进行创作的事实，正说明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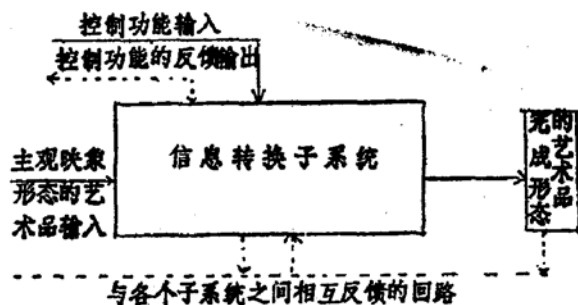
③这个形成的“问题”很重要，它已经构成了未来艺术作品的粗略轮廓。从创作信息系统的状态看，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一类信息已经具备了进行创作活动的极大可能性。

“信息群”处于一种随时可能激发的状态的关节点上，但是它可能的发展方向的目的并不是唯一的，而是若干个，最后它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创作出什么样的艺术品来，很重要的是看控制功能指向，看艺术家主观创作倾向的自觉选择。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不断地同各个子系统进行相互间的信息反馈，一切与创作控制中心指

向一致，通过多回路的反馈，进一步充实到这一特定的“信息群”中，“信息群”的结构信息量越来越大，整体性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信息与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再被“情绪——想象力”的控制作用所放大、强化，创作信息系统自觉的目的性越来越明确，明确的目的性使“信息群”中的上述变动加剧，当这些大的变动达到一定的值时，整个创作信息系统发生突变，“信息群”从不稳定的状态，迁跃到一种全新的稳定有序的状态，建立起明确体现艺术家创作目的的新的有序结构。于是，一个崭新的、呈现于艺术家主观映象中的艺术品的整体被创作出来，艺术创作最关键的一步完成了。

五、信息转换子系统

存在于艺术家主观映象中的艺术作品，无法直接传达给艺术欣赏者的信息接收装置——人类的感官器官，必须借助某种与艺术欣赏者所共有的“语言”来传达。这种“语言”，可以是文字、有声语言、音乐语言、视觉形象、触觉信号等等，一句话，是那些人类所有感官器官能够直接接收到的信息，我们称这种信息为感性表现信息。这样，在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与艺术品完成形态之间，必须有一个信息转换子系统。经过这个子系统的“翻译”，把艺术家主观映象形态的艺术信息，转换成能为艺术欣赏者所感知的感性表现信息形式。这个转换过程，类似于电视机把电波信号转换成光、声信号。信息转换子系统的关系框图如下：



信息转换子系统与信息处理再造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两个子系统内部信息的形式，结构不同，使得信息的转换没有精确的——对应的关系，因此，转换的过程，不可能是精确地再现，而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信息的含义作了“歪

曲”、“变形”，严格地说，能够百分之百地传达自己主观映象的艺术家是没有的。

信息转换子系统与创作控制中心的关系：信息转换子系统是置身于控制功能之下的，控制功能在这里表现为：在信息转换系统中的许多组异构同质的表现信息中间，选择最佳的表现信息，以准确简练地表现艺术作品的主旨。所以，转换的过程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在这里，创作控制中心的选择能力，表现为对映象形态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集合的取舍和对转换子系统公共“信号库”中的表现信息的筛选。

信息转换子系统与完成形态的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不断相互反馈的关系，即艺术作品的最后结构形成，是在与信息转换子系统进行多次反馈修正中完成的，艺术家在创作中，一方面不

断地通过寻找最确切的表现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另一方面在这种寻找和选择中，进一步明确创作目的，明确艺术作品的主题、结构和表现手段等，以期用尽可能明确简练的内容，尽可能完美的形式，来达到最理想的创作目的。

信息转换子系统的转换过程，就是主观映象信息的客观化、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完成形态的艺术作品，精确化、丰富化的过程。

以上我们大略描述了各个子系统的状态和功能，作为艺术创作信息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并不是每一个子系统功能的简单加和，而是所有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每一个子系统的作用必须置于创作信息系统的整体中来认识，反过来，要从所有子系统和要素的相互作用中，来认识创作信息系统的整体功能。

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物质保证

张孟莘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建设。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成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物质保证。

一、经济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中心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在抗日战场上，我们面临的是敌人对我们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的全面进攻，他们企图用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的办法，用残暴的“三光”政策，消灭我抗日力量，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因此，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也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斗争。敌后持久抗战的艰苦性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持，粉碎日寇扫荡，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也需要加强抗日经济力量。同时，我们的根据地是处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中，根据地人民在遭受战争摧残和承担战争供应的情况下，总是迫切希望解决生活问题和尽量减轻负担。战争愈持久，群众的这种要求愈迫切。如果我们不抓住群众这一基本迫切要求，从切切实实的发展经济中去解决，就不能团结群众，发展革命战争，就不能支持持久抗战。另一方面，进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就是在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情况下，在坚持抗战中开辟出一条巩固胜利、发展胜利的自力更生的道路。这对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对于全世界人民斗争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从长远来看，革命的目的是为着建设，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旧制度以后，那怕只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我们的根据地也面临着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抗日根据地既是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旗帜，也是使人民了解新的社会制度的活生生的榜样，通过它的实例，使人们懂得只有这种社会制度才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它是吸引人民了解我们、拥护我们、从而参加革命的力量。因此，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敌军事斗争。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7——1940年为初期发展阶段。中心是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的经济，开始建立公营企业，并逐步实现由依赖外援为主向半自给道路转变。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党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经济，开展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这个时期，由于经验不足，曾经出现一些偏向。1942年冬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对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订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提出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原则。从此，根据地经济发展走上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的重要时期。

1943—1945年，为边区公私经济都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普遍改善，部分达到丰衣足食，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几个重要的经济方针和政策

党的抗日经济政策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抗日经济政策的制订，遵循了以下几个基本原则：（1）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保护一切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2）适合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抗日根据地是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根据地经济建设不仅要能支持长期抗战，而且，还必须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巩固的基础。它必须坚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的积极性，为抗战服务。（3）必须发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抗战时期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的基本点就是以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办法，来粉碎封锁，保障抗日军民需要，达到增强抗日经济力量的目的。

是否从发展人民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是我们同国民党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政权在财经问题上的原则区别。国民党的财政问题的解决，是以剥削群众，以群众的贫困和受奴役为基础的，是以破坏人民的经济为基础的。而我们财政问题的解决，是以人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我们财政充裕的程度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成正比的。

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实质上是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依靠农民支持战争的问题。在根据地内，我们同农民的联盟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是反对共同敌人，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作主人，另一个是领导农民取得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农民在经济上逐步获得解放。如果在长期的战争中，我们只注意加强同农民的政治联合，不注意加强同农民的经济联合，在经济建设中，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中，不用事实向农民表明革命政权的优越性，工农联盟就会遭到损害，长期战争也难于坚持。所以，党提出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建立在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上，“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①

2. 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就是把发展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作为保障财政供应的根本办法。因为只有建立国营经济，才能使取之于民的赋税减少，只有同时发展民营经

济，才能使人民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并且做到虽然在战争条件下也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当然，在公私兼顾中，整体的、全局的利益应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3.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这是抗日根据地中组织一切经济生活，发展公营经济的重要方针。由于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一切物质的供应不可能由上级机关包下来，只有发动下级机关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来解决，而且劳动力原料分散各地，交通又不便利；只有实行分散经营才有利于发展生产。但是实行分散经营也不能忘记统一领导。否则，各行其是，必然造成生产上的盲目性和很大的浪费，所以中央提出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行统一领导。

4. 农业第一，发展私人经济。抗日根据地处在农村，军民生活主要依靠农业。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和边区工业对原料的需要，而且，它还是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主要物质基础。因此，党中央提出：必须全力贯彻以农业第一，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

为了发展农业，政府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同时宣布：坚持保护一切已取得土地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号召农民发展生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发放农贷支援农业，并宣布：存粮存款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产粮计算，增产归己。^②

以发展农业为主，对其他个体手工业、私人工商业等私人经济，政府也采取保护和扶助的方针。废除苛捐杂税，奖励发展生产，并在原料、工具、技术、资金、销路方面给予协助。

5. 组织起来。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陷于长期的穷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起来。因此，中央提出引导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业生产合作发展的同时，党又逐步把这种互助合作形式运用到其他领域，发展起了手工业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以及包括各种业务在内的综合性合作社，使抗日根据地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逐步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6. 对外调剂，对内自由。这是商业贸易上的基本政策。所谓“对外调剂”，就是有计划地组织进出口贸易，调剂输出入，争取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以促进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所谓“对内自由”，就是在不违犯政府法令之下，允许边区内外的商人和老百姓在边区内部进行自由贸易。政府只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

对外调剂与对内自由二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对外调剂是为了对内自由，是为了边区工农商业得以正常发展。而对内自由则是实行对外调剂的物质基础。

实行“对外调剂，对内自由”，必须以保护商业为前提。政府宣布了保护商业的政策。规定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在保证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要发展合作商业，奖励私人商业，扶助和依靠中小商人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开展对敌占区的贸易。

7. 重视发展工业，争取工业品自给。要坚持抗战，打破封锁，除了要实现粮食自给外，还必须争取工业品自给，以保证边区军民的生活必需。

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是十分落后的农村经济，没有工业基础，加上遭受封锁，外援断绝，我们既缺乏技术，又缺乏设备。因此，发展工业既不能抄袭外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中国大城市的一套，只能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在艰苦奋斗中创业，实行以手工劳动为主，木制、铁制机器并用。政府强调：必须开发边区丰富的天然资源，加强各工厂之间的协作和联系。根据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除政府办工厂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利用时间发展工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要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农民家庭副业。政府奖励并保护边区内外工商业家和华侨来边区投资发展工业，对工业给予定期免税和低利贷款。又废除“左”的劳动法，实行抗日的劳动政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奖励边区地主商人创办工业。

8. 精兵简政，厉行节约。战争的残酷性，要求我们做到兵精政简。毛泽东把物质困难比做抗日航程中的暗礁。指出我们克服这个暗礁的重要办法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可以减轻人民负担，可以减少消费性支出，还可增加生产的收入。

9. 重视科学，重视人才。抗战初期，党中央就发出专门文件，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又在延安组织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把科技人才集中起来，“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事业”。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又号召“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过工业的同志回到工业部门中来，发起工业战线的归队运动”。^③党强调要培养大批技术干部，要把成绩特别优秀的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对技术革新中有成绩者应给予奖励。党公开宣布“热忱欢迎边区以外的工程师和各种专家、熟练工人及学徒大批到边区来工作”。^④党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加强经济建设的力量。

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物质保证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 团结了人民，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抗日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阶级原则和民族原则结合起来，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它既切实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调动他们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也适当照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一些合法利益，以争取他们对抗日的同情和支持。

抗战时期，党虽然改变了土地政策，但由于保障了农民基本生活，而且保障农民既得的土地利益不受侵犯，又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放农贷，救济困难农民，扶助农民发展生产。因此，不仅没有削弱农民的生产热情，还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党对富农政策的改变，也保护了富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实行保护商业自由的政策，也激起了商人经营商业的热情。由于党纠正了“左”倾错误，抗战初期，延安市商人就自动捐出过去所藏步枪五百余支，手榴弹多枚，支持人民武装抗日；^⑤一些

开明地主也主动捐助抗日基金，⑥不少在土地革命时期逃离边区的地主富农，在减租减息政策实现后，也纷纷回到边区，参加了抗日阵营。党的政策的正确，还吸引着不少边区以外的人来边区参加抗日。1938年，就有工业家沈鸿自愿带着自己的十部机器和七个工人迁来延安，为八路军服务；又有工程师钱志道等许多科技人员也陆续来到边区参加抗日；连远在异乡的华侨工人也长途跋涉，来到延安，马来亚柔佛华侨工人组织了几批华侨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带着汽车药品来延安参加八路军，菲律宾华侨也组织了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同新四军并肩战斗，还有不少华侨踊跃捐款支持抗战。

2. 粉碎了敌顽封锁，促进了根据地的繁荣。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十分伟大的成就，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耕地面积比战前增长一倍，粮食达到自给有余，植棉面积扩大九倍，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敌后各解放区在战争频繁的情况下，生产也得到较大发展，1948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六个区域，耕地面积就扩大了六百万亩以上。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繁荣起来，过去，延安市仅有几十家小商店，到抗战末期，仅私商就达到470余家，资本由三、五百元发展到几十万元，资本在一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的大商，也占了私商总数的28.9%。⑦各地集市贸易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边区已经发展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商业网。在边区内部商业繁荣的同时，对外贸易也大大发展起来，许多土特产品，边区内部的工业产品，除满足边区自身需要外，都大量运到边区以外地区。

3. 改善了军民生活，增强了抗战实力。正确的经济政策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政府又采取关心群众生活的方针，因此，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普遍得到改善，达到了衣食有余的水平，大大加强了抗战的实力。

由于部队机关学校开展了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各单位都建立了自给经济，实现了粮食被服经费肉菜的全部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工业、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不仅保证了部队需要，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陕甘宁边区人民负担平均不到其收入的9%，敌后各解放区人民的负担也只占其收入的14%左右。军民两方都发展生产，都丰衣足食，农村中中农增多，如晋察冀根据地北岳24个村调查，战前中农占总户数的85.42%，1942年后，为42.81%，贫农战前占总户数的47.58%，1942年后，则减至40%；在皖北解放区泗南县莲花井，原41户贫农中有32户上升为中农，18户佃农中，有12户买了土地耕畜；苏北解放区滨海县的四区六个乡，在860多户贫农中，上升的有130户，买进土地550亩。⑧广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支前，大大增强了抗日实力。

4. 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抗日时期的经济建设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自流到管理的变化过程，它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生产上，要以农业为主，要贯彻“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要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要党政军民一齐动手，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要发展公营自给经济，要把

合作社作为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要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在商业贸易中实行“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政策，强调贸易要立足于生产，要大力组织土特产品出口，争取贸易出入口平衡等等，这些都是党领导根据地经济斗争的经验总结。

党的抗日经济政策，由于坚持了从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战争与建设、生产与消费、国家与人民、公营与私营、自由与管理、全部与局部等一系列关系，使经济政策发挥了充分的威力。在对敌经济斗争中，成为我们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它推动了抗日经济建设的发展，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86、416页。
 - ②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 ③ 《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解放日报》1944年6月4日。
 - ④ 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3日。
 - ⑤、⑥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赵效民主编）第533页。
 - ⑦ 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
 - ⑧ 转引自：《抗战时期解放区减租减息政策初探》（陈其贵），《绵阳师专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2期。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

罗 一 星

明清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活跃着各种商人集团，诸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福建海商和广州行商等。这些著名的商人集团，早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然而，与上述商人生长、存在的同时，另一支重要的商人力量也在形成发展，这就是佛山商人。佛山商人以其众多的人数，成功的经营，广阔的活动范围，为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是，由于过去受史料的限制，对这个商人集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收集整理佛山家族谱、乡志、碑刻等材料的基础上，拟对佛山商人集团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作一比较详细的考察和估价。

佛山商人的兴起，离不开佛山优越的地理条件。

佛山地处粤中珠江三角洲平原，居省会上游，绾西、北、东三江会流之处。它以西江连接桂、滇、贵、川诸省；以北江连接赣、湘、楚、吴诸省；以东江连接闽、浙等省。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史称佛山“地为五都之市，舟车绣错，盖东南一大咽喉也。”^①佛山环镇皆水，有十二条河涌环绕其间，通镇舟楫便利，处处可设码头。“四方之来游者日以万计，然皆以舟船泊岸，不少劳余力也。”^②在古代以水路交通为主的情况下，佛山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佛山商人的贩运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佛山商人的兴起，又是与明清时期佛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生产发展紧密相联系的。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从明初开始，珠江三角洲进入充分开发期，当地人民根据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创造了先进的集约式农业经营方式。“桑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等种养结合的多种农作物组合型结构，逐渐代替原来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型结构。这种新的组合型结构具有很大的商品性，一方面，它提供了大量的蚕茧、塘鱼、甘蔗等商品性农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桑植的刀剪、榨糖的铁锅等手工业产品作保证。这就扩大了农村的交换对象和范围，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商品性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农民家庭对市场的依赖。乡志载：“桑叶用以饲蚕，价值随丝业之利钝为低昂，相差恒至倍蓰。获利较种稻为易。”

③ 在市场价格作用下，许多农户走上致富之路。而农户一旦有了积资，又会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从而获得既速且大的农业利润。所谓“有资本则鱼蚕之利转如轮，”④ 就是指此。正由于商品性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佛山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

手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是佛山商业繁荣的坚实基础。佛山是以冶铁业著称的新兴城镇。明正德年间，佛山已成为广东的冶铁业中心。清乾隆年间，冶铁业更加兴旺。当时估计佛山冶铁各行工匠不下二、三万人，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⑤ 陶瓷业是佛山手工业的另一重要行业，分布在离佛山镇六公里的石湾乡。在明天启年间，石湾已有陶业八行，到清代发展为二十余行，⑥ 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丝织业也是佛山的另一重要手工业。清初发展为十八行。据碑刻记载，道光年间丝织十八行之一的帽绫行共有机房东主二百零二家，织工西友一千一百零九人。⑦ 此外，金属加工业、成药业、民间手工艺等五花八门的手工业不胜枚举。佛山手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给佛山商业贸易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佛山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好的场所和机会。

商品经济的发展诱发了许多农民舍本逐末、弃农经商。据载，明嘉靖时，佛山居民已是“力田者寡，游手之民充斥道路。”⑧ 到清乾隆年间，佛山更是“耕田者少，逐末工作者多。”⑨ 有些氏族完全放弃了农耕，从事工商业生产。如鹤园陈氏就自称“蚁族素业生意工艺”。⑩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就是在上述种种适宜的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

二

所谓佛山商人，是指以佛山镇为中心，包括石湾和周边乡村、以及外地落籍于佛山的商人。⑪ 乡志载：“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⑫ 可知商人数量之众和种类之多。

根据材料分析，佛商大概有如下几种：

1. 铁商。其人数居各种商人之首。依经营方式的不同，铁商又可分为两类。一为坐贾，即屯积货物以坐收厚利者。正统年间，“佛山商务以锅业为最”。锅商洗灏通，把持了佛山的铁锅贸易。“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公命诸弟诸侄经理其事惟谨。商客人人得以充其货，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⑬ 嘉靖年间，石湾霍氏从事佛山铁版的买卖。其家训称：“凡人家积钱，不如积货。所积亦有其方，难收易坏者不可积；人家用少者不可积。如佛山铁版无坏，石湾之缸瓦无坏之类者，可积也。”⑭ 屯积铁版，已成为当时坐收厚利的可靠生财之道。乾隆年间，黄玉阶“自己积有多金，生业当铺、铁锅店、铸锅炉。自建大屋一所，八柱官厅、土府及傍屋等座后。”⑮ 这些铁商，拥有仓房、店铺，交易活动就在自己店里或家中进行。二为行商，嘉靖、万历年间，李白作为李氏家族冶铁产品的推销商，远贩闽赣，“往来樟江、清源，千里外如出一手。”其兄李壮，号同野，是冶铸起家的大富，也亲自出马参加商品运销，“尝挟巨货遨游吴楚”，“出入樟江，一时名辈咸乐与之游，海内莫不知有同野公。”⑯ 万历年间，霍权艺世父冶铸，“已而家计大饶”，商旅于南京。当其七十悬弧寿

时，亲家李氏“曾走金陵数千里问寿。”^①这些铁商，挟货而行，四方出售，在外省建立了自己的推销网点。

佛山铁商人数众多，栅下天后庙从明中叶后就一直是众铁商聚会之所。^②入清以后，铁商又纷纷建立会馆。乾隆十五年，“论者以为诸商冠”的炒铁行会馆建立。^③乾隆四十四年，铸发行会馆建立。嘉庆元年，新钉行会馆建立。^④籍此联络同人，维护共同利益。

2. 陶商。自明正德年间，石湾建造了新式龙窑，烧造出五采斑斓的彩釉陶瓷后，石湾陶器便成为人们争购的对象。明清时期，石湾陶瓷品的买卖，以陶户的自产自销为主。正德年间，石头霍氏经营石湾陶瓷生产，其家训称：“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年一人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禀家长，以知功最。”^⑤这里的“司货者”，显然是石头霍氏的商业总管，各司其业的三人，则是总管属下的商人，其中一人为陶商。“岁入利市”，就是赚取的商业利润。嘉靖年间，以窑冶为业的石湾霍氏也以屯积“石湾之缸瓦”为其牟利的手段。^⑥清顺治年间，石湾陶业进一步发展。据碑刻记载：石湾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易粟以糊其口。官司量其船之大小，薄征其税，以抵正赋，听其自输自卖。”^⑦官府以征取商税来抵偿石湾乡的正赋，可见税源充足。这说明入清以后石湾陶商迅速增多，陶瓷产品交易十分兴旺。

8. 布商。明清时期佛山及其周围乡村家庭棉纺织业普遍发展，印染业随之兴旺。因此佛商中以贩布为业的不少。乾隆年间，洗似水“自设粤德布庄，货行苏、浙间”，^⑧与淞、宁之布商角逐。道光年间，黄世楚“自弱冠穗城贸易，谋猷经纶罗绮为家室计，逾为汾江大贾。”^⑨又如简祖寅，“随舅服贾汾江，谨慎勤劳，处事而事治，接物而物平，人皆重之。……既而合股伙友设布肆。”^⑩

4. 丝商。生丝出口，是明清佛山的重要商务。故而经营土丝者亦不乏其人。乾隆年间，有马进贤、马任贤两兄弟，居佛山梨巷，“荣业土丝生理。”^⑪稍后的潘佑安，“设号于香江（香港），业花纱丝茶，价如其货，……人谓公之起家以信义，不虚也。”^⑫

5. 药商。佛山成药业始于明代，盛于清代。其发展与佛山城市人口密集和冶铁、陶瓷等高温作业易出工伤事故不无关系。因此成药商人，也成为佛山的重要职业。乾隆年间，佛山参药行有二十七家堂店。道光年间，其中“称姜仁圃者，伯仲于羊城。”^⑬除参药行外，经营各类丸药店的商人更多。乾隆年间，潘晓修“市隐禅山丸药，济人远近沾溉，业以大起。”^⑭同时的潘联子，“居佛镇药肆数十年，同业称其仁厚。”^⑮

随着佛山药商营业的扩大，设肆于省城者不断增多。如乾隆年间的廖炎亭、道光年间的潘志元等，都是设肆省城致富的药商。^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广州爱育善堂的创办者潘明汉，起先，他在广州长寿街设“顺记”药店，商业日益发展，“积资稍裕，因倡办爱育善堂。粤有善堂，自爱育始。爱育善堂之设，又实自公始。”^⑰

此外，还有设肆于澳门者。乾隆年间，何建鼎“壮年服贾濠镜，业药肆至诚，与人

市货论价一二言而决。”嘉庆年间，肆业扩大，其子何文彩率领弟、侄数人赴澳门接办经营，药肆和收租之铺增加到四间以上。^④

6. 米商。明清时期，广郡民食尽仰采于广西、湖南之米，而地处西、北两江会流处的佛山则成了广东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户，把持着米市，垄断了价格。乡志载：“举镇数十万人尽仰资于粤西暨罗定之谷艘，日计数千石。谷艘至稍希，则米肆拥先，所采以增价。”^⑤“广西谷艘一日不到佛山镇，则囤户便联增米价。”^⑥因此佛山米商对佛山乃至广州的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佛山最重要的米商称“七市米户”，据碑刻记载，乾隆五十五年，“佛山镇辅民梁太盛、梁昇平、黄兴臣等呈称：蚁等向在佛山镇七市开张糙白米铺生理，每铺或雇工七、八人，十余人不等，俱系随采随碾，日逐发卖。”^⑦一铺雇工有十余人，经营规模实属不小。除镇内七市米户外，石湾、澜石、罗定、澳门等地都有佛山米商设肆经营。

7. 柴商、木商。佛山周围不产木材，即炊柴亦须贩自粤西。乾隆乡志就有梁舍人往粤西贩柴的详细记载。乾嘉以还，由于城镇发展，营建大兴，木材贸易也颇为活跃。《鹤园冼氏家谱》载：“木贩某者，向在街首营生，逋负多。先数日逃去，及是欲归死。铺门被业主钉锁。”^⑧买木者预先付了定金，木贩某却不能如期交货，造成“逋负多”。可见需要木材的人很多。一些商人还深入产地设肆营生，例如道光年间，何如驷“出营杉业于四会之仓冈墟。”时有某乡绅勒索杉商，何如驷“乃商诸同业者，每肆派一二人凌晨亲自驾筏，邀由局勇卫之，与彼辨争。而彼无能阻矣。自是其例遂绝，同业赖之。……而新业日有起色。”^⑨

8. 行商。明清时期，主要的商业市镇都设有“牙行”。所谓“牙行”，实际上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行商由身家殷实者承充，官府发给执照。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集专卖品。因其主富商巨贾的兴贩，所以“牙用”的收入，常常获利甚厚。清代的行商，只要有资产，也从事着商业活动。故其“牙行”，实际上就变成了“屯迟卖快”的大商店。康熙二十五年，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出文告：广州、佛山商民牙行“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明给帖。”^⑩乾隆年间，便有佛商廖九如承充洋货行。其家谱载：九如公原“往来汉镇，涉历江湖，沐雨栉风，辛勤备至。继乃居货佛镇，慨然膺西货（行），主人重寄，忠信勤慎，远迹商贾恒倚赖之。”^⑪

在佛山，行商不仅设立仓栈，而且砌造码头。乾隆四年《豆豉巷马头碑记》载：“据行商叶忠昌、顾同兴等状告前事称：忠等均在佛镇开张行店，贮顿客货，向共捐资砌造豆豉巷口马头，以利小艇载货上落，以便商民。”豆豉巷码头是清代佛山最大的商业码头之一，因此在码头附近聚集了许多行商。乾隆四年重修豆豉巷码头，捐助银两的行店就共有九十八家。^⑫

9. 典当商。清代佛山典业尤盛。据《粤东例案》记载：“乾隆十九年七月抚部院官批本司详查得佛山同知详称：佛山镇典、当、按揭按钱扣底一案，嗣后凡当货物，照例取

三分之外，丝毫不许苛取。”^④可见佛山当时已有典铺、当铺、按铺之别。典当业堆放货物的地点叫“质库”，形如近代的碉楼。当时“佛山多典肆。以御盗故，高其墙垣。……河道日狭，质库日高。”^⑤典当业一经设立，其触角必定会从城镇伸向乡村。乾隆年间，潘卓蕃“少聪慧，卓犖有大志。长设典肆于大桐、古劳诸处。”^⑥

与此同时，银铺业在佛山也方兴未艾。嘉道间官至山东盐运使的佛山人李可琼，在佛山晋丰银铺占有股金十一分之三，同时还在“安盛”银铺有大股本银，拟收回“自行经理”。另一姓梁的富商，也在晋丰银铺占有七股本银。^⑦道光年间，还有叫梁迪生者，“经商佛山，与弟璧生同理银业，信义为商场重。”^⑧

10. 船商。佛山以水运为主。船商也是一个重要行业。道光初年，原业铁锅的黄世楚改业“海南行，十有二年”，略积资财。^⑨同时的郭天锡，“商于西江，与雷某为伙，置船贩运，往来佛镇、苍梧间，致小有。”^⑩在长期的江海航行中，佛山船商积累了丰富的营业经验，这对后来的佛山商人经营近代轮船业无疑有深刻影响。晚清以经营粤津航线而著名的“广德泰轮船公司”的创始人梁定荣，就是佛山人。^⑪

11. 盐商。佛山地近省城，也有从事盐运者。如嘉靖年间，陈润澜“为西省盐商，数被滩险沉溺厥货，自是家业微薄，让里役于棚下东头冼卓甫。”^⑫又如乾隆年间，梁玉成“弃举业，就磋商。数年积资累巨万。”^⑬

12. 珠宝商。广东濒海，自古有合浦珍珠之饶，又兼广州向为南洋、波斯各地犀玉丛聚之地，经营珠宝乃是极易致富的行业。因此佛商也有到广州易宝者。《劳氏族谱》记载：顺治年间，劳成六“始在羊城为翠花生理，后开珍珠店，家自此富。人皆有‘珍珠劳’之称。”^⑭

除上述种种商人外，佛山还有颜料商、成衣商、线香商、烟草商、鞋袜商、铅商、铜商、糖商、果商等等。乾嘉道之间，佛山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⑮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当时主要的贸易形式。

三

明清佛山商人活动的地理范围相当广阔。他们经营的业务，不是仅限于佛山、石湾一隅，而是伸展向省内、省外各地。现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分列两表如下：

表一：明清佛商省内（附港澳）活动示例表

经商地区	年代	人名	营商情况	资料来源
广州	顺治七年	劳成六	始在羊城为翠花生理，后开珍珠店，人称“珍珠劳”。	《南海劳氏族谱》
	康熙	廖炎亭	贩药羊城，以不二价致富。	《南海廖维则堂家谱》
	乾隆二十三年	廖观铎	常坐贾羊城。	同上
	嘉庆	潘成光	初以贩药商于省垣附近乡落。	《潘式典堂族谱》
	嘉庆	潘宽怀	设肆于羊城西南隅，未几家成小康。	同上
	嘉庆道光	黄世楚	自弱冠穗城贸易，谋猷经纶罗绮。	《江夏黄氏族谱》
	嘉庆道光	何志孙	服贾会垣。	《南海烟桥何氏家谱》
	嘉庆道光	廖锡涛	少年别业服贾羊城，以恢家计。	《南海廖维则堂家谱》
	道光	廖国华	随叔父廖锡涛经商于羊城。	同上
	道光	潘志元	年近五十，隐府治药肆。	《潘式典堂族谱》
	道光	潘泽然	公业丸药，设商店于省城。	同上
	道光咸丰	潘明汉	设肆于长寿街，曰顺记。	同上
高州	隆庆	冼林佑	有矿山在高州，每岁必至课租。	《岭南冼氏宗谱》
	万历	陈善则	经商于高州府。	《金鱼堂陈氏族谱》
新兴	康熙	黄金发	就利于新兴、阳春等处。	《江夏黄氏族谱》
阳春	嘉庆	潘成孙	寄业阳春，所与交易者，俱以得见公为信。	《潘式典堂族谱》
肇庆	嘉庆道光	何捍润	服贾肇城。	《南海烟桥何氏家谱》
四会	道光咸丰	何如驷	营杉业于四会仓冈墟。	同上
西宁	道光	佛山富商某	与吴实修合伙开设“胜利”商店。	宣统《西宁县志》卷二十二
罗定	嘉庆	廖端修	商游罗定。	《南海廖维则堂家谱》
		潘镇扬	贾于罗定。	《潘式典堂族谱》
增城	道光	何职斯	少往增城贸易，久不还乡。	《南海烟桥何氏家谱》
韶州	嘉庆	何朋贵	贸易韶州。	同上
海南	道光七年	黄世楚	改业海南行十有二年。	《江夏黄氏族谱》
香港	道光	区河清	抵香港经营铜铁，少有余资。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
	道光咸丰	潘佑安	始商于越南，后设号于香江，业花纱丝茶。	《潘式典堂族谱》
澳门	乾隆	何建标	壮年营酒米业于濠镜。	《南海烟桥何氏家谱》
	乾隆	何建鼎	壮年服贾濠镜，业药肆。	同上
	乾隆	何建弼	亦尝服贾濠镜。	同上
	乾隆	何注润	先随赠公服贾濠镜，后综理肆务。	同上
	嘉庆	何文綵	长而学贾，携弟姪服贾濠镜药肆。	同上
	嘉庆	何才贵	弱冠随从兄何文綵服贾濠镜。	同上
	嘉庆	何炎洲	随族父何文綵赴濠镜，勤劳肆事。	同上

• 此表不包括佛山、石湾这两个主要营商地区

表二：明清佛商省外活动示例表

经商地区	年代	人名	营 商 情 况	资 料 来 源
广 西	万 历	陈润澜	为西省盐商。	佛山《纲华陈氏族谱》
	顺治康熙	梁舍人	年十九往粤西贩柴。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三
	乾 隆	孔兴伸	服贾西粤，专权子母，家少裕。	《倡建广东全省孔氏闾族家庙捐册》
	乾 隆	陈观炳	客西粤，以勤剑致富。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
	乾 隆	廖士珩	走西粤继承父业。	《南海廖维则堂家谱》
	嘉 庆	洗成禄	经商粤西，不数年获万金而返。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
	道光咸丰	郭天锡	与雷某为伙，置船贩运，往来佛镇苍梧间。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
湖 北	康 熙	霍惺台	商于荆，纳妾方氏归。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
	乾 隆	廖金荣	商于汉阳，所获倍利，家日益隆。	《南海廖维则堂家谱》
	乾 隆	李士震	贷货贩于湖、湘，于郁林稍获赢余。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九
	乾 隆	廖九如	往来汉镇，涉历江湖。	《海南廖维则堂家谱》
	嘉 庆	廖端修	初客汉阳，服贾于外。	同上
江 苏	嘉 靖	李 壮	尝挟巨货遨游吴楚。	《李氏族谱》
	万 历	霍权艺	商于金陵。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
	雍正乾隆	洗似水	设有粤德布庄，货行苏、浙间。	《鹤园洗氏家谱》
	乾 隆	霍世龙	服贾吴城。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
江西	永 乐	霍三第 祖 父	设肆于赣。	同上
	宣 德	霍三第	游贾于赣，经画先祖遗业。	同上
福建	嘉 靖	李 白	往来樟江、清源，推销铁货，拓产饶裕。	《李氏族谱》

上述两表，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表列地区里，佛山商人最集中的地点是广州，占表列商人数的21.4%和表列省内商人数的50%^⑧。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广州与佛山的商业联系。这两个城市，相辅相成，时人并称为“广佛”或“省佛”。当时各省出口的货物，必先运集佛山，再由此转输广州。而各省所需的中外货物，也通过佛山商人到广州置办。佛山和广州，正如两座巨大的桥头堡，千百个佛山商人，则象一条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两头。

二、清代乾、嘉、道三朝，佛山商人外出迁徙者最多，占表列商人数的72.4%，这与佛山城市经济在此时进入全盛时期的发展轨迹是相一致的。

三、佛山商人是以经营手工业品和民生日用百货为主，中小商人在商人队伍结构中

占了绝大多数。他们行业齐全，人数众多，其市场范围主要是省内和东南诸省。可见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确实是一个独具特点的商人集团。

四

从明初到清中叶，佛山商人在中国商界整整活动了四百余年。他们虽然在资财方面逊色于西商、徽商、和广州行商，但在勤勉和活动范围方面，他们则未让上述诸商。以中小商人为主的佛商资本是比较自由的民间资本，有着较大的灵活性。而以盐筴起家的徽商资本，以垄断外贸公行起家的广州行商资本，则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与政治相联系，与朝廷相始终，容易僵死在封建政治的外壳里。正是由于佛山商人与众不同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佛山商人在历史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一，佛山商人将其资本投向产业，促进了佛山手工业部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清前期佛山产业利润率极高，例如乾隆年间佛山炒铁业利润可“其获三倍”。^⑤因此不少佛山商人把其积累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部门。清代前期，投资于本镇冶铁作坊和外地矿山的佛山商人，见于记载就有麦念居、黄金发、黄玉阶、冯绍裘的先世等人。^⑥投资于本镇丝织机房的，则有梁俊伟等人。^⑦一些佛山商人还以包买商形式直接控制某项手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样，佛山手工业部门中便呈现出资本主义萌芽的两个重要端倪：一是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手工工场。屈大均《广东新语》就记载了佛山炒铁业一肆具有数百人的规模；^⑧二是自由雇佣劳动的普遍发展。乾隆乡志记载：“四方之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⑨清代佛山“徒手求食者”人数众多，有长工（入行工人）、短工（四乡农民工）和童工之分。他们靠出卖劳动力“以取赁值”。^⑩当时佛山祖庙门前的石阶，就是手工业工人待雇的劳动力市场，人称“企市”。^⑪

第二，佛商对佛山及各地城市的兴盛，对各省区经济联系的加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佛山，是佛商的大本营。清代以还，佛山发展迅速。康熙年间市面之繁盛甚至超过广州。^⑫嘉道年间，佛山街巷纵横，人口密集，发展成为“周遭三十四里”，人口二、三十万的繁华都会。成为不仅对岭南，而且对东南数省的商务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商业枢纽。此外，广州、汉口、北京、苏州等都会大埠，都有佛山商人建铺设号，定居下来。他们为这些都市的繁荣作出一定的贡献。

乡村墟镇，也是佛山商人所乐往。清前期，从佛山到梧州的西江沿岸墟镇，佛山籍的行商坐贾，比比皆是。在西宁县都城，有“佛山富商”设肆营商，并又出资与吴实修“合伙开设胜利商店”。^⑬在广宁县，“商铺多南海、顺德、三水人。转易货物，多从佛山。”^⑭怀集县“列肆当墟者”也“多新会、顺德、南海人。”^⑮这些游留外地的佛山商人成为当地居民的组成部分，既促进了所在经商地点市面的繁荣，也大大加强了各省区、各县市之间的经济联系。

第三，成长和造就了一批近代的民族资本家。佛商深谙“计然之术”、“亿则屡中”，营商有方，经验丰富。在佛山城市经济兴起发展的几百年间，不仅佛山之人“素业生意”，

世习商贾，而且四方之人也多“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此。^①由此成长起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作坊主和工场主。由于有营商知识的充分准备，有独立货币资本形成和集中的优越条件，一旦清中叶后门户洞开，与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结合起来，佛商中就迅速成长出一代民族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梁定荣、陈启源等，^②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 ①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艺文》宋玮《修复旗带水记》。
- ② 同上书、卷，黄兴礼《新建忠义乡亭记》。
- ③②①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 ④ 光绪《九江儒林志》卷三《风俗》。
- ⑤ 参见拙作《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 ⑥ 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广东文物》下册卷十。
- ⑦ 道光九年《鼎建帽绶行会馆喜助工金碑记》。
- ⑧ 卢梦阳《世济忠义记》碑。
- ⑨ 《佛镇义仓总录》卷一，《乾隆六十年奉宪建立义仓碑》。
- ⑩ 陈万豫《鹤园陈氏族谱》卷首·序。
- ⑪ 不包括侨寓佛山经商的外地商人。
- ⑫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叶汝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佛山经堂碑记》。
- ⑬ 冼宝干《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之二《六世月松公传》。
- ⑭②① 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三，前后家训。
- ⑮②⑦④⑧ 黄世楚《江夏黄氏族谱》（咸丰四年手抄本）。
- ⑯ 李待问《李氏族谱》卷五，《见南公传》、《祖考同野公传》；卷八《文苑纪》一，《同野记》。
- ⑰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卷十一，李待问《十四世祖行素公墓志铭》。
- ⑱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艺文志》李待问《棚下天妃庙记》。
- ⑲⑤④ 陈其晖《金鱼堂陈氏族谱》卷九，《艺文志》陈炎宗《鼎建佛山炒铁行会碑》。
- ⑳ 霍韬《霍渭厓家训》《货殖第三》。
- ㉑ 顺治十六年《三院严革私抽缸瓦饷示约碑》。
- ㉒ 《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人物谱；卷四，宗庙谱。
- ㉓ 《粤东简氏大同谱》卷十，家传谱。
- ㉔③①③④⑤ 《潘式典堂族谱》卷六，列传。
- ㉕ 道光二十年《重修参药会馆碑记》。
- ㉖ 详见表一。
- ㉗③② 《南海烟桥何氏家谱》卷九，杂录谱；《徐佩韦致何文绮书》卷七，《家传谱》。
- ㉘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
- ㉙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一，《与瑚中丞言粤东沙坦屯田利弊书》。
- ㉚ 乾隆五十五年《奉宪严禁示碑》。
- ㉛ 《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人物谱·列女。
- ㉜ 李士楨《抚粤政略》卷六《文告》，康熙二十五年《分别住行货税》。
- ㉝ 《南海廖维则堂家谱》卷二，艺文。
- ㉞ 乾隆四年《豆豉巷马头碑记》。
- ㉟ 《粤东例案》（抄本），当饷。
- ㊱ 梁九图《梁氏支谱》卷四，事迹。
- ㊲ 《李可琼信札》。
- ㊳①⑤②⑧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
- ㊴ 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列传。
- ㊵ 《佛山纲华陈氏族谱》·世德纪。
- ㊶ 《南海劳氏族谱》卷首·训言《三乐堂训言》。
- ㊷ 此数根据残存的《光绪二年重修佛镇棚下天后元君古庙官绅值事善信芳名喜认签题工金各行工料杂项费用进支数目刊列碑记》统计。
- ㊸ 营商广州的佛山商人占省内商人数的百分比，计算时不包括港澳。
- ㊹ 参见麦祝时《麦氏族谱》、《江夏黄氏族谱》、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等。
- ㊺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 ㊻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 ㊼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舆地略七·《陈子升上某明府书》。
- ㊽ 据佛山博物馆同志反映，当时“企市”还树立石碑一块，可惜今无存。
- ㊾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郎廷枢《修灵应祠记》。
- ㊿ 宣统《西宁县志》卷二十二，人物一。

- ⑤ 乾隆《广宁县志》卷七《风俗》。
 ⑥ 乾隆《怀集县志》卷一《风俗》。
 ⑦ 光绪《四会县志》编一《风俗》。
 ⑧ 简照南、简玉阶于光绪三十一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梁定荣也于光绪年间在

广州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陈启源于同治十年在南海县简村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其家乡离佛山颇近，其孙子陈恭受后成为佛山商团头子。



《知新报》的停刊时间

何 靖

《知新报》是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南地区创办的机关刊物。关于它的停刊时间，众说纷纭，兹归纳如下：

一、1898年1月（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郑慧英等编《中国杂志总目提要（1815~1936）》持此说。

二、1898年12月。主此说者有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历史博物馆主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中集）》、余家宏等编《新闻学简明辞典》、潘贤模《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报刊——近代中国报刊史初篇》。与此说类似的还有陈恭禄的“发行二年停刊”说。（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三、1900年7月26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冼玉清《广东大力提倡变法维新的报纸——谈清末的〈知新报〉》主此说。（见香港《大公报》1964年3月27日副刊《古与今》）

四、1901年1月20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主此说。

五、停刊时间不详，仅见第1至133册。新《辞海》与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都说：“停刊时间不详，所见第一百三十三册，出版于1901年1月20日。”近年来重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目录》搜罗已相当完备，但也只收录了《知新报》第1~133册的目录（其中缺第116册目录）。

笔者最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套比较齐全的《知新报》原件，是解放前由王怡爱堂赠送给岭南大学的，后归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在这套《知新报》里，笔者不仅发现了《知新报》的第116册，而且见到了于1901年2月3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这就否定了上述五种关于《知新报》停刊时间的推断。

新发现的第134册《知新报》目录及内文，无停刊声明或告白之类的文字。查1901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100册载《中国各报存佚表》中云：“《知新报》，澳门，佚。”可确知《知新报》在1901年12月21日以前已停刊。同册上载梁启超撰写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云：“《知新报》僻在贫岛，灵光归然者，凡四年有余，出报至一百三十余册。”（见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清议报》影印本，第12本。）梁氏指出“出报至一百三十余册”一说是可信的。《知新报》自第112册起改为半月刊，假如它能出版至第一百三十九册的话，最迟的停刊时间则应在1901年4月中下旬间。而我推测，它很可能出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1901年2月3日）第134册时即自动停刊了，因该报采用光绪纪年，第134册恰为光绪二十六年年度内出版之最后一册。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钟 史 声

广东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后来居上的地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较之国内其他地区有其明显的特点。近年来，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逐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显露出可喜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研究前景。区域性经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也越来越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现在，回顾该课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对于推动这一研究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是有益处的。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的管理制度上。1937年出版的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较系统地研究了在清代广东对外贸易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行商制度的起源、沿革和各家行商的活动情况。此外，梁嘉彬《广东十三洋行考》、①陆丹林《广州十三行》、②黄培生《十三行之研究》、③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④和《十八世纪中叶粤海关的腐败》、⑤张德昌《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⑥黄善生《清代广东贸易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⑦等，都以明清广东对外贸易为主要研究内容。外贸之外的其它经济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区季鸾的《广州之银业》、《广东之典当业》、《广东纸币史》等书就以专门篇幅论述清末广东的货币金融问题，黄善生的《广东洋米输入的史的考察》⑧一文则专门对清代广东大米进口问题进行讨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明清广东地方经济史的研究较少被人注意。但仍然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文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之三、四十年代有所发展。彭泽益先生的《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⑨阐述了清初开海前后广

东对外贸易的情况，对洋行制度的起源问题作了持之有故的考察，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还包括：汪杼庵《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⑩陈学文《明清时代佛山经济的初步研究》⑪和徐俊鸣《广东都市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⑫等。此外，许多学者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时，对明清广东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有所阐述。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成果，他的《关于广州十三行》⑬一文对十三行起始的年代、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情况、洋行制度的特点等作了系统分析，其不朽的巨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也着重搜集了大量有关广东地方经济史的统计资料。

对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始的。1979年以后，广东省在经济建设中采取多种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并建立三角洲经济区，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广东经济建设的成就及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启发人们对其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历史反思，现实的需要赋予史学工作者一种紧迫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深入开展的直接动因。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到反思和总结，国际史学的发展动态和学术潮流受到广泛注意，区域性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也日渐明显地显露出来，成为本课题研究不断深入的学术动因。

在1979年以后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广东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大成绩。1983年，国家把“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经济研究”确定为“六·五”、“七·五”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暨

南大学历史系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承担这一项目的研究。1983年和1984年,先后举行了两次学术讨论会,总结交流了研究经验和成果。这两次会议的学术论文已经结集,分别定名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和《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0月成立的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会,联合了广东省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档案部门、学术刊物和其它单位的经济史研究者,对本项目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中山大学历史系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经济史研究室也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本项目的研究上。近年来,广东学者在资料搜集、专题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努力,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79年以后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或向学术讨论会提交的有关明清广东地方经济史的专题论文在70篇以上,研究领域扩拓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一批资料汇编、论文集、专著和译著已经完成,即将出版。

近年来,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各地学者的广泛注意,研究领域从海外贸易扩展到手工业生产、土地制度、政府财政、商人和商业活动等各个方面。彭泽益的《广州十三行续探》^⑭和《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⑮李华的《清朝前期广东的商业与商人》^⑯和《明清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⑰王宏钧、刘如钟的《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⑱傅同钦的《明清时期的广东沙田》^⑲林永匡的《清初的两广运司盐政》^⑳吴仁安的《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㉑吴建雍的《1757年以后的广东十三行》^㉒等,都是立论新颖,持之有故的研究成果。

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明清广东社会经济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就笔者所知,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㉓汪宗衍《广东十三行之起源及其商业蜕变》^㉔周济年《粤人对外发展的特区——广州十三行》^㉕陈国栋《清代前期粤海关监督的派遣》^㉖《粤海关的行政体系》^㉗《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税务行政》^㉘和《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利益分配》^㉙等。罗香林主编的《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论文集,也收有多篇有关明清香港经济史的文章。

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就笔者所知,目前已出版或

发表的有关论著有:美国学者沃森教授的《农村社会,香港新界》、《传统中国的世袭租佃和宗族地主所有制,一个个案研究》,穆素洁博士的《中国糖业史,1644—1834年广东经济作物的政治和经济》,苏耀昌博士的《中国南方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土丝产地的历史变迁》,英国学者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加拿大学者魏安国教授的《清代华南地区的“一田二主”土地占有制》、《清代华南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租佃和土地占有》,日本学者松田吉郎的《明末清初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拓与乡绅统治的形成过程》,西川喜久子的《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片山刚的《清代末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图甲表及有关问题》、《清代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图甲制》和《清末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制的矛盾及其改革》等。国外学者提出的许多观点仍有可以商榷之处,但他们对材料的利用、观察问题的角度,得出的许多具体结论,都有富于启发性的借鉴作用。

二

下面,且从对外贸易、城市经济、农业与农村社会、手工业、商业活动与商品经济、政府财政、货币金融等方面对近年来广东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评述。

在近年来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海外贸易问题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研究范围有了新的开拓,已不限于长期为人们所注意的十三行和粤海关问题。明代广东对外贸易的兴旺与澳门的兴起有直接关系,而且澳门港的建立还对明代广东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黄启臣、邓开颂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㉚《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特性》^㉛以及黄启臣《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㉜等文,系统地考察了澳门港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原因,分析了澳门港海外贸易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葡萄牙殖民者租占澳门后,澳门开始成为广州贸易的外港和西欧在东方进行国际贸易的中心,从而使中西贸易和东西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黄启臣、邓开颂主编的《明清澳门交通史料汇编》已经完成,即将出版。明代广东三十六行的性质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是一个因史料记载语焉不详而

长期使史学工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李龙潜《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①一文，从对明代广东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剖析入手，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辨，指出三十六行因行业累计而得名，是明代揽承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手工业行帮的总称，三十六行与清代十三行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研究成果为解决三十六行这个史学悬案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粤海关研究中，戴和的《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用人及税收研究》^②一文，运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大量清代中央档案，对1685—1840年间粤海关监督的简充、家人、书役的签派、粤海关税收的定额、考核和收支报解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清代开海设关，对中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但粤海关的腐败又使中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十三行问题也是长期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章文钦的《从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的中西贸易看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③和《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的剖析》，^④从新的角度对行商制度进行分析，立论颇有新意。近年来研究明清广东对外贸易的论文还有：李龙潜《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⑤戴和《论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用人》^⑥和《试论清前期粤海关征税用人的弊端》、^⑦黄启臣《略论粤海关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响》、^⑧余思伟《清代前期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⑨和《广州市船司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⑩等。

佛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工商业市镇，明清时期佛山的冶铁业及附近石湾的陶瓷业十分发达，驰名中外。对佛山经济的研究是近年来明清广东城市经济研究的重点。罗一星的《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⑪对明清佛山冶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营方式作了系统论述，较深入地分析了冶铁业繁荣发达的主要原因和社会意义。叶显恩、谭棣华的《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⑫则从对宗族的分析入手，剖析了佛山冼、霍、李、陈四大族的发家史，论述了封建宗法势力对工商业活动的控制和干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近年来专门讨论明清佛山城市经济的文章还有：蒋祖缘《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⑬和《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⑭罗一星《明清佛山与景德城市经济的比较研究》^⑮等。由谭棣华、蒋祖缘、罗一星等编辑的《明清佛山碑刻、契约、文献资料汇编》也已经定稿，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社会和农业的发展，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在广东学者的研究中，经济作物种植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是主要的着眼点。叶显恩、谭棣华的《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与墟市的发展》^⑯一文，从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墟市发展的概况、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和功能、墟市的建立、管理与封建势力等方面系统地展开分析，认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愈来愈重的人口压力是农业商业化的重要原因，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对墟市发展有直接影响，墟市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墟市已具有商品集散市场的作用，但封建宗法势力对墟市的控制也加强了。此外，近年来研究明清广东农业商品化的论文还有：谢天桢《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经济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⑰和《明清时期广州郊区商品性的蔬菜、花卉和水果生产》、^⑱司徒尚纪《明代广东农业和手工业分布的若干特色》、^⑲姜守鹏《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⑳谭棣华《试论清代广东缺粮问题》^㉑等。在明清广东农村社会研究中，土地问题也是近年来较受注意的问题之一。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㉒刘志伟《简论明清时期广东沙田的所有权》、^㉓黄启臣、孙公麟《明清广东人口与土地的变动》、^㉔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㉕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农业与土地问题。

明清时期广东的手工业有较大程度的发展，矿冶、陶瓷、缫丝、纺织、制糖、制茶等手工业部门中已有新的经济因素出现。李龙潜《清代前期广东采矿业、冶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㉖和《清代前期广东地区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㉗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此外，邓开颂《明代至清代前期广东铁矿产地统计》、^㉘曹腾胜、谭棣华《关于明清广东冶铁业的几个问题》、^㉙程耀明《清末顺德县机器缫丝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㉚等都以明清广东手工业生产为主要研究内容。

明清时期广东与国内各地的商路贸易、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商业往来十分活跃，以广州为中心联结数省的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省内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也有效率较高的功能。黄启臣《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㉛一文对当时商业和商业资本发展的规模、条件、背景、趋势

和作用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类型及其特点》^④和司徒尚纪《从珠江三角洲生产分布的地理变化看明代广东的资本主义萌芽》^⑤也是专门研究商业或商品经济的论文。此外，陈春声《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⑥一文，从过去较少被人注意的物价问题入手，讨论清代广东的米粮市场问题，该文根据清代中央档案，对米粮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米价变化的长期趋势进行分析，认为乾隆年间广东缺粮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广东省内及其与外省的米粮贸易在保证本省各地的粮食供应方面有较高的效能，当时因人口压力和货币流通量增加而造成的粮价缓慢上涨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政府财政也是近年来明清广东地方经济史研究中较被人重视的问题。刘志伟《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明清时期广东地区赋役制度改革》^⑦一文，对从明代到清前期展开的赋役改革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认为一条鞭法与摊丁入地是同一改革进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通过这一改革，确立了具有近代财产税性质的赋税制度。明清之际财政制度的这一重大变革，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某种程度上的变动。以明清广东财政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论文还有：刘志伟《明代一条鞭法改革之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⑧、陈启汉《述广东“摊丁入地”》^⑨、冯志强《明代广东的盐户》^⑩、龚红月《清代前期广东的盐商》^⑪、朱荣基《光绪年间广东厘商现象的出没》^⑫等。

至迟从三国开始，由于广东的地理环境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广东的货币金融制度一直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在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中，货币金融制度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有，陈春声《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⑬和《清代广东的制钱铸造与流通》^⑭、王贵忱《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⑮、梅海《广东钱局始末》^⑯、叶显恩、谭棣华《略论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高利贷资本》^⑰等。

综上所述，近年来广东史学工作者对明清广东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1. 史料的使用上取材广泛，挖掘较深。过去的地方经济史研究者每每苦于材料不足，近年来广东地区的研究者们在这方面作了艰苦努力。上述各种论著不仅使用了正史、政书、方志、笔记、文集等常见的史料，而且还大量地利用档

案、谱牒、账本、碑刻等过去较少利用的材料，所有研究专题在史料的发掘上都比过去有所发展。

2. 研究范围较广，课题丰富多彩，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一些专题不仅填补了明清广东地方经济史研究的空白，而且过去在国内史学界也较少为人所注意。

3. 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本项目研究的主要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在老一辈史学家指导下潜心钻研，保证了本项目研究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较多的成果，给研究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三

在充分肯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缺陷。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是应该而且也是可能得到加强的。

首先，要大力加强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分析，注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研究。

毋庸讳言，理论分析不深，学术眼界不高在目前的明清广东地方经济史研究中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弱点。如果说，前阶段进行的是拓荒性工作，主要的力量不得不放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理论深度不够有其客观原因的话，那么，在研究工作已进行到一定程度，取得一定成果的情况下，如继续忽视抽象的理论思维，就会对研究的深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结合而形成的边缘学科，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应该指出，区域性研究也有宏观问题，我们不但要弄清历史上某时某地的具体的经济事件和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事件或现象放在总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下面，甚至放在全球性的经济背景下加以考察，从中得出有较大学术价值的带普遍意义的结论。在当前国际上的区域性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分工与经济功能、商路与商业网络、市场结构和市场层次、经济模式和经济体系等等都是很受重视的课题，而这些课题的研究都必须以较好的理论素养为前提。我们应该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的同时，密切注意国内外的学术潮流和学术动态，开阔视野，提高眼界，增强理论思辨能力，通过艰苦的努力提高区域性经济史

研究的学术水平。

当前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学术争鸣的风气不浓，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是不利的。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鼓励自由的、平等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包括与国内各地和海外学者的讨论，以便把研究工作推向更高的阶段。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既不就事论事，又不流于空论，既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问世。

其次，要加强对较薄弱课题的研究，保证各方面研究的均衡发展，争取对社会经济各领域及其相互关系有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

尽管目前的研究已涉及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各专题的研究不论在成果的数量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是很不平衡的。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薄弱课题的研究上，在现阶段，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尤其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

1. 土地制度和地租形态。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租剥削形态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关键所在。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租佃制度和地租交纳方式有其明显的特点，阐明这些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这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与其重要意义是不相适应的。

2. 人口和土地问题。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人口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生产两个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土地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各种活动的最重要条件。人口和土地问题的研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也应该大大加强。明清两代人口和土地统计不准确，是开展研究的主要障碍。我们要注意汲取国内外学者的最新成果，广泛搜集有关资料，通过各种材料的对比分析，去伪存真，争取对各个时期广东的人口变化趋势、土地面积增减趋势、人

均耕地面积、人口密度等基本问题有一个较接近历史实际的了解。

3. 商品货币关系。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新的经济因素，开始从古代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模式的过渡，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否已有资本原始积累？如何估量商人和商业资本对封建经济结构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会走上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明清广东商品货币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

再次，要注意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汲取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性的新的技术革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正日益广泛和深入，我们应该注意这一学术发展趋势，在坚持搜集史料、考证辨伪、比较分析等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和继承优良的史学研究传统的同时，积极采用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于电子计算机、数理统计、经济数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方法都要加以注意并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而又慎重地应用。在当前的经济史研究中，数量分析是一个尤其需要重视的环节。

又次，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省内、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学术联系。近年来广东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并扩大。我们还要加强与图书、博物、档案、出版等部门的联系，争取在工作上更多地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国内各地和海外的专家、学者的交流、联系已使我们获益匪浅，今后还要进一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期望各地的学者能更多地关心、支持和参加我们的研究。今后我们将继续举行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和讨论会，在条件许可时还将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地方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以这样的方式来交流研究成果，加强学术联系和学术合作。

① 《清华周刊》37卷5期（1932年2月）。

② 《逸经》第6期（1936年5月）。

③⑧ 《南大经济》2卷2期，1卷1期。

④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5月）。

⑤ 《人文科学学报》1卷1期。

⑥ 《清华学报》7卷2期（1932年）。

⑦ 《岭南学报》3卷4期（1934年）。

⑨⑩⑭⑮ 《历史研究》1957年第1、6期，1981年第4期，1983年第3期。

⑪ 《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8期。

⑫ 《南方日报》1957年2月22、23日。

- ⑬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0年11月)。
-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学术研究>1982年第2期, 1981年第3期, 1980年第2期, 1982年第6期, 1979年第5期, 1984年第5期。
- ⑳㉑ <清史研究集>第三辑(1984年版)。
- ㉒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五期。
- ㉓㉔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983年第4期。
- ㉕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卷1期(1982年)。
- ㉖ <广东文物丛谈>, 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版。
- ㉗ <东南亚学报>10卷6期。
- ㉘ <史原>第10期。
- ㉙㉚㉛ <食货>月刊, 复刊11卷4、10期, 12卷1期。
- ㉜㉝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982年第3期。
- ㉞㉟ <岭南文史>1984年第1、2期。
- ㊱㊲ <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1983年第2期。
- ㊳㊴㊵ 中山大学研究生硕士论文。
- ㊶㊷㊸㊹㊺㊻㊼㊽ 第一次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 ㊾ <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4期。
- ㊿ <文史哲>1982年第2期。
- ①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4年特刊号。
- ②③④ <广州研究>1985年第1期, 1983年第2期。
- ⑤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
- ⑥⑦ <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第二次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 ⑯ <经济地理>1982年第4期。
- ⑰ <平准>1984年第1期。
- ⑱⑲⑳㉑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2年第1期, 1981年第3期, 1984年第4期。
- ㉒ <学术研究内部文稿>1985年第1期。
- ㉓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㉔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 ㉕ <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扶桑国之谜”的研究史及流派述评

谭世保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数不清的历史疑难问题吸引着人们去钻研探索。“扶桑国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百多年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歧很大，流派很多，存在日益复杂难解的趋势。

对“扶桑国”的研究探讨，自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提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报告后始为世人瞩目关注。^①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小范围的研讨争论则从1752年8月28日德·歧尼与在北京的科贝尔神父书信讨论《文献通考》时便开始了。同年10月30日及11月3日科贝尔神父的信都提出了反对德·歧尼的意见。^②当德·歧尼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在同年12月的《学人》(Des Scarans)杂志上登出后，科贝尔神父的支持者慕拉便依照科贝尔的意见写信给巴黎文史研究院院长表示公开反对德·歧尼之说：“我相信这航行是无稽之谈。同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德·歧尼本人，以我的理由答复他其中一封来信，那来信他曾把他的发现详尽告诉了我的。现在，德·歧尼要违反科神父，把他的意见公诸于世，希望得到人们的支持，那是他自己的事了”。^③

但是，当1761年德·歧尼正式向法国文史研究院提出其研究报告后，这就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成了西方汉学界都关注和感兴趣的事了，并且后来东方包括中国的学者都陆续投入了这个问题的研究争论。两百多年来，法、德、英、意、俄、日、美、荷、印度及中国不断有学者发表论文和专著。综合各派意见，大体可概括为三大说：

A. 扶桑国在美洲。

B. 扶桑国在亚洲。

C. 扶桑国是游僧编造的海外奇谈，世上并无此国。

这三说中，A说到目前仍最流行，其源流派

别有：

(a)最初由德·歧尼提出在北美洲西岸的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一带。^④

(b)其后来的支持者如艾·维宁(E.P. Vining, 又译文宁)于1885年写成的《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来自阿富汗的佛教僧团于五世纪发现美洲的新证据》一书主张扶桑国即今墨西哥国。^⑤此墨西哥国在今中美洲，与德·歧尼所说的属于北美洲美国的新墨西哥是不同的。此说直到目前仍属占优势的大派。

B说有三派：

(a)日本的松下见林早在德川时代就提出扶桑在日本国更东的地方。^⑥后来科贝尔神父与德·歧尼争论时提出“扶桑在琉球之东，日本东部之北，附近有古国”^⑦之说就是与此相承的。其根据是元明时的一些中国古地图所标扶桑的方位是在美洲以西、日本以东的一个海岛。

(b)日本的平田笃胤于1830年以前写的《大扶桑国考》主张扶桑国即日本。^⑧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洛特(H.J. Kleproth)于1831年发表《中国文献中所载的扶桑国被误认为是美洲一部分之说的研究》，也主张扶桑国在日本东南部。扶桑国在日本或即日本之说，在后来的研究中成为与扶桑国在墨西哥或即墨西哥说对立的一大派。

(c)荷兰汉学家施勒格(G. Schlegel或译施古德)《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卷一《扶桑国考证》主张扶桑国在桦太岛(日名桦太岛，中国名库页岛，欧洲人或误作萨哈连岛)。

C说为我国清末地理学家丁谦提出。他在1902年以前成书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梁书夷豹传地理考证》说：“以上四国(指文身、大汉、扶桑、女国)皆荒诞不足信。……揆其说所由来，皆出于游僧慧深之口，一时士大夫为其所愚，遂行传播”。^⑨日本白鸟库吉从日本明治四十年(公

元1907年)起先后发表了《关于扶桑国》等论文及演讲提要四篇(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九卷),开始也认为扶桑国是实有之国,最后亦主张扶桑国是作伪虚构的产物。

除了A、B、C三说外,在中国还出现了独特的B、C二说混合的罗荣渠说。1962年,罗荣渠发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⑩认为扶桑国只是外国游僧编造的海外奇谈而已,又认为如果说外国僧人果真到过中国以东的某个扶桑国,那估计这国家的地理方位大致是在北界不超过库页岛,东界不超过日本,西界不超过贝加尔湖这个地区范围之内。但其最近发表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⑪虽然仍坚持扶桑国的存在只是一种猜想,但关于其所在位置的猜想则大大修正了上说。首先他推测扶桑国“应在大陆而不在海上。”其次,他认为把扶桑国“的方位推测在东北亚恐怕都太远了。”最后他说:“目前我倾向扶桑国是在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域内某个地方。”这一提法,是我国七十年来研究扶桑国问题中唯一独树一帜的。

我国研究扶桑国问题起步较迟,在丁谦之后,1913年出版的《地学杂志》所载公兴的《寻获美洲者非哥伦布说》,是中国较早对扶桑问题作出有价值论述的论文。此后陈汉章在1920年《地学杂志》4月号发表《美洲为古蟠木地说》、陈志良于1940年《说文月刊》第一卷发表《中国人最早移殖美洲说》,都是属于持A说的。次年朱谦之出版了131页的专著《扶桑国考证》,这是我国七十年来唯一的一部关于扶桑国问题的专著,是持A说(b)派的。此后韩振华于1947年《福建文化》上发表《扶桑国新考证》一文,全面否定了朱谦之的论点,竭力论证倭国即扶桑国,扶桑国即日本,倭国为扶桑所灭后即统称日本为扶桑国。

新中国诞生后,扶桑国问题一直无人顾及,直到六十年代初始出现一次争论,1961年3月27日《解放日报》登载的《我们的祖先在拉丁美洲》,同年《知识就是力量》第八期译载了以《比哥伦布早一千年》为题的俄文资料,9月《北京晚报》连续发表了马南邨(即邓拓)的《谁最早发现美洲》、《扶桑小考》、《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三篇文章,都是属于持A说的。此后一年来报刊共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扶桑的文章和报道,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兴趣重新兴起,但大多数是把外国人已研究争论了二百年的老问题当作“非常新奇”的新

问题来处理。⑫真正能够以继往开来的姿态投入研究争论的,可以说只有1962年《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所载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人发现美洲考》及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两篇论文。朱谦之是重申其旧作《扶桑国考证》的观点,而罗荣渠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B、C混合的新说。

此后,我国对扶桑国问题的探讨长期沉寂,到七十年代末始重新活跃。1979年《世界历史》发表了张志《慧深和扶桑问题》。到目前(1983年6月)为止,多种报纸和杂志发表的有关论文、报道、述评共有三十多篇。⑬从数目上已超过了“文革”前的文章总和,显示了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讨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有必要看到,这几年的文章虽多,在个别具体的问题上不乏一些新见解,但基本上可以说是陈陈相因,局限于前述外国学者所提出的A说(b)派及B说(a)派。因此,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在扶桑国的研究中只存在扶桑国在或即墨西哥与在或即日本的分歧对立。而且,所有文章(包括专题论文和综合报道述评),在提到研究史及流派概况时,都存在一个重大的遗漏,就是忽略了C说和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对罗荣渠的B、C混合说的特点也没有注意总结说明。至于A、B两说,虽然很多文章都曾罗列过不少其人其文,但从未有人对其源流派别作认真细致的划分,不能精确地分出每一大说中都可以分出两、三派。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术界长期忽视了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流派。朱谦之对研究史的介绍主要是依据法国汉学家戈尔迪(Henri Cordier)所著《中国学书目》(Bibliotheca Sincia或译作《西人论中国书目》)第四册2654至2658页、3218页,第五册4247页所录关于慧深与扶桑问题的三十多种重要论文和专著。朱谦之认为,“在戈尔迪书目以外,还可以数到中日文关于扶桑问题讨论的文献,不过都是无关紧要的介绍文罢了。”⑭其实,日本方面的研究不仅起点相当早,而且专著论文相当多。据日本昭和四十五年(公元1971年)版的《图书总目录》第七卷载,自1169年以前成书的《扶桑略记》之后,以扶桑、扶桑树及扶桑国为题的文史地书籍便有一百多种。这些书大都以扶桑为日本之某地名或即日本。虽然日本的研究争论没有如西方学者的研究那样引人注

目,但是,日本学术界关于扶桑国的分歧讨论比西方有更悠久的历史。据白鸟库吉介绍,早在德川时代便开始了有关考究争论,如松下见林主张扶桑国在日本国更东的地方,而平田笃胤以《大扶桑国考》为题的专著广泛引用日汉书籍,论证扶桑国即日本,对松下派意见进行猛烈的辩难攻击。此后日本学术界就一直存在这两派的争论,直到大正六年(公元1908年)才由白鸟库吉明确提出扶桑国为伪造说的第三派意见。^⑮由此可见,日本学者研究扶桑国问题不仅比德·歧尼早半个世纪,而且产生值得注意的独具一格的白鸟库吉说,把丁谦提出的C派观点充分发展了。

纵观近三百年的扶桑国问题研究史,可以讲

是众说纷纭,派别繁多,问题越搞越复杂,牵扯到谁最先发现美洲、美洲文化起源等等重大问题,而卷入研究争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笔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探索者。在对研究史作了基本了解,对上述各派各说作了对比分析之后,加上自己对中外史料的新探索、新挖掘,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对A说不敢苟同,对B、C两说及罗荣渠的混合说则取其所长而弃其所短。笔者认为,《梁书》所说的扶桑国应在中国东北至朝鲜半岛一带及其附近的海岛范围内,既不会在这一地区以西的内陆,也不会在对马岛以东的日本,更不会在美洲。对此,笔者将另撰专文论述。

①④⑤参考《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62页。

② 参考朱谦之《扶桑国考证》卷一2页。

③ 参考并转引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211页。

⑥⑧ 参考《白鸟库吉全集》第九卷15页。

⑦ 转引《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卷一5页。

⑨ 此书虽载于1915年出版的《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但原书有1902年陈汉章所作之序,可证成书应在1902年以前。

⑩ 载《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⑪ 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⑫ 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及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149页均对此提出了批评指正。

⑬ 据赵淑凡《“扶桑”考证在中国》的统计,见《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84页。

⑭ 见《扶桑国考证》11页。

⑮ 见《白鸟库吉全集》第九卷71—90页。



佛教改革家——惠能

陈福雄

纵观中华史册，改革者众多。商鞅、王安石等，可称之为政治改革家；而惠能，则是一位杰出的佛教改革家，他改造了传统佛经，创立了别具一格的禅宗理论体系。

惠能出身贫寒，生于唐太宗执政后第十三年即638年，歿于唐玄宗执政的第二年，即713年，中经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代帝皇。他祖籍河北范阳，父亲卢行瑄，是初唐县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贬到岭南新州即今广东新兴县，当普通老百姓，并成婚于此地。惠能三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靠上山打柴狩猎度日，过着艰难困苦的山民生活。

青年惠能，是一个勇于探索和追求的年轻人。历史的发展，为惠能的探索和追求铺垫了道路。当时，我国正处于盛唐前期，社会安定，文化发展，各种经典教义广为传播。这种社会环境，给惠能的探索和追求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基于家境穷困的原因，惠能没有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但是，卢母是一位思想较为开化的南方妇女，经常给惠能讲述人生之道。惠能平日赶集卖柴买米，来往于乡镇之间，见闻日增，遇到街坊邻人议论世事俗理的时候，惠能总要凑过去细察究竟，养成了观察生活、审视世道的习惯。一次，他在街边听人讲《金刚经》，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下决心出家为僧。廿四岁那年，惠能离开母亲和乡亲，走上了僧徒生活的道路。他徒步走到粤北重镇韶州即今韶关市；在此，他结识了一位尼姑，尼姑又给他讲《金刚经》，并指点惠能去湖北黄梅山东禅寺拜见五祖弘忍大师，深造佛

理。惠能不辞劳苦，千里跋涉来到了东禅寺，一过口试，被收为弘忍大师的徒弟，安排在伙房做一些粗工重活，但惠能毫无怨言，且经常细听弘忍大师讲经，深得弘忍大师心爱。不过，在众僧眼目里，当时惠能只是一名“旁听生”而已。

惠能学经，不满足于人云亦云，死记硬背经文词句，而是注重于掌握经文要义，善于辨析，提出见解。这大概就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教改革家的个人条件吧。当时，弘忍身边有一位地位仅次于弘忍的讲授师，名叫神秀。此人能写会道，平日常代替弘忍向众僧讲解经文。当弘忍提出谁能表达自己对佛经意旨的真切见解即授予衣钵（传祖权）时，神秀首先应试。神秀书一偈于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众僧赞赏神秀偈，并时时唱诵。惠能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此偈未能表达佛性真义，于是请人代书一偈（惠能原是文盲）：“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惠能用无相破有相、用顿悟对渐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抓住了佛经真义，又有独到见解。于是，深得弘忍信用，秘密授予衣钵，被立为六祖。惠能改革佛教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果说政治改革家是通过政策主张和社会改革活动来表现他的思想的话，那么，佛教改革家惠能的思想，是通过他口授《坛经》和宗教活动来体现的。承接五祖衣钵之后，惠能即南归。为防避神秀一派暗害，他在广东四会县一带山民中隐姓埋名十余年，然后才到广州法性寺即今光孝寺公开身份。随后，他又北上韶州南华寺安营施

法，掀开了佛教改革者生活史上新的一页。韶州刺史韦璩特邀惠能到大梵寺讲经，并亲自率领文武官吏前往大梵寺听讲。《坛经》就是惠能弟子法海根据当时惠能的口授记录整理而成的。《坛经》是惠能成功地改革传统佛经的历史见证，也是惠能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创立禅宗理论体系的直接依据。

我国的佛教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自东汉到南北朝，是传入、吸收、翻译时期，以照抄、照译、照述、照诵为特点；中期——隋唐时期，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相揉合，创立新理论、新教派，以惠能改革传统佛经、创立禅宗理论体系和教派为特点；后期——宋朝之后，别具一格的禅宗理论和教派向海内外发展、扩散，是这个时期的特点。这时，《坛经》被翻译成日文、英文等各种外文版本，流传到世界各地。佛教的传入，和唐玄奘、达摩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禅宗理论和禅宗教派的外传，则跟惠能对传统佛教的改革联系在一起。

惠能《坛经》对传统佛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坛经》革除了旧经卷名目繁多、内容庞杂、文字艰涩、含义难解、注释冗长的弊病，创立了简明易懂、通俗化、口语化、大众化的经文。汉译印度经文，数以万计；而《坛经》，以敦煌石室藏古本为例，不过一万二千字，除去后人增加的部分仅万字。不仅简明，而且易懂，文化人看得懂，文盲人听得懂。（2）、《坛经》革除“外求成佛”的观点，创立“人人有佛性”、“内求成佛”的观点。过去，求佛、成佛要求必须出家，必须到西方去，必须经教化修行；而《坛经》则侧重于自悟修行，不必去西方，不必出家，不必教化，只要“自性”、“自见”、“自观”、“自悟”、“自化”、“自知”、“自心起智慧观照”，即可达到见真如本性之目的。韶州刺史韦璩问惠能，东方离西方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东方人向西方取经求佛，须长途跋涉，而僧徒们于寺内念经，能成佛吗？惠能用比拟回答：佛性可以内求，只要“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弹指。”他认为，居家修行，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即是西方”。他强调，外求成佛是十分笨拙的事，结果，惠能那种“人人有佛性”、个个可自悟、时时处处可修行的观点，得到广泛欢迎。尤其是平民百姓，似乎精神上找到了某种寄托。（3）、《坛经》革除传统的求佛方

式“渐悟”法，创立了“顿悟”法。“渐悟”法用没完没了的修行把人们导向毫无体会的“成佛”的精神寄托上去；而“顿悟”却诱导人们通过三十六对法（如天与地对、邪与正对、清与浊对等）达到每时每事的“见性成佛”的具体的精神安慰上。显而易见，《坛经》创设的相相对法，以调和矛盾、冲消对立面为最终目的。（4）、《坛经》革除“有相”论，创立“无相”论，把佛性确定为一种可以为平民百姓听得懂的“清静”本性，并确认这种“清静”本性是不受外界事物沾染的。惠能说，太阳本身是发光体，而浮云遮盖，使人见不到阳光，太阳和浮云无沾染关系；佛性也是如此，当人们迷入歧途时，不见佛性，佛性在人之中是一种虚无的、清静本性，不是一实体，无形相，它本身不沾染外物，不著相，只要各人通过各种相相对法“自悟”，即可驱散浮云，“见性成佛”。《坛经》“直指人心”的观点是独创性的，它改造了印度佛教关于修心养性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儒家“性本善”的思想，以及道学的对立相倾的思想，于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禅宗理论体系和教派。

改革者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惠能改革传统佛教也是如此。对惠能承继五祖弘忍衣钵怀恨在心的神秀，曾经派人跟踪惠能，企图强夺衣钵，争霸祖位，未成；后又指派手下徒弟智常前往曹溪南华寺，刺探情报，肆图捣乱，亦未成。神秀入长安为武则天效劳，于公元696年把南华寺惠能曾得五祖衣钵一事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下达“圣旨”到南华寺，令惠能北上长安，并带上衣钵，惠能拒绝北上长安；但迫于无奈，只好呈上衣钵。这件珍贵的佛祖衣钵，一直到惠能死后五十年，即764年，才归还南华寺。惠能死后，神秀曾一度在北方自称为“七祖”，惠能得力弟子神会，前往河南南阳申辩，方澄清是非曲直，维护了惠能创立的禅宗理论体系和派系的正统地位。

惠能改革传统佛教、创立禅宗，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东南亚各国，日本，斯里兰卡，和北美洲、欧洲大陆的一些禅师、教徒，仍念念不忘六祖。每逢寺庆之日，各地禅宗后代都派人到南华寺庆贺一番。前几年，日本、斯里兰卡的禅师到南华寺参观，给寺庙赠送了条幅和礼品。欧美各国华侨和港澳信仰禅宗的同胞，佛教界人士和组织，捐赠了款项修缮南华寺。禅宗理论，成了我国和世界各国密切联系的桥梁。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与早期鲁迅思想

陆 路

早期鲁迅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很具代表性的。研究早期鲁迅思想，固然应该研究达尔文、尼采、厨川白村等外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著作对他的影响，但从早期鲁迅“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射和回声体现在鲁迅思想中，构成了早期鲁迅思想的特征，早期鲁迅才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占重要的一席。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封建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同时，西方的物质文明（运用近代先进技术武装的坚船利炮和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品）猛烈地冲击着这东方古国的自大、愚昧。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随着它们摧毁中国闭关的大门而大量涌进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客观上又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

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在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哥白尼伽利略的天体学说面前，“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天授”等封建制度的理论支柱崩溃了，于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鼓动下，猛烈冲击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进化论学说，对当时寻找真理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中国迹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侷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们那里，自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他们都力图指出或找出一个宇宙万物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总的规律、总的法则，来作为自己活动的依据。进化论这种自然观之所以具有一种哲学意义，之所以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思想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广泛流行，风行全国，寻找真理的人们，不管有没有正确地理解达尔文学说，总是乐于去宣传它，至于顽固没落的、捍卫封建思想的人们，却竭力去反对它，道理就在这里。当时的社会活动家在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时，总要从自然从宇宙图景讲起，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章太炎，目标是讲社会问题，起点却都是自然、天体。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也运用自然科学这个武器，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但他们大多在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方面都有深厚的积累。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制，近代工业和

近代科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唯物主义哲学也就缺少了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唯物主义是非常不完整不彻底的，它们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而且仅以涉及某一门具体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为限，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样，就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个特征：强调从宇宙万物的究竟来谈社会人世和政治理论，自然科学被直接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早期鲁迅思想也是如此，这构成了它的一个特征。

鲁迅从国家当时的现实境况体会到，封建文化象死尸般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他们的精神状态陷于愚昧的境地，以致帝国主义列强群起瓜分中国的时候，不少人还存有迷信思想，沉醉于“风水宅相”之说。“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而何图风水宅之说，犹深刻人心，力杜富源，自就阿鼻。”

本来，中国科学的落后，人民的愚昧，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但是，这个事实反映到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却倒置过来：是科学的落后，才造成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受人欺凌。同样，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的指导，缺乏对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历史的了解，鲁迅与当时的思想家们一样，片面地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归功于科学的发展。鲁迅说，十九世纪末叶“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因而，鲁迅也和近代所有先进的思想家一样认为，要救国救民，就必须求助于科学，“科学之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鲁迅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学习自然科学，撰写、译写了一批科学专著和科学小说，如《中国矿产志》、《说铌》、《月界旅行》等。在早期鲁迅接触的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各种著作中，最能切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也最吸引鲁迅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学说。达尔文的学说使鲁迅认识到，自然界的生物以至人类自身都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来的，今后还要发展下去。在这个发展的历史长途中，自强不息者日益向上发展，停滞不前者将在物竞与天择中受到淘汰。有了这个基本看法，世界就再不是混沌一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对于早期鲁迅观察积贫积弱的祖国，认识备受欺压的人民，有发人深省、使人猛醒、促人奋进的作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鲁迅不能接触更多西方哲学学说的合理因素（如唯物论、辩证法等），因而不能在近代科学成果的帮助下，形成比较科学的世界观。于是，达尔文的学说被鲁迅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接受下来。

从在矿路学堂读到《天演论》起，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到五四时期的鲁迅，都是以进化论来认识和解决现实斗争中遇到的问题。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又要求做父辈的要“各各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些都是基于“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的观点而提出的。直到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目睹了同是青年，却分成两大阵营，才彻底摧毁了鲁迅的思路，使他认识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

观察社会的一种武器。

信奉社会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特色，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又各有不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作为自然科学，本身也有严重的缺陷，在它的发展观念中只有渐变而没有飞跃，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资产阶级改良派如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不敢从根本上推翻清王朝封建制度，而只搞自上而下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良，实行君主立宪，以求封建统治阶级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让出一点地盘。出于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需要，他们极力鼓吹“不可期之以骤”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反对民主革命。鲁迅所处的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能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他说：“犹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可见，他是赞成孙中山的革命论。

一方面赞成革命，一方面又用进化论的观点去分析、解决问题，于是，早期鲁迅的历史观同孙中山一样，也表现出二元论的倾向。鲁迅的《狂人日记》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真相，表现了鲁迅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同时，鲁迅又提出要劝转吃人者，“救救孩子”。如何“劝转”呢？鲁迅说：“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这么多矛盾！吃人者与被吃者，属于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之所以要搞社会革命，是因为两个阶级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如果反动势力能“欢天喜地”地退出历史舞台，又如何需要革命？鲁迅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提出过疑问：假如“长者”“不肯解放子女”，那么怎么办？回答仍然没有超出进化论的水平：“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解答。”可见，当深入到如何解决阶级压迫和对立时，鲁迅又陷入唯心主义。

早期鲁迅从宇宙万物的究竟来谈社会人世和政治理论，将某一门自然科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增添了他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是社会自然观局限了他，使他的历史观带着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前者对后期鲁迅思想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鲁迅一旦成为成熟的马列主义者以后，自然科学不再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解决社会历史问题，但作为“自然科学依据”仍增加鲁迅辨析事物的能力。在《文学与出汗》这篇文章中，鲁迅用历史的观点批判了梁实秋永久的人性后，又运用自然科学的结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一点佐证：“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

二

早在明王朝的中后期，中国就开始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相当迟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未能达到足以根本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程度，也未能产生出一个足以同封建地主阶级对抗的资产阶级。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趋于解体。这就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将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此，他们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极力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封建经济和帝国主义经济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他们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围绕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创造出一整套理论。于是，他们只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现成的以至传统的思想材料中寻找合适的表述方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二个特征：时尚的理论珠宝被装进最古拙的饰盒，地道的中国资产阶级货色被贴上外国的包装（当然，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也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那里吸取营养，但那是问题的另一面）。康有为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期鲁迅的思想，也具有这个特征。但鲁迅与康氏不同，他刚步入青年时代，中国近代史经历了触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反帝运动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猖狂入侵，辛丑和约带来了我国主权和利益更骇人听闻的掠夺。而鲁迅自己，更是由于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路途中，看清了人世的真面目。封建社会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鲁迅所代表的自耕农的根本利益，使他不会象康有为那样从“公羊三世说”那里寻找思想的外壳。但自耕农不是先进生产力和未来新社会的代表，因此，早期鲁迅不具备创立一套新的理论的现实基础和阶级基础。于是，他更彻底地转向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探求（这种探求，实际上从康有为已经开始了）。

鲁迅能找到什么呢？列强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宗法式自然经济，促使大批自耕农破产，他们极端仇视帝国主义的入侵。但正如列宁在谈到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农民时所说：“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鲁迅找到的也只能是憎恨和复仇。于是摩罗诗人的“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抗伪俗弊习”和“复仇”的呼叫，便无遐多想地为鲁迅所搬用。他未想到也不可能弄清这反抗和复仇的具体内涵和路径。他只搬来了摩罗诗人的口号——空泛的思想外壳，而不是思想的内核。

我们可以从鲁迅对尼采一度盲从中得到说明。我们说过，早期鲁迅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或反映了走向崩溃的封建宗法社会中自耕农的某些气息和特征，因此，他的整个理论要求是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特别是走向反动的帝国主义思想理论要求是不一样的。尼采的思想，恰恰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代表，它是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称霸世界的利益服务的。那么，早期鲁迅如何会对这个从阶级属性来讲是根本对立的理论产生共鸣呢？列宁指出，小生产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种极端的革命性在认识方法上往往表现为极端的片面性。这正是早期鲁迅得

以与尼采思想产生共鸣的基础。

尼采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的面前站着的是奋起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因此，他把人民群众侮蔑为“贱氓”，竭力鼓吹超人哲学。鲁迅站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面前站着的是受压迫受奴役的同胞，由于列宁所说的小生产者那种极端性和片面性，他过分估计中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不觉悟（其实，远的不说，就近代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也可以证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并非如此麻木、如此不觉悟），所以他也借取了尼采超人主张在方法上的极端性（不是极端主张的现实内容），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尼采是站在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极端唯我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否定人类的物质文明。而鲁迅由于片面看待民众的不觉悟对国家现状的影响，片面地看待西方物质文明渗入后带来的灾难，更片面地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不懂得国民精神的改变有赖于整个经济基础变革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借取了尼采强调主观意志的极端性，提出“掇物质而张灵明”。

尼采的作品用抽象的、奇丽的语言来表达，议论夹着呼唤、指责、咒骂、嘲笑，跳跃式的论断，深奥难解的语句，缺乏逻辑的推理，这些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思想形式，的确令当时的鲁迅心醉。有人说，早期鲁迅受尼采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只是因为因词害义，是一种误解，这并未点中实质。其实，当时鲁迅思想形式上方法上与尼采是共鸣的。

当然，思想的外壳与思想的内核并不是绝对可分的，而且，思想的外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由思想的内核所决定。还以上面提到的早期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为例，虽然主要是由于形式上的共鸣而采取这种颇具尼采“超人”色彩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与早期鲁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不正确认识没有关系。同样，鲁迅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得来的也不全是思想外壳，也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内核的成份。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雪莱、拜伦、密兹凯维之等人的爱国主义。毕竟，它们并不构成早期鲁迅思想的主要方面。早期鲁迅一方面坚决反对封建主义，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那一套毫不信任，乃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农民阶级的情绪，这绝不是从那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中所能搬到的。

三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以满族封建贵族为主体的清朝政府已完全堕落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它不仅是国内民族牢狱的制造者和封建压迫者，而且首先是帝国主义所扶植利用的傀儡政权和侵略工具。因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纠合在一起的，有时甚至阶级矛盾被民族矛盾所掩盖，很多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民族矛盾的推动下走向革命的，正如鲁迅先生后来总结说：“……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清王朝对帝国主义的入侵的屈服和帮从不但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这就使不仅是资

产阶级，而且连中华民族各阶层（包括左翼激进的改良派和严复）都强烈反抗满清封建皇朝。“中国人之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种阶级斗争的特殊性给中国近代思想史打上了第三个特征：它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就连反对封建主义，其旗号也是反满复汉。反帝反满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旗帜。

早期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核心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鲁迅在仙台医专看幻灯的事，它使鲁迅弃医从文，开始了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生涯，而诱因则是民族主义情绪：那些愚昧国民，竟充当外国侵略者屠杀自己同胞的看客。

于是，与民族性的密切相连的国民性问题，构成早期鲁迅思想的主要方面。鲁迅首次提出国民性问题，是在《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中有两次提到了国民性问题。第一次是叙述英国诗人拜伦在一八二三年援助希腊独立时，受到种种人事上的牵制，遭到挫折，于是“裴伦（拜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第二次是评论俄国诗人普希金逐渐脱离拜伦的影响，综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说由于他们“国民性之不同”。所谓“国民性”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是从两民族相比较中提出的，也就是民族性。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写的《随感录三十八》中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可见，民族主义——改变近代中华民族性格上的劣根，使之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鲁迅国民性思想产生的基础。而这种民族主义与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内部各民族间的平等、和睦、统一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就是爱国主义。

鲁迅早期的著作，不论是宣传科学的，抑或是介绍西方进步文艺的，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鲁迅在一九〇三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看似介绍中国地质情况，进行科学启蒙工作，实际上是借谈地质，歌颂“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鼓吹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文中，鲁迅痛斥了满清反动统治者卖国投降，“引盗入室，助之折榘挠栋，以速大厦之倾”，严正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鲁迅自己也说，他写《中国地质略论》，就是为了使豪杰之士以至人民“恨恨以思，奋袂而起”。

鲁迅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因而，更具中国特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孙中山认为，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这“天然力”有五种，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他以此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认为要使民族进步，必须以西方民主主义和物质文明改造旧民族的要素，立足点明显地更倾向于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它较之从孔夫子到王夫之的封建主义的“夷夏大防”的理论要先进得多。鲁迅与孙中山的出发点没有不同，但他坚决反对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鲁迅甚至一度认为破迷信、毁偶像、禁赛会和嘲弄神话的作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似乎与鲁迅在撰写《说钜》等宣扬科学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朴素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精神相佐，其实，正体现了鲁迅所代表的自耕农的民族主

义。在反对帝国主义这点上，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相通的，但它们各自侧重面不同：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摧毁了宗法式封建田园生活，又冲击了中国手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前者意味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有了可乘之机，后者又意味着他们注定要受压制；对中国自耕农来说，则只意味着他们数千年来所习惯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失落。这种状况构成在民族主义上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思想差异。孙中山更强调以西方文明来促进中国民族进步；鲁迅所代表的农民则更强调“非信无以立”，强调要恢复民族固有的精神文明传统，以抵御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民族精神的沦丧，主要从精神文化方面入手改造民族，图存保种。至于这两种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具体差异中，存在的思想水平上的差异，并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明，非本文所力及。但起码可以说，这种同异的比较是必要的，它正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关系。

（上接第126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水平，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则是企业活力的源泉，共产主义道德是团结职工同心同德办好企业的精神法宝；改革者应该具有以下的共产主义道德素质，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时代的觉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气质；虚心好学，精明果断的品格；知人任贤，谦虚谨慎的风格；顾全大局，以社会主义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作风等等。

有些同志还认为，在改革中，在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的同时，还应提倡为社会公共利益而自觉自愿的、不计报酬、不计定额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种劳动态度，虽然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广泛而普遍地实行，但它毕竟是在一部分先进分子中产生的新的精神和劳动态度，对这种新生事物应该赞扬、支持，而不能挖苦、打击。

三、关于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同志们认为，我国伦理学工作者的队伍已初步形成，颇具规模。伦理学的体系结构也有一定的特色，但总的来说，尚未从苏联过去的模式下摆脱出来。有人认为，伦理学的教学，体系僵化，内容陈旧，方法死板，缺乏活力，对现实生活的道德问题没有很好回答，理论脱离实际比较严重。伦理学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精华和糟粕没能很好区别开来；忽略新技术革命对伦理学挑战的意义；没有很好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而且伦理学界缺乏交往，信息不灵，以至重复劳动多，创新少，互相取长补短少。

许多同志认为，伦理学研究要贯彻“三个面向”，要把对现实的研究放在首位，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方案，要在体系上改革。有的同志认为，可以由生活的不同层次为中心来构造体系，加强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把史论结合起来。要大力加强对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大力加强伦理学科的基本建设。

有的同志认为，理论体系受研究方法制约，要创新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伦理学研究结构是一个封闭式的平面单向型负反馈系统；在思维模式上，它是收敛式的思维；在研究方式上，它是单体的；在研究体系结构上，它是封闭的负反馈超稳定结构；在研究的社会功能上，它是受动的。伦理学研究必须首先从方法上发生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迅速形成一个开放的全方位型正反馈研究结构，把中国伦理学研究置于整个世界背景下，立于世界研究之林。

（陈思迪）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

李标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茅盾先后五次到香港：第一次（1937年12月底——1938年元月初），茅盾从上海取道香港，经广州到长沙。第二次（1938年2月底——1938年12月29日）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第三次（1941年3月中下旬——1942年1月9日）茅盾在香港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炮火。第四次（1946年4月13日——5月下旬），茅盾在香港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大声疾呼。第五次（1948年1月——1948年12月）茅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在香港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是他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1938年2月下旬，茅盾一家来到广州，他准备在广州定居，创办《文艺阵地》。正在香港筹备《立报》复刊工作的萨空了得知，便盛情邀请他去编副刊《言林》。这样，茅盾于二月底合家搬到香港九龙湾仔轩尼诗道，每月定期到广州几次，为《文艺阵地》的出版奔忙。

《文艺阵地》于1938年4月16日创刊。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抗战文艺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足以引起震动的文学作品。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这篇小说立即引起文艺界的注视，有的给茅盾写信，有的发表文章，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茅盾先后写了《论加强批评工作》、《八月的感想》、《暴露与讽刺》等三篇文章，阐明自己对《华威先生》这样的暴露与讽刺式作品的意见。《文艺阵地》第三期发表的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也是公认的优秀作品。其他如于逢的《溃退》、丘东平的《第七连》等也都是被充分肯定的抗战文艺佳作。在《文艺阵地》的编辑过程中，茅盾以他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组织了当时最广大的作家队伍，象陆定一、叶圣陶、肖红、刘白羽、周而复、草明、丰子恺、老舍、田间、沙汀、骆宾基、陈白尘、邹荻帆、司马文森、欧阳山、夏衍、杨朔、袁水拍、景宋、郑振铎、臧克家、杜埃、何其芳等都陆续在《文艺阵地》上发表过作品。作品的题材广泛，形式风格多样，呈现出绰约多姿的活跃景象。

茅盾很重视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当茅盾发现了李南桌这颗评论新星后，就大力扶

植他，连续发表他的论文。杜埃、黄绳等也是活跃在《文艺阵地》上的评论者。尤其是茅盾本人，几乎每期都写文艺短论和书评，有时一期就达五六篇之多。他有意识地组织了很多问题的讨论，如深入生活、反映时代、创造典型、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暴露与讽刺、通俗与提高、报告文学等等问题都有论及。他自己在这些方面也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茅盾认真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他不仅发表了张天翼、姚雪垠等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对无名的文学青年也热心地给予指点。他常亲自为作者修改文稿，写退稿信，鼓励作者不要灰心，以及如何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深深感动了许多青年。

《文艺阵地》以它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它象一股清新的风，给沉寂的香港带来生气，它带来了内地抗战文学作品，包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内地许多作家的名字和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使港澳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新文学和内地的抗战。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对茅盾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派从事文化联络工作的杜埃去拜访茅盾，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并且告诉茅盾，以后各期都定期转给他。茅盾如获至宝，他捧着报纸说：“有了它，就有了指路明灯。”此后，茅盾常根据《新华日报》评论的精神写成文艺性评论，还把解放区的文艺动态编进杂志。

在主编《文艺阵地》的同时，茅盾还主编《立报》副刊《言林》。为了适应香港的特殊环境，他注意使刊物形式活泼，而又富有教育意义。

当时香港各报副刊，不少是以武侠、神怪、色情的东西招徕读者。《言林》既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要能吸引读者；既不做群众的尾巴，又不能显得过于严肃，为此，茅盾绞尽了脑汁。萨空了鼓励茅盾写通俗形式的长篇，在副刊连载。茅盾接受了建议，经过短时间的构思，就开始写起来，一边写一边发表。小说着重反映上海“八一三”事变从发生到终结的历史进程。作品中再现了“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上海各阶层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抗战的情景，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狂轰滥炸、屠杀无辜的疯狂兽性，暴露了阻挠抗日的消极因素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这是茅盾反映抗日战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长篇来尝试艺术形式通俗化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开始在《言林》连载时，茅盾想用《何去何从》作标题。茅盾认为抗战爆发后，每个中国人都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有的朋友觉得这个题目带有刺激性，恐怕惹起麻烦，于是小说发表时改题《你往哪里跑》。一九四五年出版单行本时才又改题为《第一阶段的故事》。

茅盾在香港共编了《文艺阵地》十八期，为时十个月。198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香港孤立了，《文艺阵地》销路不畅，《立报》在香港众多的庸俗小报包围下，也站不住脚，再加上香港物价昂贵，以卖文为生的茅盾，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开销。此时他收到了在新疆的友人杜重远的来信，邀他到新疆去。茅盾征得了廖承志的同意，把《文艺阵地》的编务委托给楼适夷，于1988年12月20日，离开香港经海防去了新疆。

1941年3月下旬，茅盾从重庆转道桂林到达阔别两年多的香港。这时香港集中了一批文化人，空气与前大不相同了。那时“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也到了香港，茅盾就与邹韬奋等人以“救国会”留港代表名义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主张和态度》，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大力抨击国民党顽固派。

茅盾住在半山坚尼地道的一座两层的花园小洋房的底层。他刚安顿下来，正在筹备《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就来找他约稿。《华商报》辟有副刊《灯塔》。于是，茅盾将两年来从香港到新疆，又从新疆到延安，再从延安沿后方公路到重庆，又回到香港的颠沛流离，所见所闻，尤其是战时大后方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战争给人们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写成一组散文，在《灯塔》连载，总题目是“如是我见我闻”。在该文的《弁言》中，茅盾以愤激的感情和犀利的文笔讽刺了国民党封锁言论的丑行，然后说：“这不是游记”，“然而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兽，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做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这组散文揭示出战乱年代大后方特殊的发财手段：走私、囤积和运输业，这些经济现象都是战时大后方特殊的产物。他还反映出追逐利润的商人、投机家的活动给大后方城镇带来了畸形繁荣的景象，不仅昔日荒凉的内陆城市兰州，在战时出现了繁荣，就连陕西一个小县镇宝鸡，也由于战争“崭露头角”。与大发国难财的投机者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相对照，茅盾满含同情地描绘出战争给人民经济生活带来的苦难。

茅盾在《华商报》上连载《如是我见我闻》时，正在筹办《大众生活》的邹韬奋来找茅盾，拉他参加《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于是茅盾成了《大众生活》的编委。为了打开杂志的销路，需要有一部长篇连载小说，必须赶在刊物创刊号上登出来，因此一个星期内要交第一批稿。编委们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茅盾。

茅盾刚刚经历了皖南事变的险恶斗争，到香港后又听到不少有关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迫害进步文化人的故事。这使他想起在重庆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在通往延安的路上布满军警宪特，捕捉到延安去的青年，然后把他们送进“训练班”，对青年进行反共教育，并教给他们间谍术，再把他们派遣到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特别是一些天真烂漫的少女，落到特务手中，先被糟蹋了，再叫她们去搞美人计。茅盾决定以此为题材写这部小说。这就是《腐蚀》。小说通过赵惠明这个人物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揭示出特务组织中的一些青年如何受骗、被迫的痛苦。为了分化、瓦解这些胁从者，茅盾应当时一些人的建议，给赵惠明以自新之路，他依据重庆的一个沦为特务的少女找到重庆《新华日报》，希望共产党对她伸出援助的手，把她从苦海中挽救出来的真事，演化出赵惠明冒着生命危险从魔窟里救出一个和她同样命运的女青年的自新结局。1941年10月，上海华夏书店出版了《腐蚀》单行本。这部作品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曾发生广泛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使很多没有阅历的青年男女懂得了特务惨无人道的内幕，不再上这伙牛头马面的当。

与此同时，茅盾还陆续给《华商报》写了不少杂文。这些杂文，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和封锁言论、文网森严的反动文化政策，如《释‘谣’》、《谈所谓‘暴露’》、《谈提倡学术之类》、《事实是最无情的》、《古与今》等；还有一些纪念性文字，如《纪念高尔基》、《悼许地山先生》、《为祖国珍重》、《一段回忆》等；也写了一些文艺评论，如《为了〈雾重庆〉的演出》、《〈希特勒的杰作〉上演感言》等。其间，茅盾还办了一个叫《笔谈》的刊物，1941年9月1日创刊，茅盾是主编，曹克安任社长兼督印人。《笔谈》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半月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如游记、人物志、遗闻轶事、杂感随笔、读书札记、诗歌、小说、戏曲、报告、时论等。《笔谈》尤其突出杂文，以增强战斗性。通过杂文、历史人物杂谈等形式，直接间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态与罪恶。刊物创刊后，立即受到读者欢迎，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创刊号就再版了一次。

《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到1941年12月1日终刊，共出七期，茅盾共发表了六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散文。包括纪念文，如《国粹与扶箕的迷信》、《理想的人性》等；回忆性散文，如总题《客座杂忆》的十三篇；熔写景抒情记叙议论为一炉的散文，如《大地山河》、《开荒》等。这些散文，内容极丰富，形式也绰约多姿。

第二类是收入“杂俎”类的杂文计二十八篇。这些短小精悍的杂文，新颖活泼，别具一格。有对国际法西斯进行揭露、讽刺、抨击的，如《寓言式之预言》、《纳粹德国的宗教如此》、《纳粹人员之恶魔的生活》、《希特勒的“文化政策”》等；有借历史故事、掌故影射现实，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反动派媚日投降反共政策的，如《谈一件历史公案》、《衣冠之盗》、《吏之权威》、《武王侯殿》等；有综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动态的，如《军犬团》、《战时英国之科学家》、《苏联的文艺阵线》等。

第三类是书评，计十八篇。这些书评，涉及小说、剧本、科学故事、报告文学集以及政治、经济、历史著作，现实针对性强而且善于抓住主要特点进行评介，不面面俱到，不节外生枝。

1941年11月，史沫特莱经香港回美国，她对茅盾说，日本即将进攻香港，香港守不住了，建议他到新加坡去。茅盾对她说：“我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是呀，茅盾始终没有忘记他作为文艺战士的职责！他从重庆到香港，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到香港来开辟第二战场，即使环境再艰险，也要坚持战斗。几个月来，他的惊人的工作，就是战斗的实绩。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不久，香港沦陷。茅盾经历了香港战乱之苦，在党的安排下，于1942年1月9日秘密离开香港，回到内地。

三

1946年春，蒋介石破坏和平协议，积极准备内战，重庆的政治空气也一天天恶化。茅盾受党的指示，于3月16日离开重庆取道广州、香港到上海定居。沿途在广州，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茅盾夫妇这次抵港是1946年4月18日傍晚。

15日下午，文协港粤分会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朋友欢宴茅盾夫妇。会上，茅盾讲了话，他开头便说：“几个月来中国的政治现象有如病人‘打摆子’，一阵热，一阵冷，一个潮起，一个潮落。目前，又算是到了高热。”茅盾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的民主运动每经一次打击，却更向前跃进一步。

茅盾还揭露了反动派文化上反民主的作法。他说：“第一，是以武功对付文化，就是以非文化的手段对付文化工作，是一种不讲礼法的办法。比方撕书撕报，打架捣乱，开枪，丢石头之类。”“第二，是以文化对文化，比方你有一个团体，他也来一个团体，你办一个刊物，他也来一个刊物，并且也装做谈民主，跟你来个‘双包案’。”“第三，以统一战线对付统一战线，对于中间的，无所谓的人，他们是会拼命拉拢的。”茅盾幽默地说：“象我，他们也来做过一番统一战线的。他们没有人写得出文章，但跑腿的人却有的是，此外，他们还有钱。”

茅盾说号召：“文化界应该象抗战初期那样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坚固而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他特别强调：“这样做，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注意克服‘左’倾和右倾的毛病。例如：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口号提得太高，无原则妥协等等，都是要不得的。”

茅盾对党的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刻阐述，使香港文化界有了行动的方向。

5月4日，广州反动当局组织了反苏反共反革命的大游行，砸烂《华商报》的广州门市部和兄弟图书公司，还封闭了所有民主刊物。消息传到香港，茅盾写了《关于广州‘五四’暴行》一文，刊登在5月10日《华商报》副刊的《我们以更强大的民主力量抗击暴行》专栏中，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提出严正地抗议。

茅盾在香港，每天都忙着到团体和学校讲演。他为华侨工商学院的师生讲《文艺修养》，给中学生讲《中学生怎样学习文艺》。茅盾在香港逗留了十三天。离开香港前，他到澳门去了一趟。其间，他会见了菲律宾马尼拉《侨商公报》记者。他应记者要求题词：“人民受炮火的洗礼，就不愿再受奴役，全世界涌起了民族民主的浪潮。”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以及他对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四

1947年7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1948年初，茅盾在党的安排下，偕德沚夫人又一次转移香港。郭沫若、夏衍等文化人也先后到香港。

快要诞生的新中国正经受着剧烈的阵痛，这时候的茅盾精神更饱满灼热，斗志更昂

扬。他比以前更忙了，经常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勤奋写作，还为不少作者的作品写了序。

茅盾担任了新创刊的《小说》月刊的编委和《文汇报·文艺周刊》主编。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茅盾萌发了把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的八年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务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的想法。这将是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工程是浩大的。茅盾原准备写五部。但由于条件所限，仅完成了一部，就是《锻炼》。这部小说边写边在《文汇报》发表，从1948年9月9日至12月29日，共连载二十五章。《锻炼》比起《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社会面貌。作品构筑宏伟，气势磅礴，文笔飘洒秀逸，代表了茅盾创作上的新进展。

茅盾还先后写了《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等短篇小说。茅盾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着重反映解放战争时期蒋家王朝灭亡的历史命运，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他用自己的创作，欣喜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他提醒人们：新中国诞生后，切不可放松对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进行斗争！

在港期间，茅盾还写了《序〈军中归讯〉》、《〈在吕宋平原〉序》、《新社会的新人物》、《赞颂〈白毛女〉》、《夜店》等书剧评论，以及《悼佩弦先生》、《剪掉精神上的辫子》、《人民世纪始于卅一年前的今天》、《岁末杂感》、《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等散文、杂感。还发表了《杂谈“方言文学”》、《再谈“方言文学”》、《关于创作的几个具体问题》、《反帝、反封建、大众化》、《论鲁迅的小说》等文艺论文。完成了《脱险杂记》的写作，把东江游击队护送文化人脱险的经历较详细地写了出来。

1948年底，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茅盾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一起，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乘船赴大连，旋至沈阳，再转北京参加筹备政协会议。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战士，茅盾在香港所经历的光辉的革命斗争业绩，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吴大泽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佛教一方面否定语言，认为语言的表现力是有限的，不完整的，不足以表现彼岸性的超现实性的精神。“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五灯会元》卷十二），故主张不立文字；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佛理只有用语言才能表达。“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僧肇《肇论·般若无知论》），“至理无言，假文字以明其旨”（《禅宗永嘉集》《优毕叉颂第六》）。他们认为真正的“不立文字”是不可能的，如《坛经》说：“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否定文字本身也要运用文字。所以佛教的“不立文字”不可皮相地理解为完全抛弃语言文字，“不立文字者，经云不着文字，不离文字，非无文字，能如是修，不见修相”（《宋高僧传》卷十三赞宁语）。“无言”也决非不用语言，华严宗的杜顺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说：“非是默而不言，但以语即如，故不异于法，是以无言”。“惟非语外，言即无言，理出言端，不说即说”（《华严五教止观》）。可见佛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的精神是主张用内心的直觉暗示联想感受来解悟禅理，用语言而没有语障，诉诸语言文字又使人不拘泥不执着于语言文字的表面含义，而能够参透语言之外的真谛，这种圆融无碍的境界，就叫“无言”。沧浪的“不落言筌”也正是借用佛教对语言文字不即不离的态度来探讨诗歌语言的艺术特性的。

“言筌”一语来源于《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筌”即把语言文字比为“筌蹄”，在这“言筌”

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最令人难解的不是“言筌”，而是“不落”二字。我以为“不落”二字是有深刻的美学内涵的，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他把“言、象、意”作为不同的递进的层次。只有对前一层次的否定，才能进而得到后一层次。唐代邢昺的注释也很精辟，他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弃执而后得之。”其中的哲学意味是值得深思的。沧浪的“不落言筌”之“不落”二字，应作“弃执而后得之”解。从美学上考察，“不落言筌”、“忘言”，就是在观念中扬弃和否定语言文字而超越到对文字语言之外的意象的把握。只有“弃执”语言才能“得之”意象，故曰“得象在忘言”，这种否定已含有肯定的因素。黑格尔《小逻辑·存在论》说：“无限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有限事物的否定。”沧浪所向往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正是通过对语言有限性的否定（言有尽），使主体的想象力和知解力达到高度和谐和自由，获得无限的境界（意无穷）。

诗歌创作是诗人审体验的美“物化”，诗人美感经验要由一定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来承担，但诗人的目的并不在语言文字，而在通过静止凝固的文字形式去传达活生生的意象，因此语言只是中介。语言是带着普遍性和概括性的，正如列宁所说：“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任何词（言语）都已在概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诗歌语言的艺术特性，就在于克服语言自身的局限。席勒对诗歌的语言特性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果要使一种语言的表现成为自由的，诗人就必须凭他艺术的伟大去克服语言通向一般的倾向，凭形式（即材料的运用）去征服材料（即文字以及构词法和造句法）。语言的性质（即通向一般的倾向）必须完全沉没到给与它的那种形式里，躯体必须消融在观念（意象）里，符号必须消融在它所标志的对象里，现实必须消融在形象显现里。被表现的对象，必须从表现的媒介中自由地胜利地显现出来，不管语言的一切桎梏，仍然以它的全部的真实性活动性亲切性站在想象力面前，总而言之，诗的表现的美就在于自然（本性）在语言桎梏中自由的自动”（《论美书简》）。这段话恰好可以用来从理论上解释不落言筌的含义。诗人要征服语言的局限，要摆脱“语言桎梏”（即“言筌”），就要使语言超越到意象，使语言在观念中转化为一种观照的对象，这就要求语言文字与感性经验相联系来唤起自由的生动的表象与感情，如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致也”（《诗式》）元遗山说“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耳”（《遗山集》卷三十七《陶然集诗序》）贺贻孙说：“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诗筏》）刘熙载说：“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者，‘有’者但见性情气骨，‘无’者，不见语言文字”（《诗概》）。“不知有文字”、“无墨痕”、“不见语言文字”，并非不用语言文字，而是语言文字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已超越其作为符号的物理属性而转化为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意象。用席勒的话就是语言消融在意象里，符号消融在对象里，用沧浪的话就是“不落言筌”。

古代历法的置闰

张闻玉

世界各国现今通用的阳历，或称公历，是以一个回归年长度为依据的历法。一回归年是365日5小时48分46秒，相当于365.2422日。阳历以365日为一年，每年所余0.2422日，累积四年，大约一天。所以阳历每四年增加一天，加在二月末，得366日，这就是阳历的闰年。四年加一天又比回归年实际长度多了44分56秒，积满128年左右，就又多算一天，相当于四百年中约多算三天。因此，阳历置闰规定，除公元年数可以4整除的算闰年外，公元世纪的整数，须用400来整除的才算闰年。这就巧妙地在四百年中减去了三天。这就是阳历置闰的全部内容。

我国的农历，又称阴历，主要依据朔望月（月亮绕地球周期），同时兼顾回归年。实质上是一种阴阳合历。朔望月（从朔到朔或从望到望）周期是29.5306日。农历一年十二个月，一般六大六小，只有354日，比一个回归年少11.2422日。不到三年必须加一月，才能使朔望月与回归年相适应。这是用置闰办法来调整回归年与朔望月，使月份与季节大体吻合。中国古代历法的频繁改革，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调配回归年与朔望月的长度，使之相等。简单说，就是调整闰周，确定多少年置一闰月。《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大意是说，置闰的目的是定季节，定季节的目的是干农活。君王的职责之一就是公告朔闰。如果违背这种制度，怎么治理百姓？

由于置闰是人为的规定，历代对闰月的安排也就很不相同。已发现的殷墟卜辞中，武丁卜辞多有“十三月”的记载，祖庚、祖甲时代又有“多八月”“冬八月”“冬六月”“冬五月”和“冬十三月”的刻辞。“多”即“闰”，“冬”即“终”也就是“后”的意思。所以“多六月”“冬六月”“冬八月”即“后六月”“后八月”，也是“闰六月”“闰八月”的意思，“冬十三月”即“闰十三月”。卜辞里面，还有“十四月”的记载，古历称之为“再闰”，就是一年置两个闰月。殷周金文里面，“十四月”刻辞并不鲜见。周《金鹜公鞮鼎》：“佳十又四月，既生霸壬午”，就是例子。到春秋时代，这种一年再置闰的情况就没有了。

闰十三月，就是年终置闰。闰六月，闰八月，算是年中置闰。这说明古历置闰并无规律，这与回归年和朔望月的调配没有找到规律有关。在年、月、日的调配无“法”可依，没有找到规律之前，都是观象授时的时代。观象，主要是观天象，观察日月星辰的运动变化规律。比如昏旦中星的变化和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以此作为置闰的依据。因为是肉眼观测，不可能精确，只能随时观测随时置闰。所以古历多有失闰的记载。多置一闰，子正就成了丑正，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了子正。据《春秋》经传考证，到春秋中期就大致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方法。

为什么十九年要置七闰呢？因为春秋中期之后，根据圭表测影的方法已初步掌握了一回归年的长度为 $365\frac{1}{4}$ 日。有了这个数据，年、月、日的调配就有了可能。

四分历由 $365\frac{1}{4}$ 日推出朔望月长度（朔策）为 $29\frac{499}{940}$ 日。

十九年中要有235个朔望月才能与十九个回归年日数大体相等，即

$$19 \times 365\frac{1}{4} \approx 235 \times 29\frac{499}{940}$$

而一年十二个月的话， $19 \times 12 = 228$ （月），必须加七个闰月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十九年七闰的来源。

东汉许慎《说文》云：“闰，余分之月，五岁再闰也。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闰月王居门中终月也。”此处“五岁再闰”就是五个回归年中要置两个闰年。“三年一闰，五年再闰”这是较古老的方法。

$$365.25 \times 5 < 354 \times 5 + 60$$

$$1826.25 < 1830$$

五年之中竟有近4天的差误，根本无法持久使用。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掌握以后，置闰就有“法”可依了。四分历规定十九年为一章，这个“章”法，就是反映置闰规律的。

古法有“归余于终”之说，是将闰月放在年终，方便易行。春秋战国时代大多如此。齐鲁建子，闰在亥月后。晋楚建寅，闰在丑月后。秦历以十月为岁首，闰在岁末，称“后九月”。汉初一仍秦法，直至汉武帝太初改历，才改闰在岁末为无中气置闰。这个无中气置闰原则就一直行用到现在，只不过当今对中气的计算更细致更精确罢了。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闰月设置在没有中气的月份。

《礼记·月令》注疏者说：“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数者，谓十二月中气一周，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谓之一岁。朔数者，谓十二月之朔一周，总三百五十四日，谓之为年。”这里把岁与年区分得很清楚：岁是二十四节气（其中十二中气）组成的回归年，是太阳历；年是十二个朔望月组成的太阴年，是太阴历。中国农历是阴阳历系统，必须反映二十四节气和朔望月的配合关系。

根据张汝舟先生的研究，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战国初期创制，行用于周考王十四年（公元前427年）的殷历（称“天正甲寅元”的四分历）。《史记·历术甲子篇》就是这一部历法的文字记录，《汉书·次度》是它的天象依据。《历术甲子篇》所列七十六年前大余，就是年前十一月（子月）朔日干支序数，前小余就是十一月合朔的分数；后大余是冬至日干支序数，后小余是冬至时分数。不难看出，前大余小余是记录朔望月朔日的，是太阴历系统，后大余小余是记录冬至（中气）的，反映回归年长度，属太阳历系统。两相调配，《历术甲子篇》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阴阳合历的历法宝典。

汉武帝太初改历，一改“归余于终”的古法，行无中气置闰。所谓中气，是指从冬至开始的二十四节气中逢单数的节气。依照《汉书·次度》记载，这十二节气正处于相应宫次的中点（冬至为星纪次中点，大寒为玄枵次中点，惊蛰——汉以后称雨水，是娵訾次中点……），故称中气。其它十二节气，则在各次的初始（星纪之初为大雪，玄枵之初为小雪，娵訾之初为立春……），如竹之结节，故仍称节气。

因为一个朔望月（29.5306日）比两个中气之间的时间（ $\frac{365.25}{12}$ 日）距离要短约一天，如果从历法计算的起点算，过三十二个月之后这个差数积就会超过一个月，就会出现一个没有中气的月份，本应在这月的中气推移到下个月去了。若不置闰，后面的中气都要迟出一个月。长期下去，各个月份和天象、物象、气象的相对关系就要错乱。三次不置闰，春季就会出现冰天雪地景象，深秋还是烈日炎炎，历法就失去指导农业生产的意义了。

中国最早的历法——殷历，即《历术甲子篇》的无中气置闰与今天农历的无中气置闰大不相同。殷历用平朔平气，春夏秋冬一年十二月均可置闰。从清代时宪历起用定气注历，至今未变，闰月多在夏至前后几个月，冬至前后（秋分到次年春分之间）则无闰月。这是因为春分到秋分间太阳视运动要经一百八十六天，而从秋分到春分间却只需要一百七十九天。日子短，则节气间相距的日子就短，所以不宜设置闰月。

我们知道，四分历的岁实是 $365\frac{1}{4}$ 日，而平年六大六小，只用去了354日，每年尚余 $11\frac{1}{4}$ 日。由于历元是取冬至日合朔， $11\frac{1}{4}$ 必是冬至（气）之余，也称“气余”。按每年下余 $11\frac{1}{4}$ 日计算，两年则余 $22\frac{1}{2}$ ，经三年则余 $33\frac{3}{4}$ 日。就是说 $33\frac{3}{4}$ 日之内无中气。所以第三个年头上就必须置闰了。这就是四分历安排置闰的依据。

气余 $11\frac{1}{4}$ 日每年递加，并无困难。由于第三年置闰，又有连大月，全年达384日，比平年（354日）多30日。所以

$$354 + 33\frac{3}{4} - 384 = 3\frac{3}{4} \text{ (日)}$$

3 $\frac{1}{4}$ 日是第三年实际气余。

第四年再加11 $\frac{1}{4}$ 日，得15日。由于第四年七大五小，为355日，比平年多1日。所以

$$15 - 1 \text{ 或 } 354 + 15 - 355 = 14 \text{ (日)}$$

14日便是第四年气余。

根据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将一部七十六年各年气余推算出来，也就可根据此考虑闰在某月了。

前面说过，平年六大六小，每年气余11 $\frac{1}{4}$ 日。若将它用一年十二个月平分，则每月气余0.9375日。

这样以上年气余为基数，从该年子月开始逐月递加0.9375日，到某月超过30日或29日（小月），便知某月之后是置闰之月。

如第三年当闰，以上年气余22 $\frac{2}{4}$ 日为基数，从子月起逐月递加0.9375日，至第八个月便超过30日了。所以四分历是在第八个月之后置一闰月。夏历用真正，从子月算起至第八个月，则闰六月。又如第十九年当闰。便以上年气余19 $\frac{1}{2}$ 日为基数，从子月起逐月递加0.9375至第十二个月超过了30日，便在此月之后置闰。

《历术甲子篇》是通过后大余，后小余反映二十四节气的。后大余是冬至的干支代号，后小余是冬至时的分数。这个小余的分母是32（分），与前小余分数的分母是940（分）不同。为什么要化 $\frac{1}{4}$ 为

$\frac{8}{32}$ ？这是便于推算一年二十四节气。因为四分历是平气，冬至一定，其他节气便可逐一推出。

$$365\frac{1}{4} \div 24 = 15 \dots\dots \text{余} 5\frac{1}{4} \text{ (日)}$$

$$5\frac{1}{4} = 5\frac{8}{32} = \frac{168}{32}$$

$$168 \div 24 = 7 \text{ (分)}$$

即两个节气相距15日7分，从冬至日算起，顺次累加，可以算出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干支和气余。

《历术甲子篇》只列出太初七十六年每年冬至干支及余分，我们可以据此排出七十六年各月的朔、气干支及余分。两个中气相距30日14分，置闰之“法”就反映在朔（前大余）与中气（后大余）的关系上。

《历术甲子篇》前四年大余、小余原文如下：

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无大余 无小余

无大余 无小余

端蒙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四 小余三百四十八

大余五 小余八

游兆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八 小余六百九十六

大余十 小余十六

强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余十二 小余六百三

大余十五 小余二十四

“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等是干支代称，用以表示历法太初之干支。列为一表，就是：

太初元年（甲寅） 前大余0（无） 前小余0（无）

后大余0（无） 后小余0（无）

太初二年(乙卯)	前大余五十四 后大余五	前小余348 后小余8
太初三年(丙辰)	前大余四十八 后大余十	前小余696 后小余16
太初四年(丁巳)	前大余十二 后大余十五	前小余603 后小余24
太初五年(戊午)	前大余七 后大余二十一	前小余11 后小余0

(下略)

为区别大余、小余，大余用一、二、三、四数码表示，小余用1、2、3、4数码表示。

朔的大小余推演法是：根据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逐月累加排出每月前大余(朔干支)。

由于朔策数据是 $29\frac{499}{940}$ ，逢小月小余加499分，逢大月小余减441分，中气的大小余推演从冬至起每月累加30日14分。

由于《历术甲子篇》已列出每年年前十一月(子月)朔日及冬至的大小余，便可以从每年的十一月(子月)作起算点推演每月朔日与中气，我们以太初三年作推演示范。

月份	朔干支	合朔分数	中气干支	分数
(三年)子月大	四十八	696	冬至十	16(历术甲子载)
丑月小	十八	255	大寒四十	30
寅月大	四十七	754	惊蛰十一	12(44-32)
卯月小	十七	313	春分四十一	26
辰月大	四十六	812	清明十二	8(40-32)
巳月小	十六	371	小满四十二	22
午月大	四十五	870	夏至十四	4(36-32)
未月小	十五	429	大暑四十三	18
闰月大	四十四	928	(无中气)	
申月大	十四	487	处暑十四	0(32-32)
酉月小	四十四	46	秋分四十四	14
戌月大	十三	545	霜降十四	28
亥月小	四十三	104	大雪四十五	10(42-32)
(四年)子月大	十二	603	冬至十五	24(历术甲子载)

《历术甲子篇》的后大余是冬至日干支，二十四节气由此推演还好理解，太初三年置闰也很明确，只是从何知道必在六月(未月)之后置闰呢?

这个闰六月是前大余四十四(戊申朔)与处暑十四(戊寅处暑)的关系确定下来的，戊申朔，处暑戊寅必在下月，则此月无中气，依无中气之月置闰的原则，闰在六月后就可以肯定了。

所以说，《历术甲子篇》通篇的大余，小余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二十四节气可由此推演，无中气置闰规则也包含其中。

无中气置闰还有另一种推算方法。一岁 $365\frac{1}{4}$ ，以12除，得 $30\frac{21}{48}$ 日。即两中气间隔 $30\frac{21}{48}$ 日，上月中气加30日21分，得本月中气。到中气日期超过29或30，小月亦应置闰，中气就在下月初了。“殷历朔闰中气表”就是这样编制的。它的特点是，中气日期不用干支序数而用一月内日的序数。这就与余不发生关系而自成系统了。(列表如次)

这就是魏晋以前，中国古代历法置闰的全部内容。

殷历朔闰中气表

纪年	月	朔日干支及余分	中气日期	中气
太 初 元 年	十一月(子)小	○ 0	初一 0	冬至
	十二月(丑)大	二九 499	初二 21	大寒
	正月(寅)小	五九 58	初二 42	惊蛰
	二月(卯)大	二八 557	初四 15	春分
	三月(辰)小	五八 116	初四 36	清明
	四月(巳)大	二七 615	初六 9	小满
	五月(午)小	五七 174	初六 30	夏至
	六月(未)大	二六 673	初八 3	大暑
	七月(申)小	五六 232	初八 24	处暑
	八月(酉)大	二五 731	初九 45	秋分
	九月(戌)小	五五 290	初十 18	霜降
	十月(亥)大	二四 789	十一 39	小雪

纪年	月	朔日干支及余分	中气日期	中气
太 初 二 年	十一月(子)小	五四 348	十二 12	冬至
	十二月(丑)大	二三 847	十三 33	大寒
	正月(寅)小	五三 406	十四 6	惊蛰
	二月(卯)大	二二 905	十五 27	春分
	三月(辰)大	五二 464	十六 0	清明
	四月(巳)小	二二 23	十六 21	小满
	五月(午)大	五一 522	十七 42	夏至
	六月(未)小	二一 81	十八 15	大暑
	七月(申)大	五〇 580	十九 36	处暑
	八月(酉)小	二〇 139	二十 9	秋分
	九月(戌)大	四九 638	二十一 30	霜降
	十月(亥)小	十九 197	二十二 3	小雪

纪年	月	朔日干支及余分	中气日期	中气
太 初 三 年	十一月(子)大	四八 696	二十三 24	冬至
	十二月(丑)小	十八 255	二十三 45	大寒
	正月(寅)大	四七 754	二十五 18	惊蛰
	二月(卯)小	十七 313	二十五 39	春分
	三月(辰)大	四六 812	二十七 12	清明
	四月(巳)小	十六 371	二十七 33	小满
	五月(午)大	四五 870	二十九 6	夏至
	六月(未)小	十五 429	二十九 27	大暑
	闰月 大	四四 928	无中气	
	七月(申)大	十四 487	初一 0	处暑
	八月(酉)小	四四 46	初一 21	秋分
	九月(戌)大	十三 545	初二 42	霜降
十月(亥)小	四三 104	初三 15	小雪	

纪年	月	朔日干支及余分	中气日期	中气
太 初 四 年	十一月(子)大	十二 603	初四 36	冬至
	十二月(丑)小	四二 162	初五 9	大寒
	正月(寅)大	十一 661	初六 30	惊蛰
	二月(卯)小	四一 220	初七 3	春分
	三月(辰)大	十 719	初八 24	清明
	四月(巳)小	四十 278	初八 45	小满
	五月(午)大	九 777	初十 18	夏至
	六月(未)小	三九 336	初十 39	大暑
	七月(申)大	八 835	十二 12	处暑
	八月(酉)小	三八 394	十二 33	秋分
	九月(戌)大	七 893	十四 6	霜降
	十月(亥)大	三七 452	十四 27	小雪



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陈启方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3月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是从1983年11月在广东省东莞县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讨论会所收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它共收论文35篇，着重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这是我国一本从多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的哲学论集。它出版后受到我国哲学界的欢迎和好评。

（一）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巨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理论势必要联系实际，这是形势发展的要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重大课题的提出，必然要改变哲学研究“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只在空洞抽象的思辨王国中遨游”（《研究》第66页，以下只注页码的均引自这本书）的偏向，必然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把这些重大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表明我国哲学界已开始改变理论脱离实际和理论落后于实际的局面，注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哲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

第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加快“四化”建设。而从哲学上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实践问题进行哲学概括

和论证，就有助于哲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从事各项实际工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加深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提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具有感性认识，而且具有理性认识，不仅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了解它的哲学基础，这就有助于大家更自觉地把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更自觉地进行各项改革，并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自觉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显著地发挥出来。

第三，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必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规律问题、对立统一规律问题、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以及有关的基本范畴，研究这些基本规律、基本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内容、特殊性质、特殊表现形式以及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同时还会联系研究唯物辩证法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的关系，并吸取其新的科研成果。这就有助于人们从思维方式上来一番改革，克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唯书唯上的和“左”的影响，促使人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考察问题，进而有助于深入探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

《研究》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的探讨，虽然还是初步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展开研究，

但它毕竟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二)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它自身发展的辩证法？回答是肯定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上分析、论证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并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分析、论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变化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在分析、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认识和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或者说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已往历史的延续，它和以往的各种社会形态当然有其带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辩证发展规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包含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正如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既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也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二者总是辩证统一地存在着的。忽视矛盾问题的这一精髓，就会忽视辩证法，甚至会违背辩证法。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同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也只是辩证法的一个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更只是辩证法的局部。矛盾着的客观事物的各个局部之间，有其贯穿一切和贯彻始终的东西，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各个局部内部又必有其不同于其他部分的东西，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矛盾，不管具有怎样多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它总是要通过各个国家的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总是各有各的包含普遍性、共性的特殊性、个性。各个国家是如此，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乃至各个个人，莫不如此。

早在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500页）毛泽东同志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讲的要教条主义“休息”的这段话，现在看来并没有过时，还有它很强的针对性。

《研究》正是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首先着重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特点或特性。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往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之后的客观要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71—372页）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纲领，也是贯穿《研究》全书的指导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国情，即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分析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探索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途径、道路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探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发点、途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的特殊性。这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

《研究》在着重地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时，没有忽略矛盾的普遍性，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正如有的论文所说，我们在强调特色、个性时，必须讲共性，必须讲社会主义的共同原则，“不然我们的特色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第5页）“我们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下进行。”（第23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强调的或它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有着本质的规定，即具有区别于

一切其他社会制度而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特色’离不开它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特色是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所采取的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是探索社会主义特色的前提和基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鲜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总的指导方针；决定了我们的体制改革必须以是不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标准。”（第74—75页）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问题，不是《研究》论证的重点，重点是特殊性问题。既抓住重点，又不忽视非重点，并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我以为这合乎辩证法。

（三）

在《研究》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包括矛盾分类、矛盾性质、矛盾地位和矛盾的表现形态等问题的研究，占有较大的分量。有的论文研究得比较深，有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读后颇受教益。也有些论文，空泛议论的多，详细占有材料、周密论证的少。有的论文论述得比较抽象，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密切，没有深入具体地分析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看法如果不会失之偏颇，那就得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国哲学界以往较多地致力于阐述哲学基本原理，或比较注重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这有它的必要性，也有成绩。但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如果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还满足于对经典著作逐段逐句的注疏，就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了。然而，有的理论工作者却认为现实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恐怕是有些人理论之所以会脱离实际的症结所在。据报载，胡耀邦同志前些时候曾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注意感性知识的积累，他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千个

感性知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知识。”“如果轻视感性知识，理性知识不同感性知识相结合那是很危险的。”（转引自1985年7月14日《光明日报》）这个精神对我们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也是适用的。

在《研究》中，已经初步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中的许多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表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改革的关系，怎样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如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的国情，中国国情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关系，我国经济结构中主体和补充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农村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中国式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正确处理改善人民生活与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的关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把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下去，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

关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方法问题，哲学界一般认为可以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既可以着重从横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现实的矛盾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即着重从应用上去进行研究；也可以着重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从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动态上去研究其辩证发展规律；还可以把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趋势相结合，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从中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特点。在当前，我认为，在继续搞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应着重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应用研究，在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中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



全国伦理学第四次讨论会概述

全国伦理学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道德在改革中的作用；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伦理学研究如何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体系等问题。

一、当前改革与伦理学工作者的任务。

同志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伦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同当前改革的形势要求，差距很大。在伦理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上如何服务于时代方面，尚未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概括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分析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对剥削阶级腐朽的道德观念的侵蚀，对一部分人日益滋长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没有作出有力的抵制和批判。伦理学本身的研究也缺乏严格的科学性和理论深度。

伦理学应当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为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当前的形势为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但同时伦理学研究要适应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要发挥道德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运用经济手段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对物质利益的关心，是人们最基本的实践动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必须同时承认道德作为经济调节的积极辅助手段。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如何，对改革的态度，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都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而道德的调节还能弥补经济调节不可避免的空白。因为无论是经济管理制度，还是法律制度都不是天衣无缝的，不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得由道德去调节。大力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和评价，充分发挥道德的调节作用，既是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使伦理道德适应改革的根本措施。

二、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道德在改革中的调节作用。

许多同志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能促进道德的进步；改革为道德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提供的利益是普及和提高共产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通过改革，真正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加强了人们的劳动观点，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强化了人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和主人翁态度；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强国富民，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人民更加热爱祖国，信赖共产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培养人们勤勉、诚实、积极劳动的道德品质；改革促进科技发展，为人们的劳动成为自由活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随之而来的将是劳动者体魄、精神、伦理道德的全面发展；改革还冲击传统道德中那些没落、腐朽的因素。

与会者还认为，改革实践不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共产主义道德，必须经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道德教育和传播灌输，要认真总结推广改革中的开拓者和先进模范人物的高尚道德情操。在改革中也要防止和批判旧道德因素，如“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等的影响和毒害，要正确处理好商品交换和同志式的互相协作关系。人们要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的修养。

同志们认为，改革需要共产主义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要破除妨碍改革、妨碍建立科学生活方式和振奋进取精神的旧道德意识、旧传统习惯；要认真研究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原因，揭露种种不正之风的社会危害性；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迫切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干部提高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增强道德判别能力，将能很好地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增强企业活力，是

(下转第108页)

《学术研究》1985年1—6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总 类

- 在广东省社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林 若 (3 · 5)
在广东省社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杨应彬 (3 · 8)
广东省社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3 · 115)
广东省社联第二届领导机构名单…………… (3 · 116)
广东省一九八三年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授奖项目…………… (3 · 118)
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先进工作者名单…………… (3 · 123)

哲 学

- 再论“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刘景泉 (1 · 40)
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剖析……………史贻逵 吴 晖 (1 · 45)
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体系应遵循的原则……………姜明安 (1 · 109)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黎克明 蔡茂生 (2 · 34)
论突破局限性……………张汉青 (2 · 40)
辩证逻辑是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王经伦 (2 · 46)
论科学预见与认识论基础……………江家齐 周穗明 (3 · 40)
论“真理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意义……………吴启文 陈长畅 (3 · 46)
对我国逻辑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建议……………刘 平 (3 · 110)
再谈一对范畴——“概念”和“存在”……………孟 辩 (4 · 67)
决策与创造性思维……………刘悦伦 (4 · 71)
从动静统一中把握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董孟华 许福陶 (4 · 105)
论社会主义社会中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吴群策 (5 · 14)
论质量互变规律的真实内容和特点……………施为民 (5 · 20)
物质·物质文明, 精神·精神文明……………钟阳胜 (6 · 40)
论科学的领导观……………邹永图 (6 · 51)
章太炎伦理思想述评……………沈善洪 王凤贤 (6 · 58)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证法……………马中柱 (1 · 34)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论述……………高齐云 (2 · 53)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新型社会矛盾	张江明 (3·53)
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法	巫贵均 吴纪太 (3·61)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种文明建议中几个现实问题的辩证关系	李宗阳 武纪荣 (4·58)
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性原理与改革	柯木火 (4·63)
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齐 云 (5·5)
社会化水平更高的生产力或其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结构及程度的矛盾	黎浩霖 贺乐民 何 为 (5·8)
生产社会性的提高程度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巩固和完善化程度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卢黄熙 (5·10)
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张瑞生 (5·12)
略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	李恒瑞 (6·44)

经 济

城市体制改革与做好经营工作	于光远 (1·16)
论社会主义经济竞争	高伟梧 (1·18)
塘鱼生产与价值规律	
——顺德县塘鱼生产情况调查	杨伟蕴 陈学工 曾牧野 (1·25)
广州东方宾馆提高利用外资经济效益的调查	蓝桂良 (1·28)
论资本输出的新特点和新性质	江成龙 (2·5)
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范畴	宋正春 (2·15)
比较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也可迅速发展	
——吴川县乡镇企业调查	何文里 丘明章 (2·30)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新观点、新提法	于光远 (3·12)
对卓炯商品经济理论方法的探讨	宋 扬 (3·22)
从香港的经济探讨广州开放金融市场问题	何圻基 吴 榕 (3·27)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雷州半岛甘蔗经济发展的预测研究	魏双凤 张一鸿 黄 湛 邱可夫 (4·34)
财政职能新论	张维平 (4·49)
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并与卓炯同志商榷	蔡馥生 (4·53)
按劳分配新探	欧小威 (4·107)
经济体制改革与上层建筑改造	马英华 (5·40)
略论精神产品的商品性	李江帆 (5·44)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梁 钊 (5·49)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	韩志国 (5·55)
简论商品经济辐射	沈祖良 (5·61)
必须长期坚持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的方针	曾牧野 (6·5)
从“葵乡”到纺织新城	
——新会县引进技术改造、发展工业的调查	宣 彦 (6·14)
珠江三角洲贯彻贸工农方针的几个问题	李 中 王 境 (6·18)
短期信贷银行的改革与经营	刘士焜 (6·24)

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新探	何国文 (6·30)
论家庭消费方式	袁培树 (6·36)

经济特区研究

试论深圳特区工资分配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控制	雷强 王珺 (1·5)
从深圳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看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	沈乐 高颂琪 林浩 (1·11)
经济特区必须重视研究和利用国际价值规律	唐火照 伍琦 (2·21)
经济特区技术引进的步骤问题	李千明 (3·34)
对评价经济特区建设成就的几点看法	陈肇斌 (4·44)

历史·考古

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	陈胜奔 (1·59)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陈善光 (1·68)
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	张维持 胡晓曼 (1·7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军事技术的运用及人们对其作用的认识	许锡挥 (1·81)
旧中国市建制设置概述	田穗生 (1·111)
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	段立生 (1·113)
宋代广州的外商	关履权 (2·63)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梁碧莹 (2·75)
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	郭正忠 (2·80)
晚年的丘逢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徐博东 (2·87)
晚年的丘逢甲是维新派和立宪派	郭汉民 (2·90)
统一战线在省港罢工中的作用	禩倩红 卢权 (3·68)
爱国华侨对“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经济支持	郭景荣 (3·75)
中国封建社会用人的资格问题	楚刃 (3·78)
文道与人才	金净 (3·108)
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	廖宗麟 (3·109)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	黄振位 (4·5)
台湾同胞与祖国的八年抗战	林其泉 (4·13)
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黄慰慈 许肖生 (4·18)
抗战期间香港报业工人的反汪罢工斗争	黄义祥 (4·23)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	立早 (4·26)
黎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邢关英 (4·108)
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略述	杨式挺 (5·67)
秦汉“都亭”考略	高敏 (5·73)
关于天地会起源的研究方法问题	王卫平 (5·83)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王维俭 (5·84)
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物质保证	张孟莘 (6·75)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	罗一星 (6·81)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钟史声 (6·91)
“扶桑国之谜”的研究史及流派述评	谭世保 (6·97)
古代历法的置闰	张闻玉 (6·117)

教 育

- 海南岛教育发展的战略和战术·····林允照(1·103)
·调查报告·当前高校改革中提出的几个问题·····邝彦实(2·26)
经济开放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和有利条件·····陈 飘(3·95)
陶行知怎样进行智力开发·····郭以实(3·99)
“生活教育”在香港·····麦坚弥(3·104)
高等教育改革应注意利用经济杠杆·····刘 伟 何小锋(4·97)
关于广州首创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调查报告·····范 英 盟 徽 志 群(5·27)
广东省社联创办的广东社会科学大学·····(5·119)

语 言 文 学

-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来新夏(1·89)
训诂学渊源论略·····潘允中(1·92)
从哲学和文论的传统认识《文心雕龙》的唯物主义性质·····韩溯初(1·97)
艺术“商品化”与戏曲的形成·····冯建民(2·95)
以诗论诗之弊·····欧阳世昌(2·102)
《白雨斋词话》小论·····杨重华(3·86)
略论宋词的复雅·····秦寰明(3·90)
创作自由的矛盾二重性及审美特质·····孔智光(4·85)
论审美的心理距离·····潘智彪(4·92)
迎着新潮流,探索新方法
——广州地区文学评论工作者座谈纪要·····(5·93)
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唐钰明 周锡馥(5·98)
反封建启蒙思想家冯梦龙·····薛宗正 龚允怡(5·101)
神话产生的认识基础
——兼谈科学幻想不等于神话·····郭精锐(5·108)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与早期鲁迅思想·····陆 路(6·102)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李标晶(6·109)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吴大泽(6·115)

新 书 评 介

- 《哲学简明教程》评介·····方 里(1·107)
评《中国式 济体制研究》·····王 珺 袁耀文(2·105)
《阮啸仙文集》简介·····刘林松(2·107)
新中国第一部《西方伦理思想史》·····俞晓阳(3·106)
《龚自珍研究》的三个特点·····孔一青(4·103)
锲而不舍 呕心沥血
——陈锡祺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读后·····段云章 张 磊(5·112)
开拓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评张江明著《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李辛生(5·116)
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陈启方(6·123)

书海酌蠡

《顾亭林诗集汇注》一补	官大梁 (1·17)
丘逢甲祖籍不在商丘	李鸿生 (1·24)
《红楼梦》标点一得	周林生 苏海 (1·44)
“伎辩”应是“强辩”	董志翘 (1·114)
康有为《蝶恋花》词辨	陈永正 (1·114)
关于郭沫若《赠达夫》诗的写作时间	吴海发 (1·120)
也说“叵罗”	熊飞 (2·45)
吴自牧小考	官桂铨 (2·52)
“枪恨”当作“枪粮”	董志翘 (2·59)
“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解	张桂光 (2·94)
《诗·黍离》中的“黍”、“稷”究为何物	张剑 (3·39)
“道慢”释义	董志翘 (3·85)
近代旅加华侨考辨二则	沈毅 (3·98)
释“施”	王芸孙 (3·125)
黄遵宪在国外工作的时间	周林生 (4·31)
“大封”小议	林集友 (4·62)
女心为何伤悲?	王魁伟 (4·78)
胡三省误注“恶奴”	谭世保 (4·111)
释“信宿”	刘运兴 (5·19)
释“子衿”	刘运兴 (5·26)
释《司尊彝》	黔容 (5·32)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补阙二表	林振礼 (5·82)
“区盖”小议	吴平 (6·13)
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唐僧”应是康僧会	官大梁 (6·35)
吴承恩订补《状元图考》	官桂铨 (6·69)
《知新报》的停刊时间	何靖 (6·90)

青年论坛

为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出现新的技术革命	钟坚 (1·52)
西方世界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为什么科学文化高度发达?	曾伟荣 (2·32)
既然要消灭剥削制度，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	张平增 张慧君 (3·37)
科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命运	李江涛 涂成林 (4·76)
西方白领阶层队伍的扩大是否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受雇性质?	肖茂盛 (5·65)
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何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	黄循平 (6·63)

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控制论与社会科学的联姻	主人 (1·54)
浅谈“黑箱”方法	泽良 (1·56)
科学与社会分析法和社会管理	钟阳胜 (2·80)
行为科学与企业管理理论	谭湛明 (2·83)
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陈春声 (3·65)

美在连续值逻辑的桥梁上流动

- 用模糊数学研究美学的设想..... 刘君奇(4·79)
- 浅议接受美学中的反馈思想..... 汤伟民(4·83)
- 交叉科学与社会的完整性..... 黎 鸣(5·33)
- 教育现象的模糊性及对教育理论数量化研究的几点启示..... 张铁明(5·35)
- 文艺批评方法论更新之我见..... 肆 僧(6·66)
- 略论艺术创作信息系统..... 肖 走(6·70)

开发岭南的先驱

- 东吴首任的交州刺史步骞..... 何维鼎(1·87)
- 罗浮山上的科学家葛洪..... 谈 史(2·93)
- 卢循在广东的行迹与影响..... 汪廷奎(3·84)
- 六世纪岭南越族的杰出首领——冼夫人..... 许宁英(4·32)
- 韩愈在潮州..... 李庆新(5·91)
- 佛教改革家——惠能..... 陈福雄(6·100)

学 术 动 态

- 丘逢甲学术讨论会论点简介..... (1·33)
- 广东社会科学界纪事..... (1·115)
- 童大林谈广东经济研究的一些课题..... (1·116)
-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问题论点综述..... (1·116)
- 近两年来哲学界探讨“两变”命题的部分观点综述..... (1·118)
- 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社会科大学成立..... (2·14)
- 我省逻辑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市召开..... (2·79)
- 广东社会科学院举行首届科学讨论会..... (2·101)
-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2·108)
- 关于“两变”命题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观点简介..... (2·109)
- 广东社会科学界集会纪念中国社联成立五十五周年..... (3·7)
- 广东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 (3·11)
- 广东青年哲学工作者座谈哲学研究如何为改革服务的问题..... (3·60)
- 广东社科院与香港浸会学院在港合作举办粤港关系学术研究会..... (3·83)
- 卓炯同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点简介..... (3·112)
- 广东青年社科协会举行卓炯经济思想研讨会..... (3·124)
- 广东《现代哲学》杂志创刊..... (4·96)
-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4·96)
- 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学术讨论会部分论点简介..... (4·109)
- 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4·112)
- 广东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5·13)
- 广东税务学会成立..... (5·39)
- 广东哲学学会举办哲学改革专题讲座..... (5·39)
- 广东保险学会成立..... (5·43)
- 广东举办辩证逻辑讲习班..... (5·97)
- 全国伦理学第四次讨论会概述..... (6·126)



学术研究

一九八五年第六期

总第七十三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21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 2820 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 0.40 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 095 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